

中国启蒙思想文库

张岱年 主编



筹洋刍议

薛福成集

徐素华 选注

中国启蒙思想文库

- | | |
|----------|-------|
| 尊隐 | 大同书 |
| 默觚 | 仁学 |
| 采西学议 | 建国方略 |
| 使西纪程 | 砭旧危言 |
| 万国文录外编 | |
| 南洋会议 | 旭书 |
| 盛世危言 | 新民说 |
| 论世变之原 | 猛回头 |
| 新政真论 | 醒的人醒了 |
| 强学一戊戌时论选 | |
| 民声一辛亥时论选 | |
| 新潮一民初时论选 | |

(辽)新登字1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筹洋刍议:薛福成集/徐素华选注.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6

ISBN 7-205-02859-0

I. 筹…

I. 徐…

II. ①政论-中国-近代-选集②政治思想-思想史-中国-近代
③薛福成-文集

IV. D092.5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108号 邮政编码110001)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朝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字数:110,000 印张:5 $\frac{7}{8}$ 插页:5

印数:1—1,583

1994年9月第1版

1994年9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吴长勇

版式设计:赵耀今

封面设计:赵多良

责任校对:孙东岩

定价:6.10元

“中国启蒙思想文库”总序

在历史即将跨入21世纪的时候，辽宁人民出版社推出了这套“中国启蒙思想文库”，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都是件极有意义，极值得称道的事。

尽管这些著述原是撰写于80多年以前，它的作者也和那个时代一起早已成了历史的陈迹；但是当人们重新翻阅这些古色斑斑的书页时，仍然无法轻松和平静。这是启蒙先驱者们的呐喊和沉思，它激昂、悲壮而又深沉无比，仿佛融进了多少代人的希冀与渴望。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的启蒙者和中国的启蒙运动为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写下了最为辉煌又最为感人的一章。

它发生在中国大封建王朝彻底崩溃的前夜。这是一个前进与倒退、光明与黑暗、希望与失望交织的时代，亦是中国近代社会一个大转变的时代。那时，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都已落在西方现代文明的后面，国内矛盾重重，国外列强环伺。自1840年的鸦片战争始，帝国主义的坚舰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国门之后，中国就被推向了备受屈辱和更加不幸的境地。但是，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坚舰利炮并没有把中国人吓倒，相反却进一步唤醒了中国人民的民族危

亡感，从而开始了一场持久而又悲壮的救亡运动。民族救亡、爱国强国成了那个时代的最强音，也成了整个启蒙运动的主旋律。

但必须清醒地看到，中国近代社会大转变的时期也是“门户开放”、“西学东渐”的时期。西方的一些先进思想逐渐传入中国。当时一些先进的思想家一方面撷择中国古代典籍中有利于变革的观点，如《周易》的变易观念、《公羊传》的“三世”观念、《礼运》的大同思想等；一方面参照当时所了解的西方情况提出一些革新的方案。当时梁启超、章太炎通过日本译籍而了解西学，严复则直接介绍了西方近代的一些进步学说。严译的《天演论》介绍了达尔文进化论，在当时风行一时。孙中山则直接接受了西方近代的政治学说的影响而根据国情加以改造，对于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起了极大的积极作用。

中国启蒙运动的重要和伟大并不在于它是否取得了如何了不起的成就和胜利，而是在于它曾给人们心灵上所带来的强烈而持久的震撼，并不在于它自身理论的如何完美，而是在于它曾给予，并继续给予人们的启示和思索。许多启蒙思想家们苦苦追问和求索的问题诸如自由与平等、民主与法制、教育与科技、东方与西方、爱国与强国、农业经济与工业生产、儒家伦理与现代文明等等，即使在今天仍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因为启蒙者的思想连同那一次又一次的启蒙运动一起不仅属于历史，它同时更应该属于或必然属于今天和未来。虽然“洋务运动”过去了，“变法维

新”过去了，“辛亥革命”过去了，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启蒙运动并没有完结，五四运动便是启蒙精神的继续和发展。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在现代化建设的今天，我们一再提倡解放思想，更换脑筋，这又何尝不是启蒙精神在新时代的高扬？

今年是五四运动75周年，我们谨以这套丛书来纪念“五四”，也呼唤着新的启蒙精神的到来。

张岱年

1994年1月于北京大学

编 序

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日趋严重的内忧外患，压迫在每一个有爱国心的中国人的心头。“救亡图存，富强中华”遂成为那些关心祖国前途和命运、正直而有头脑的政治家、思想家们思考、探索的中心，薛福成就是他们当中的杰出一员。他一生的文章和见解、一生的实践和探索，从没有脱离过“救亡图存，富强中华”这个时代的主旋律。

薛福成（1838—1894）字叔耘，号庸庵，江苏无锡人。晚清著名的爱国政治家、思想家、通晓“洋务”的外交家。他出生官宦之家，父亲薛晓帆，曾在湖南任过县令，中年即丧。

1865年，薛福成给曾国藩写了一封《上曾侯相书》。在这篇进身之作中，他全面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政治见解和治国平天下的方略，得到曾国藩的赏识，因此而邀请他到曾的幕府办事。薛福成在曾的幕府办事8年，与张裕钊、吴汝纶、黎庶昌合称“曾门四弟子”。1872年曾国藩死后，薛福成于1873年入李鸿章幕府，在任李鸿章幕僚的十年中，专办外交，代李鸿章拟写了大量的奏疏、书札。1883年，薛

福成任浙江宁绍道台。1884年中法战争期间，在法国侵略军的舰队进攻浙江镇海海口时，薛福成亲自布置海防事宜，参加了击退法国舰队的战斗。1888年，薛福成任湖南按察使。1889年起被清政府任命为出使英、法、意、比四国钦差大臣。在任驻外公使期间，他细心考察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和风俗民情，极力维护国家主权和尊严，关心海外华人的社会地位和切身利益。1894年，在离任返国途中发病，抵达上海就不幸逝世，享年仅56岁。

薛福成的著作主要有《庸庵全集十种》、《庸庵文别集》、《庸庵笔记》等。《庸庵全集十种》包括《庸庵文编》四卷、《续编》二卷、《外编》四卷、《海外文编》四卷、《筹洋刍议》一卷、《浙东筹防录》四卷、《出使奏疏》二卷、《出使公牍》十卷、《出使日记》六卷、《日记续刻》十卷，共10种47卷，是研究薛福成改良、变法、自强思想的主要著作。《庸庵文别集》是《庸庵全集十种》未收入文稿的结集，共六卷。前五卷主要是代李鸿章拟写的大量奏疏、书札，是后人研究当时的对外关系、洋务运动及李鸿章思想的宝贵资料。而第六卷则是薛福成自己思想和活动的记载，其中的《日本商务胜于中国说》、《论公司不举之损》等篇，则比较典型地反映了他主张大力发展民族资本工商业的思想。《庸庵笔记》是薛福成1865至1891年间所作的见闻随笔的节选，共有6卷，分史料、轶闻、述异、幽怪等门类，内容既有不少有关晚清政治、经济及社会习俗方面的珍贵资料，也有许多饶有趣味的遗闻轶事，同时也夹杂着一定

的封建伦理说教、因果报应等消极内容。

本书由从上述三本著作（主要是《庸庵全集十种》）中挑选出的有代表性的文章结集而成，比较集中地反映薛福成思想变化发展的内容和特点。这些文章的产生，也在一定范围和程度上反映了1865年至1892年这二十多年间世界各国发展的大势和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从世界范围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迅速，商品大潮配合着坚船利炮打开了那些闭关锁国国家的大门，强大中国的地位开始丧失，外侮频频而至，就连原本贫弱战乱的日本也在全面效仿西方的基础上日渐强大，成为中国的威胁。这个时期的中国，从内部来说，人民群众的大规模的反抗斗争虽已不处在高潮，但人民起义本身却给统治者深刻的教训，使得他们不能按照原有的方法继续统治下去，而不得不作出某些改变。从外部来说，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外患更加严重，中国正越来越成为西方列强分肥的对象，从而危及统治者的切身利益。统治者从维护自己的根本利益出发，也不得不改变治国方略。也就是说，“变”已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客观要求，薛福成的思想和主张正是这种趋势和要求的顺应和反映。至于具体怎样“变”，对西方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多年的专心研究和出使西方四国的实地考察，为薛福成“变”的思想和主张填进了十分具体的内容。

本书所选入的《上曾侯相书》、《应诏陈言疏》是薛福成前期思想的代表作；《筹洋刍议》、《出使日记》等，则是

他后期思想的代表作。这些代表作在当时的影响和作用是很大的。例如写于1875年的《应诏陈言疏》所提出的治平六策和海防密议十条，引起了朝野上下的普遍重视，部分比较开明、进步的士大夫对此大加赞赏和肯定，认为这些议论“未出之前，系是人人意中所无；此议既出之后，乃觉人人意中所有。……尤妙在事事从浅处、显处著笔，使人易晓而世易行，宜乎乙亥丙子间，斯议传播一时也。”^①最高统治者也部分地接受了薛福成提出的这些改良措施和意见，并付诸实施，从而对中国社会的局部改良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奠定薛福成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和影响的力作《筹洋刍议》，在1879年至1881年成书，1885年正式刊行。该书在正式刊行之前，就被许多有识之士争相传抄，部分驻外使官争相拜读。书中所提出“救亡图存，富强中华”的基本策略方法，在后来写成的《出使日记》中有了更加具体的阐述和发展，其中的重视外交，抵制、取消不平等条约；整肃官吏腐败；仿效西方，以工商立国，大力发展工商业；鼓励、扶助私人集股办工商业，反对官商垄断；引进先进机器、技术“殖财养民”；“藏富于民，民先富国才富”等一系列见识和主张，不仅是当时的切中时弊的救国良策，而且对我们国家今天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发展经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有不可忽视的启迪、参考、借鉴作用。

^① 见《应诏陈言疏》。

薛福成思想内容丰富，且前后多有变化。但有一点却是贯彻始终的，这就是鲜明的爱国主义。今人读他的著作，浓烈的爱国之情扑面而来，拳拳的爱国之心处处显现。这种鲜明的爱国主义，是他一生探索的动力，也是他一生追求的目标。从这个基本点出发，他少年时勤奋学习，专攻经史实学，以备国家一日之用。^①成年后，为改变贫弱祖国的命运而进行锲而不舍的艰辛探索，终于悟出了学习西方国家之长，以工商立国，大力发展民族资本的工商业，才能使中华民族自强自立于地球诸国之间的道理，并为此而大声疾呼、出谋献策、四处奔走。然而，这种思想认识的形成不是突然的，而是一个较长的变化发展过程的结果。这里根据他的主要著作，特将他的思想分为前后两个阶段来作些扼要的述评。

前一阶段，即作《筹洋刍议》以前的这个阶段。在这个阶段，薛福成思想的主要倾向是：在维护当时现有各项制度的前提下，通过适当的改良来增强国力，使国家富强起来。从这一点出发，他提出了自己对国事的内外主张。他主张筹巨款，多购西方人的坚船、利炮；花高薪，多聘西方国家的技工、水手、武官，学习制造枪炮、驾驶轮船的技术，帮助训练军队，从而提高国家的对外防御能力。他提出开垦荒地、兴办屯政、去除捐例、严肃吏治、禁止鸦片等改良措施，以便从国家内部增强实力，达到自强目的。

^① 参见《上曾侯相书》。

他的这些思想和主张集中反映在他前期思想的代表作《上曾侯相书》和《应诏陈言疏》中。作于1865年的《上曾侯相书》是薛福成的进身之言，写作时他才27岁。这份洋洋万言书，从多方面展现了他不凡的见解和这个阶段的思想特征。例如，他敏锐地洞察了沿袭很久的科举考试制度的弊端在于理论和实际脱离、学和用脱节，致使许多有用之才无途报效国家。这一见解可以说是十分切中时弊的。但仅此而已。他虽然指出了科举制度的弊病所在，但并没有打算从根本上改变它、取消它，至多只是提出用“征辟”（即由大臣直接向皇帝举荐有用的人才）的办法来补救科举之弊，即企图通过科举与征辟并用的措施来为国家发现、培养实用之才。这里的改良倾向是非常易见的。写于1875年的《应诏陈言疏》，是一份写给皇太后、皇上的奏折。这时的薛福成已为官十年，对国家的内外政策和官场内外的现状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在此基础上提出的治平六策和海防密议十条，和他十年前初出茅庐时的治平方略相比较，显得更加具体、实际而富有哲理。奏折中提出的治平六策，即养贤才、肃吏治、恤民隐、筹漕运、练军实、裕财用，同样谈的是人才培养、整肃吏治、体恤民情等老问题，但角度更高、见解更深。例如他说：“世运之所以为隆替者何在乎？在贤才之消长而已。夫天之生才，恒足以周天下之用。然而贤才有盛有不盛者，则培养之道为之也。”这里把人才和国运的兴衰联系起来，强调人才的关键在培养，而人才又“必先培养于平日”，而不是在国家遇到特大困难时才想

到人才问题。为此，他提出平时就注意培养人才的三条具体措施。奏折中的海防密议十条，更有许多明见。例如“择交宜审”一条，他根据自己多年办外交的经验教训，从中国国际地位和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择交不可不慎”；要区别不同国家的不同情况，确定可援的盟友和要认真对待的劲敌，而不要四面树敌，使自己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并且从历史和现实的外交实例中总结出一个经验，即“盖择交之道得，则仇敌可为外援；择交之道不得，则邻援皆为仇敌。诚宜豫筹布置，隐为联络，一旦有事，则援助必多，以战则操可胜之权，以和必获便利之约矣。”而在“开矿宜筹”、“商情宜恤”、“茶政宜理”等条中，他重视发展工商业的思想已初见端倪。“商情宜恤”中，他从国家富强之道的高度，初步地论证了扶持、发展华人商业运输、与洋人分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茶政宜理”中，他提出仿西人之法，适当渐加出口茶的税额，用赚外国人钱的方法，增加国家的财源；“开矿宜筹”中，提出购买外国的先进机器，采用官办和商办相结合的办法，大力开采金银煤铁矿藏，是富强中国、使列强不敢轻视中国的明智之举。这些是他后一阶段大声疾呼发展民族工商业的思想基础。

后一阶段，即以《筹洋刍议》为开端，直至他病逝。这一阶段的思想主要反映在《筹洋刍议》、《出使日记》及其续、《振百工说》、《论公司不举之损》等文章著作中。这个阶段的薛福成，思想在与时俱进，君民共主、变法图强、大

力发展民族工商业逐渐成为他的思想主流。他思想的这种变化发展，具体地说在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变法”的口号在《筹洋刍议》中正式提出，并引古说今进行论证，得出了不变法我将处处不如人的结论。其中写道：“若夫西洋诸国，恃智人以相竞。我中国与之并峙，商政矿务宜筹也，不变则彼富而我贫；考工制器宜精也，不变则彼巧而我拙；火轮、舟车、电报宜兴也，不变则彼捷而我迟；约章之利病，使才之优绌，兵制阵法之变化宜讲也，不变则彼协而我孤，彼坚而我脆。”这就是说，变法是势在必行，不可阻挡。认清这一点，鼓舞起中国人的信心，发挥出中国人的才智，中国必定会超过西方列强，对此，薛福成充满自信，并作出论证和说明。

第二，赞赏君民共主的政治制度。在前一阶段，薛福成对中国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不曾提出非议。随着视野的开阔和实际的分析比较，他对西方国家中的君民共主制度产生了兴趣。在他看来，单纯的民主国家和单纯的君主国家都各有利弊，唯有君民共主最为斟酌适中，无君主、民主偏重之弊。因此，他对英国、意大利那样的君民共主国家发出了肯定和赞美。这样的肯定和赞美，是在用一个比较稳妥的形式来表示他的政治见解。他在其它地方多处谈论西方国家议院制如何通民情、民主如何是中国古代就有的言论，也是他对君民共主持赞赏态度的一种补充和论证。他的这种政治见解和表述方式在后人看来似乎太小心翼翼，太羞答答了。但如果设想一下他当时的处境，一个正

在受到君主专制的朝廷重视的忠臣，产生出否定专制制度的见解，自然是一种叛逆。这种叛逆却正是薛福成思想发生重大变化的标志。有人把它说成是薛福成从洋务派分化出来转为维新派的主要标志，也是有充分根据和一定道理的。

第三，从多方面学习西方国家，而不仅仅是船坚炮利。他多次谈到：西方国家的“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认为那种把西方国家富强仅仅归结为精制造、利军火、广船械的见解，是一种本未倒置之见。在他看来，西方国家所以能坐致富强的根本，是全在教民、养民上狠下功夫。何谓教民？即西方国家都很重视教育的普及、教育的社会化、教育的专业化，把教育视为国家兴废盛衰的本原。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夫观大局之兴废盛衰，必究其所以致此之本原。学校之盛有如今日，此西洋诸国所以勃兴之本原欤！”薛福成的这种见解，可以说是我们今天提倡的教育为立国之本思想的较早表述，反映了一百多年前这位有识之士的远见卓识。何谓养民？薛福成概括出西方国家养民之新法二十一条，即造机器以便制造、筑铁路以省运费、设邮政报馆以通消息、立约通商以广商权、增领事衙门以保商旅、筹国家公帑以助商贾、立商务局以资讲求、设机器局以教间阎、通各国电线以捷音信、设博物院以备考究、定关口税以平物价、行钞票以济钱法、讲化学以精格致、选贤能以任庶事、开银行以生利息、求新法以致富强等。以上这些很典型的新法条文，说明了在这个阶

段，薛福成对西方国家富强之道的认识不像前一阶段那样肤浅、片面，而是抓住了根本，有了比较全面深入地把握。

第四，商握四民之纲、必须大力振兴商务。这是薛福成思想中最闪光的内容，也是他后半生探索、着墨最多的问题。他对为什么要振兴商务、如何振兴商务有许多精辟的论述。他认为：“论一国之贫富强弱，必以商务为衡；商务盛则利之来，如水之就下而不能止也；商务衰则利之去，如水之日泄而不自觉也。”西方各国之所以富强，正是以商务振兴为要端，而中国的日渐贫弱，就在于商务不振兴。与此同时，他还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商务所以不振兴的根源在“恪守中国圣贤之训，以言利为戒。在上者不肯保护商务，在下者不肯研索商情，一二饶才智知大体者相率缄口而不敢言，偶有攘臂抵掌而谈之者，则果皆忘义徇利之小人也。即使纠合巨款为孤注之一掷，无不应手立败，甚至乾没人财以售其奸，致使天下之人，相率以商为畏途”。^①于是，他警告人们说，中国商务再如此不振下去，中国的财源将会因大量外流而日涸，一二十年以后，中国将何以为国？为此，他呼吁清政府放弃崇本（农）抑末（商）的旧说，认清席卷地球各国的滚滚商潮，顺潮流而动，大力振兴中国商务。

那么，如何才能振兴中国商务呢？薛福成首先提出，必须破除千年以来，文人士大夫以言利为戒、羞于谈利的陈

^① 参见《出使日记续刻》选。

规旧习。他通过列举有关的经史资料，来说明中国圣人及其圣人之作都曾讲到过利，圣人是“不讳言利”的，言利乃是治天下之常经也。而后世儒者不明此义，凡一言及利，不问为公为私，一概斥之为言利小人，从而使得通商、经商这一利国利民之术被长期丢弃一边，从而导致国衰民穷。在首先为言利正名的基础上，他进一步说明，圣人所言的利，是为公的利，但为公的利，必须以私利的获得为基础，即务必“使人人各遂其私求；人人之私利既获，而通国之公利寓焉。”^①这种民先富，国才富、藏富于民的见解是非常深刻而富有哲理的。以上所有这些为言利正名、扬名的言论，目的就在于使人们从长期的封建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扫除中国商务振兴的思想障碍。

在如何振兴中国商务的具体措施方面，他参考西方国家的做法，提出了八条建议：一、由国家成立专门的商务领导管理机构；二、大力兴办公司，为公司立法；三、确立专利权；四、杜绝伪劣；五、变换更新商品的花式品种；六、举办各类商品展销会、博览会；七、改税则，增加洋货进口税，减轻丝茶出口税；八、导商路，扩大与海外各国的商务往来^②。除此之外，他还特别提到，要使中国商务真正振兴，必须纠正当时中国对内对外商务活动中存在的三大弊端，即一、抢揽生意，甚至贬价争售，互相诋毁，以致两败；二、掺杂诈伪，导致真货滞销，弄巧成拙；三、信

^{①②}均参见《出使日记续刻》选。

息不灵^①。只有通过申办专利、严惩作假等方法彻底纠正这些弊端，中国商务振兴才有希望。由此而联想到在今天中国的商务活动中，薛福成当年所说的那些弊端不是仍在一定范围内起着消极、破坏作用吗？就这一点而言，薛福成的思想在今天仍有它的现实意义。

第五，工为商之基、工居商之先，振兴百工为兴邦立国之要端。这是薛福成后期思想的两大支柱之一。他在《振百工说》这篇文章中说：“泰西风俗，以工商立国，大较恃工为体，恃商为用，则工实尚居商之先”。中国必须向西方国家那样，大力振兴百工，尤其是要发展大机器工业、采矿工业。为此，他不仅大力宣传和详细论证中国振兴百工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而且提出了许多富有建设性的具体措施。例如在发展大机器工业生产的问题上，他驳斥了封建顽固派所持的“机器夺小民生计”的谬论，说明采用新式大机器生产，能以一人替百人之劳，不仅能省工、省力、省原料，而且还能使产品价格廉，在市场上富有竞争力。机器生产能使商务隆盛、民生富厚、国势勃兴的益处，在西方国家已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此外他还特别说明，在机器生产日益普及的世界大势之下，中国人“若用机器以造物，则利归富商；不用机器以造物，则利归西人。利归富商，则利犹在中国，必可分其余润以养吾贫民。利归西人，则如水渐涸而禾自萎，如膏渐销而火自灭，后患有不可思议者

^① 参见《出使日记续刻》选。

矣！”^① 这种把发展机器工业生产和国计民生密切联系起来，以明其利害的言论，对于那个时代的人们起着振聋发聩的作用。

在发展机器工业生产的问题上，薛福成的另一个卓越见解，是他从官办工业或官督商办工业企业的不景气，看到了私人办工业企业的优越性。因而他认为，不应该由少数洋务派大官吏垄断中国新型机器工业生产的主办权，应该鼓励那些有能力、有财力的个人以集股的方法开办私人工业企业，政府对私人工业企业应施行扶助（如减税）的优惠政策，让他们自负盈亏，大胆经营。私人工业企业发展起来了，就能够为国家增加税收来源，增强国力以抵御外敌，而尤其有意义的是“中国多出一分之货，则外洋少获一分之利，吾民得自食一分之力，夺外利以润吾民，无逾此者矣。”^②

薛福成一生前后两个阶段的思想发展变化，充分说明他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与时俱进的进步政治家、思想家。所谓与时俱进，就是说他能够比较清楚地看到世界历史发展的大趋势，看到由封建专制转向民主制度、社会经济由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商品经济的发展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因此而努力使自己的思想摆脱旧观念的束缚，跟上时代潮流的发展。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做到这一点，薛

① 参见《出使日记续刻》选。

② 参见《筹洋刍议》。

福成所以高出同时代的一般人，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有影响的进步人物，关键的一点就是，他通过对西方国家富强之道的多方探索，看到了“数十年来，通商之局大开，地球万国不啻并为一家人。而各国于振兴商务之道，无不精心研究”已是世界发展大势，中国只能顺势而动，努力适应它、驾驭它，跟上大势的发展，才有立足之地，才有生存的资格，否则只能尽受外侮、束手待毙。而商务的振兴又离不开机器大工业的发展。因此，他大声疾呼发展中国工商业，尤其是民族资本的私人工商业。他一生中的许多远见卓识都是围绕这关键的一点而展开、发挥的。也正是这关键的一点，奠定了他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和影响，使他成为中国近代史上高奏救亡图存、振兴中华这一时代主旋律的主要号手之一。

薛福成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而他的思想也必然是新旧交织着。只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新的东西不断增加，最终占据主导地位，由此而造就出一个著名的进步思想家。后人研究了解他，着眼点和侧重点也必然是其思想中进步的、积极的内容。当然，在薛福成的思想中，还有保守和落后的东西，我们在研究时，应本着去粗取精的原则，吸收于我们今天改革开放、发展经济有益的东西，这些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本书在选编过程中，参考了光绪年间刊行的《庸庵全集十种》，丁凤麟、王欣之编的《薛福成选集》（1983年9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施宣圆、郭志坤标点的《庸庵文别

集》(1985年8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以及丁凤麟、张道贵点校的《庸庵笔记》(1983年8月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一并在 此表示感谢。

徐素华

1993年12月10日

目 录

总 序	张岱年	1
编 序.....		1
上曾侯相书 (1865 年)		1
应诏陈言疏 (1875 年)		27
答友人书 (1875 年)		50
《筹洋刍议》序 (1885 年)		53
《筹洋刍议》(1879 年)		55
《出使日记》节选.....		91
《出使日记续刻》节选		110
论中国在公法外之害 (1892 年)		156
使才与将相并重说 (1892 年)		158
治术学术在专精说 (1892 年)		160
考旧知新说 (1892 年)		162
振百工说.....		164

上曾侯相书^① (1865年)

太老夫子元侯中堂节下：窃惟天下之将治，必有大人者出而经纬之。而天之靳之，往往有二。宋明以来，大儒间出，恒不得居将相之位以有为于时。得位矣，或限于地，或受任未专且久，或丁举世耳目之因循而碍于更革，则亦稍稍补苴掇拾，而未暇为百世深计。此非其人不伟，位不显，而时为之也。若夫天生瑰琦宏杰之人，而畀以至重之任，又有可因之时，则天以百世事业寄之也，不待言而决矣。国家承平，馀二百年，自粤孽倡乱，荼毒遍海内，回、苗、幅、捻诸寇，如猬毛而起。节下以乡兵数千，号召贤俊，为天下倡。廓清南楚，奋兵而出，荡鄂渚，摧江州，收夺失土数千里，遂受东征之命。水陆诸军，夹江而下，规全皖形势之地，以制贼死命。推毂群帅，选将分兵，则两浙三吴，相次恢复。然后悉锐而拔金陵，枭元恶，扫除数

^① 曾侯相即曾国藩，1865年薛福成以副贡入曾国藩幕，与黎庶昌、张裕钊、吴汝纶合称“曾门四弟子”。该书信是薛福成早期思想的代表作。

百万狺狺之豺虎而灭其景迹。节下之勋，磊磊轩天地，海内抵掌高谈之士，窥见标末，开口不能诵说万一。拘方鄙儒，岂复能仰测高深，拟议影响间哉？抑福成窃不自揣，犹有望于节下者？语曰：“行百里者半九十。”^①节下戡乱之业，视唐之汾阳王，明之新建伯，殆已至百里而又过之。若必如伊、傅、周、召之致治^②，则适及乎百里之半，而当加意之时也。伊、傅、周、召，固非福成所敢窥测，若三代下之能追踪前哲者，莫如诸葛武侯。请设言武侯之事，假令当时灭吴荡魏，天下为一，将为一代建不拔之业，必作人才以培邦本也审矣，必饬治道以康兆民也审矣，必将策富强、定经制、消反侧、防外侮、正风俗，又无疑矣。武侯虽不得行其志，而其志之所当为者，则可推也。即推而上之为伊、傅、周、召，其所为亦当如是也。今节下之功，既远出武侯上，而可为之时，又十倍武侯。天子倚之，天下信之，节下建一议，行一政，则举世将视为转移。又值变乱之后，百事兴革，民心望治，往往更张而不见其迹，施設而易蒙其泽，是伊、傅、周、召所仅能一遇之时，而又知节下平日所自期，断不在伊、傅、周、召下，故福成敢以其迂疏之说进焉。福成于学人中，志意最劣下，往在十二三岁时，强寇窃发岭外，慨然欲为经世实学，以备国家一日之用，乃屏弃一切而专力于是。始考之二千年成败兴

① 意即走一百里路，走了九十里才算走了一半。比喻做事愈接近成功愈困难。

② 伊、傅、周、召，为伊尹、傅说、周公和召公，均系古代佐王治国有功的贤相、辅相。

坏之局，用兵战阵变化曲折之机，旁及天文、阴阳、奇门、卜筮之崖略，九州厄塞山川险要之统纪，靡不切究。盖穷其说者数年，而觉要领所在，初不止此。因推本姚江王氏之学^①，以收敛身心为主，然后浩然若有得也。既又知为学之功，居敬穷理，不可偏废，而溯其源不出六经四子之说。盖术凡三变而确然得所归宿处，所惧知识铸昧，师心独学于穷乡之中，固陋不足以应世。窃自私念，必得今世巨公如节下者以为依归，而磨砺以事，始能略有成就。昔先人以文辞受知门下，为县令湖南，方稍欲建树，不幸中道即世。福成时随长兄福辰在楚，适节下辱垂吊贻，恩谊之隆，非可言喻。既而贼陷故乡，奔驰东归省母，相遇于江北之宝应，遂侨僻处居之。读书奉亲之外，妄画灭贼方略，思欲亲诣行辕陈献，辄以母老家贫，不能远行而罢。迩者节下犁平丑类，而天下至急至切之务，与东南经久之规模，均惟节下是赖。盖所谓其人其任其时，三者咸会其极者，失此不言，复谁与言之？今闻节下以剿擒寇北上，彼皆乌合救死之寇，以节下之威临之，自当不日荡定。但所云百世事业，不尽在此，故辄献其前所欲云者。其北方利病，与剿捕机宜，数千里外，未敢悬度。至其梗概，略具于治擒寇一篇。谨撮大端，列为条目如左。曰：养人才，广垦田，兴屯政，治擒寇，澄吏治，厚民生，筹海防，挽时变。虽

^① 王氏之学即明代哲学家王守仁的学说。他认为为学“惟求得其心”，“譬之植焉，心其根也”。

其间草野臆度之言不乏，而论当今要务，似不外是。言辞芜拙，字迹粗劣，伏惟恕而察之，不胜惶悚冒昧之至。门下晚学生薛福成再拜谨上。

养人才

古之取士者，或以德进，或以事举，或以言扬，三者兼用而不偏废。隋唐以降，始专尚考试，然其间自岩穴显者^①，犹或有之，又特设制科以待非常之士。明初至今，制艺日重，得人之涂，一归之甲乙科。其初文风浑朴，期于明理而止，故凡名贤硕德，与伟才异能之思自表见于时者，亦往往由之以进。然自是不就考试之人，以事举者，固属寥寥；以德进者，更阒然无闻矣。近十数年来，潢池不靖^②，朝廷博求贤才，大臣举荐，率不次擢用。于是智略辐凑，虎臣辈出，四方瑰俊，雷动云合，以赞中兴之运。是岂无术以致之哉？盖由朝廷能破千载之成格，而节下以忠孝文武为之倡，又复虚怀宏奖，振古罕有。故一代人才，闻而兴起，用以截乱夷艰，而惟节下之左右之也。今巨孽已平，海内渐以无事，英俊无由自效，士之奋迅求试者，复相率而入于科举。科举行之既久，其法不能无蔽。盖学士大夫以制艺相切劘，馀五百年，至于今陈文委积，剿说相仍，而

① 岩穴：山洞。《汉书·司马迁传》：“身直为闾阎之臣，宁得自引，深藏于岩穴邪？”后用来指隐居之处或隐者。

② 潢池，即天潢，本星名，转意为天子之池；此借指皇室。后以“弄兵潢池”为造反的讳称。

真意渐泯。取士者束以程式，工拙不甚相远。夫以工拙不甚相远之文，取决于有司一时之爱憎，加以贪常嗜琐，意见各异，而黜陟益以难凭。遂使世之慕速化者，置经史实学于不问，竞务为浇劫浮剽之习以弋科第。魁硕之儒，皓首而不遇者，比比是也。然则欲救科举之敝而收遗逸、养人才，莫如征辟与科举并用。大凡以今日天下人才计之：其见收于科第者十之二，其见收于军营及一切保举者十之三，其沈抑迍邅^①而不获一用者，犹十之五。节下诚博访而慎择之，若德行纯懿，若经术精深，若吏治明娴，若邱园高蹈，若练习名法，若谙晓韬铃，若干略过人，若文章希古，其他茂才异等，有一长一艺，堪施实用者，不拘一格，取其见闻所及，或素有时望者荐之朝，复奏之天子，飭内外大臣各举所知，仿国初举博学鸿词例，召试大廷，量才录用。然后著为成法，不时举行。如是则贤才无遗逸之患，可以辅科举所不及。而前此空疏之弊，亦且渐以转移。夫科举虽敝，其法固难变革也。若但云振文风，新士习，又非一人所能主其权，一日所能蔽其功也。节下负知人之雅鉴，昨者凶竖干纪，既以之收召英豪，奏不世之奇功矣；今复为国家扶植元气，以振耸天下人之耳目，当必有度越千古者。盖斯事体大，非节下之德之力，不能成此举，亦无复有能胜此举者矣。伏惟及时加意焉。平居所作《选举论》二篇，谨附上。

^① 迍邅，谓处境困难。

广垦田

江南衍沃称天下，顷更丧乱，民死者不可胜数。其颠沛饥羸仅存之民，或无以为耕，耕亦不获。然则事势至此，虽天时大和，灾稔不作，而甘雨下注，常委为沧海之波，民固且拱手待尽于沟壑之间，而莫之拯也。时事之可忧，孰甚于此？虽然，福成窃观古人之良法美意，垂为百世之利者，往往转出于丧乱之馀。今沃野千里，旷弃不耕，诚因此时修明开垦之政，则所谓百世之利，可得而建也。开垦之政有二：曰民垦。民之有业而无力者，借以籽种、牛具资之耕，其旷绝无人之处，宜益募他州之人愿耕者，不计多寡，三年以后升科，给为永业，则亦可以少充国赋；曰官垦。籍无主之田，官自募民耕之，定其租，视民间租岁减什一二，数岁之后，当有成绪。且近世官吏仰食县官，县官所费不訾，而受者常病其薄。宜仿古禄田之法，以公田给州县，代其俸廉，大县以千五百亩为则，小县减三之一。大率银万两，可垦田五千亩。明岁俾自耕，以其租易耕他处，三岁可得万五千亩。若以十万金为之，则得十五万亩，是百县令之食也。若以二十万金为之，则祭祀役食等项，地方之费，岁省大半。每行省筹二十万金，核之经费不为多，而百世之利建焉。夫自古公田之法，往往不数十年而敝者，以官为经理，不若民之自为经理也。今以之代俸廉，及充州县公费，则州县之重之，必不后于民之自为经理也。节下哀怜百姓，招流亡，给籽种，一切条法，简而易行，若

福成之愚，岂能赞一辞哉。然而经费不足，是以开之不广，请即见闻所及，就其一二言之，似亦有宜加之意者。今苏、常、松、太各属，每县各有善后局，局数十百人，平居皆习为奸利，至无行义之辈。其中或有稍公正者，上官使主其事，亦以乡党亲故，莫能相禁。以故岁糜巨万，报销于上官，不啻以一为五。道路嗟叹，以为不如其已。由此观之，孰若悉罢此辈，以节浮费而济事实哉。去岁不登，苏、松差愈，常属惟锡金下种较多耳，然亩收仅数斗。田捐之令，亩四百；差役费二百，民不得食。而州县苛督，甚于钱漕，不知有以闻节下否？且钱六百，固一二亩种麦资也。麦熟后资以种稻，亦一二亩。今独以锡金言之，田捐为五十万亩，则其所失岂可量哉？伏惟推此类汰去之，则官民并垦之利，庶可得而议焉。

兴屯政

自巨猾倡乱以来，当事者练兵募勇，奚翅数十百万。其转输之费，筹济之劳，几于无孔不入，虽倾天下之力以供之，犹岌岌乎有不继之势。赖节下威力，数年之间，贼巢尽倾，凶渠授首，而前日调集之兵勇，得以稍稍撤散。然就今之大势计之，残寇犹窃馀生，反侧时多未靖，则有不可尽撤之势。孤子者既无家可归，骁健者或挺而生变，又有不能尽散之情。若聚而使之坐食，则长骄惰而滋事端，固非国家之利。况十馀年间，民力已竭，幸而稍获休息，岂能复用其力以给军食于无事之时。然则处今日而欲为善全

之策，不伤财，不累民，不弛备，并以开数百年富强之业者，盖非讲明屯政不可。夫屯政之有利无弊，自古然矣。三代井田之法废，惟唐府兵，^①得寓兵于农遗意。府兵坏而天下始有养兵之费，后惟明之卫所，颇合于唐之府兵，人各授田二十亩，纳租六石，使之且耕且守，法至良也。洎乎中叶，边将得请官田自便，且训练不明，仅责以纳租而止。于是有军之名，无军之实，而军卫之法坏。今东南数省，户口耗损大半，往往有田多人少之虞，势必不能遍垦。为今之计，宜籍各省民田之无主者，官为开垦；籍各省未散之勇丁，其愿受田者，每丁给田数十亩，官为相其便宜，理其经界，开其水利，给其牛种，三年之后，每岁纳租数石，授为永业。俟经费有余，往往创筑城堡，仿明卫所之制，为设守备、千总以训练之，三时务农，一时讲武。每省特设一屯田总兵，而统辖于提督。如此则江淮数千里要害之地，布置联络，隐然有指臂之势，一旦有警，人人各自为守，无复向者溃逃故习。行之有效，则推之而闽浙、而湖广、而山东、河南，莫不循是行之。此制一定，国无转运之费，而骤获胜兵，民无供给之劳，而藉资扞御，营伍不以屯聚而滋他衅，地方不以备弱而召他虞。又以位置此无业之勇丁，而为天下多垦数十百万之田，则每岁增天下之谷，无虑数十百万石，所入之租，兼足以贍国用。国家数百年富强之

^① 唐代府兵平日务农，农隙教练，征发时自备兵器资粮，分番轮流宿卫京师，防守边境。

业，实基于此。至其经费之所出，则暂借厘金一岁，予以措理而有馀。方今兵事渐戢，而厘金未遽停者，正以勇丁未能尽散也。诚假一岁以入，以为斯民建不世之利，一岁之后，勇丁各业其业，而厘金可以渐裁。此乃两得之术，即明告四方而行之，奚不可者？或曰：“今之勇丁，习于酣豢，倦募之而不相应，则奈何？”曰：凡事之集，难乎其始，是在劝其为倡者而已。劝之奈何？凡勇丁之始应募者，其授之田，必肥以广；给之资与籽种，必厚以倍。使勇丁慕耕种之利，势将奔走而归之。万一勇丁应募者少，则相机渐散勇丁，而别募游民以授田，暇则以兵法部勒之，何患屯田之不广欤？虽然，天下事莫亟于人才。更愿于道府州县中，无论在任候补，令各条陈屯务利病；取其言之洞中窾要，斟酌时宜者，召之面询得失；择其才可用者，委以综理屯务；又于行事之际，察其能否，而专其责成。则异才必出，而实政可兴矣。

治捻寇^①

自来制寇之术在任将，而治捻之道在任吏。昔日之治捻，宜先任吏而后任将；当今之治捻，宜先任将而后任吏。方捻寇之初起也，不过饥穷乌合之徒，所至遮略剽杀，过城寨不攻，遇大军则走。斯时得一骁将，属以劲兵，虽数十百万之众，立可摧散。然今日散为民，明日复起为捻矣。

^① 捻寇即捻军，太平天国时期由捻党转化而来的北方重要农民起义军。

即击其众而尽灭之，而深恶民之弄兵者，复接踵而起。盖擒寇之难治在此，此其故何哉？山东、河南数省，吏治疲刵已久。民贫俗悍，习于为非。善抚之则皆民也，不善抚之，则皆擒也。故绝擒之源，首在吏治。昔龚遂守渤海而莠民复业，张陵守广陵而巨盗乞降。本朝乾隆季年，黔楚苗匪蠢动，福文襄王以天下全力临之，迄于无功以没。傅鼐一同知耳，用雕剿之法，卒以平苗。此其已事可见，故曰先任吏而后成将。今之治擒也则不然。凡凶顽狡悍之民，猕薙略尽^①。其漏网捕窜者，不过一二桀黠之徒，为之渠率，诳诱驱胁，以与王师鬪，不幸使之一再得志，众忽慄悍，几类流寇。语曰：“涓涓不塞，将为江河。”^②今已不啻涓涓矣，然及今治之，犹可图也。图之之机，宜檄直隶、山东、河南督抚坚壁清野，谨守封略，各以其兵策应。节下以大军蹙之，分遣诸将，或截击，或迎击，或断其道，或捣其坚，或袭其辎重，或披其形势，或攻其无备，或散其胁从，彼一二凶渠之首，旦夕可致麾下。复责各省之吏，捕余孽，安反侧，抚创痍，则擒寇之踪迹，一举荡尽。然后澄清吏治，永杜复起之渐，故曰先任将而后任吏。虽然，论今之所以平擒者，岂更无当务之策乎哉？福成盖尝遥揣事机，而略举其要则有四：一曰汰冗营。夫擒所以旋灭旋炽者，岂不以大军乏犄角之援，各路鲜堵截之兵乎？兵少援绝，而邸

① 薙（音ti）：除草。猕（音mi）：遍、清。

② 见《孔子家语·观周》。

帅以孤军疲于奔命，岂不以冗营为之累乎？何则？北方之号能战者，张曜、陈国瑞二人耳。其他屯戍诸军，支饷非不广也，核其额，则十人不能三数人，又未必可用。委员以数百计，类多歌呼饮博以待奖叙，其保举之优，薪水之费，倍于他处。故凡游河南者，率视为牟荣利之捷径。数年以来，未见其能杀一贼，克一寨也。今欲汰此诸军，当自汰冗员、清浮额始。诚节此诸军之饷，可益精兵一二万，复选健将部勒之，则大军多犄角之助，各路奏堵截之效矣。

一曰用铁骑。尝闻贼渠悍者，在南有水师，在北惟铁骑，此实地势使然。曩者大平在九固回，在山谷沮泽，碍于驰骋，以致失利。今贼已离其巢穴，自鲁、豫、燕之境，此皆平原旷野，非神速不为功。宜广调劲骑，每与贼遇，纵骑蹂之，贼虽众，可殪也。或曰：然则贼避我而入山谷沮泽，则奈何？”曰：以骑兵列在要隘，必与之战；数月以后，彼食将尽；于是广设方略，诱其支党，俟其稍懈，则步兵蹈瑕而入，穷捣其巢；而以骑兵擒斩其逋窜者，此必胜之术也。

一曰离叛党。今闻贼渠悍者，并力拒我，故其势强。然彼非有骨肉之亲也，非能一心协力而永无猜贰也。诚宜察贼渠之可降者，遣间招之，非诚纳其降也，特使内相疑忌，腹心自溃。然后势分力弱，而不至为大患。否则恐其中有雄桀者，一旦魁其曹而并其众，将不可复制矣。一曰

① 曩（音nǎng）：以往、从前。

招降附。夫贼中渠魁^①，皆必死之寇，固决不肯就降。国家亦决无赦之之理，赦之亦必为变。若其馀，固胁从耳，诬误耳，急之则为贼死，赦之则可以散其党而孤其势，此易见者也。且招降之所以不易言者，惩其诈也，惩其降而复叛也。诈不诈，明者能辨之。其诈也，暂羁縻之，乘其懈击之，虽歼之可也；其非诈也，则固纳之矣，犹虑其叛也，归其老弱，籍其强壮者，分隶各营，以古者以一隶五之法治之。其不从也，廉得其为首者，诛之可也。此所谓以剿为体，而以剿抚互施为用者也。昔王阳明先平江西贼，或先使人招抚，俟其往来犹豫，争论不决之间，乘间急击；或令人说，其酋长诣营，至则径置之狱，而兴兵击灭其巢，功甚神速，而又不留馀患。今之以抚为剿，亦当如是而已。凡此四者，皆福成遥为臆度之辞；又所居僻远，传闻未必实，恐今事势已有变更者。福成故就数月前之闻见，略道其梗概如此。伏惟采择而用之，幸甚。

澄吏治

欲举天下创残疲敝之民而致之休和，曷先乎？曰：先之州县。今州县有大弊二：曰捐班广也，门丁横也。有大要一：曰考课行也。二弊不去，一要不审，虽伊葛不治^②。

① 渠魁：首领。

② 伊葛即伊尹、诸葛亮之合称，此二人均是中国历史上的名相。

今之由捐例^①进者，推其本意，不过以官为市而已。夫至以官为市，则剥民以自奉，损国以肥己，固其所也。若曰姑试之职，待其有过，大吏按劾而罢之，是以土地人民为墨吏尝试之具也。纵使旋用旋汰，而官终不得其人，其弊也，与无官等。今之病之者，不得已而用考试以困之，又非正本清源之道也。彼以捐进，庸陋固非其咎，若纳其赏而考黜之，是欺天下以罔利也。考而仍用，谋国之道，不当用此具文也。是故，与其考之于后，不若停之于前。或曰：“然则当如国用不足何？”曰：国用之足不足，不在捐例之行不行，而在制用者之权其出入。且今之捐例益广，而国用益亏者，何也？天下多一贪污之吏，即多无穷失业之民，以致啸聚而为变，比其剪除，而糜饷已巨万矣。又或亏损公顷，动以万计，逾其所捐数倍。各省试用之员，往往人浮于缺，大吏曲为调剂，辄授以无足重轻之事，其薪水之费，固已不赀。然则捐例虽若于国用有济，实乃赢于此而拙于彼耳。稽之治道既如彼，筹之国计又如此，是又何苦而不罢之哉！伏望奏减捐例以为停捐之渐，权定限制；捐杂职，许实任；捐正印，止虚衔。杂职中能称职者，亦许随例升转；其前已捐而在官者，亦严为考察而去留之。一二年后，军务稍平，度支稍足，然后决然停止。若其济国用之方，又在制禄田以代俸廉，每岁节俸廉以供县官，计

^① 捐例，亦称“事例”。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规定京官自郎中以下，外官自道台以下均可按定价购买。

其所贏，当不减捐例所得。其说固略具于开垦之篇矣。或谓：“今之正途，大抵不晓世务，而操守不愈于捐班^①，甚或一莅职任，亦有以受赇闻者。”曰，是则然矣。前论征辟与科举并行，盖欲以振兴人才，转移士习，未尝无以救正途之敝也，安得以正途之敝，遂谓捐班不当止哉？若夫门丁之设，尤为州县之蠹。今州县官一莅任，则僮仆什伯为群，无不褊衣甘食，肆为奸偷。其举财赋狱讼而悉归之者，名曰“门丁”，自丞尉杂职，皆仰鼻息而食。把持诞漫，玩其官于股掌之上。官或至死不悟，或自慰曰：“彼权固重于我，虽智者无如何也。”噫！是犹布荆棘于门，张网罗于要道，而私忧其出入之不便我也。试问罗网荆棘，谁设之哉？推其设此，大端有二：其偷者不事事，则举官事尽委之，可以安而尸厥职；其尤不肖者，倚为奸利，外使张其爪牙，而内实与为首尾，一旦发露，则托门丁为解，而已可以免于戾。积习相循，末流益甚。虽稍有智识者，亦徇于俗例而不敢废。且每赴一缺，则上官之荐，纷然四至，彼属吏安敢不遵？今胡不取各省之案牒阅之，凡州县被民控诉者，大率多以门丁为辞，则其横可得而知也。宜严禁两司以下，毋得以门丁为荐，州县毋得辄用；用而被控者，该丁以法论，官罢黜，著为令。又尝论之，汉郡县得自辟曹掾^②，一时文学才俊之士，皆出其中，故能相倚如左右手。今更之以书

① 捐班即用钱买来的官，区别于通过科举考试而做官的所谓“科班”。

② 曹、掾均指古代州郡所置的属官。汉以后较重要的长官多由自己辟举掾属，分科办事。

吏，吏习猾，官孤，益无恃。似宜渐复古制，令州县得辟士之贤者为吏，优其礼而以次升诸朝。即不能为此，宜且仿古三老孝弟之制^①，乡举其贤能，以宾礼礼之，使为教化之倡，而任以保甲之事，则催租捕盗之吏，可以不至乡里。张官置吏，所以为民，又安取此阉茸委琐之辈，与之共天下哉。二弊既去，乃严考课^②。考课之行于州县，始在慎其选，继在养其廉，究在尽其才，三者备而后考课之法，不劳而立。今州县选补，吏部拘之以资格，大府私之以爱憎，不能为地择人久矣。软美巧滑，工于趋避者，则举世以为明白公事。其翹然名能吏，通省不一二数者。虽凡事勤敏，往往可观。至于利源所在，征取无艺，亦不后于他人，尚安望其抚循民瘼，变化风俗哉。今宜先择悃悞无华，有实心及民者畀之县，有干略者次之。然其要在两司得人^③，两司得人，则州县得人矣。虽然，州县之俸廉，大者无过千两，而所谓杂款陋规，及幕友修脯，与一切办公费，奚翅倍蓰。如是而欲其不妄取于民，不可得也。州县无清廉之操，而欲其公且慎，明且勤，不可得也。方今之务，莫如严饬司道以下，革陋规，除杂派，限幕友修脯之制。其办公费，令各县筹经费之羨，渐置公田。俾长民者，不拮据于财用，而州县始有清廉之吏。然尤不可不尽其才也。今

① 秦置乡三老，汉并置县三老、郡三老，帮助县令、丞、尉推行政令。

② 考课：古时按一定标准考察官吏的功过善恶，分别等差，升降赏罚，谓之“考课”。

③ 两司：清代对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和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的合称。

郡守权不敌汉县令，县令权不敌汉户贼曹。县令自笞杖以上，不能专决，动须关白上官。其究也，上下以空文相束，虽贤者亦奉法救过之不贍，而不肖者反得以容其弊。又或以燕齐之人仕滇黔，瓠闽之人仕秦陇，语言不谐，土风人情不悉，孑身万里之外，叹息而思归，甚者疾病攻之，尚安望其能修职业哉？比其稍习而安之，则迁调而去矣。候补之员，委署一缺，常者一年，暂者数月。又有权缺之肥瘠，不时更代，虽授实缺者留不遣，而故使无缺者代之，名为调剂。授受之际，交代纠结难清，黠吏因缘舞弊。官知任事之不久，往往于数月中肆为掊克^①，以蓄数岁代缺之费。上下苟偷，岂不甚哉？今欲整饬吏治，莫如尽州县之才。欲尽州县之才，则必重其职任，涤去烦文，务持大体。又为奏明定例：凡五品以下任外任者，越省无过三千里；任实缺者，尚无大故，必满任；试用之员，非稔其才勿遣，遣之而能举其职，勿遽撤。如是，始可以尽其才矣。慎其选，养其廉，尽其才，三者无一缺，然后举当今要务责之，任其所为，而徐考其成，卓异者不次优擢，以风厉之。且宜仿有明及国初旧制，内转为御史及部曹，其阘茸^②脏污者，惩之勿贷。考课之行于州县者如此，而又无捐班以参之，门丁以蔽之，则贤才孰不劝？不肖孰不诫？吏治蒸蒸，百废具举，凡所以复创痍为富庶，化凋敝为敦朴者，不外是矣。

① 掊（掊，音póu）克：掊克指聚敛贪狠；也指聚敛贪狠之人。

② 阘（阘，音tà）茸原指门下小草，引申指地位卑微或品格卑鄙的人。

厚民生

国朝兵制：自京都满蒙汉八旗，及各行省要地，屯驻旗营之外，则有绿营，分隶督抚河漕及水陆提镇各标，为额至六十余万人，约支俸饷二千万两，去天下岁入之半。迁流既久，积习益深，乾隆以后，日形羸敝。虽叠降明旨，饬所司实力整顿，而地广势散，颇难著效。嘉庆年间，荡平教匪，已大半仗川勇之力。咸丰初年，粤匪披猖，所至无不摧靡。节下深鉴绿营之不足恃，于是倡募乡勇，以戚元敬氏束伍法部勒之，久之皆精练无敌。各行省亦渐仿效之，而湖南勇营之旌旗，几遍海内。最后传其规制，别募淮勇，而淮军复兴，用此诛锄群孽，转危为安。然十余年来，用饷无算，所以能撑持全局，弥缝缺乏者，则东南数省，抽收百货厘金之功也^①。向使舍此一孔，其何以饷数十万嗷嗷待食之军，而遏方张之寇焰？然则天下当有事之时，国计之不能不藉资于厘金者，势也。虽然昔之创为此法，不过济变一时而已。若军事稍纾，循是不革，非所以厚民生而培元气也。今巨患削平，跳梁之寇，非复前日比，似可斟酌盈虚，先减厘金，渐减渐少，以至于尽裁，薪以濯痍嘘枯，稍苏民困。夫厘金每百分而取其一，征诸商者，似不为多。然以福成所亲见者论之，即如江北淮扬等处，自江

^① 厘金，亦称“厘捐”或“厘金税”。旧中国的一种商业税。1853年开始实行，初为百抽一，百分之一为一厘，故称“厘金”。

宁藩司所设厘局外，有漕捐、河捐、抚捐、粮台捐，及清淮筹防、各府筹防、各县镇团练之捐，收数混淆，名目诡寄。三四百里间，卡局不下数十。是殆征其十之二也，而吏役之勒索，司事之需索不与焉。彼为商者工于牟利，则仍昂其价于货物，而小民之生计日艰。且今日之能倚厘金为巨饷者，以前日未始有厘金也。若上下既视为定额，则将有必不可少之经费，待之以济，加以官吏侵蠹其中，法久弊生，此法即为徒设。一旦复有猝然意外之变，将筹何款以应之？故减之裁之，所以为异日缓急计也。然今之所以决不能裁者，何也？闽粤残寇^①，尚未殄灭，兼以群捻纵横，苗回煽乱。凡诸勇营之得力者，方且征调四出，奔命不遑。是饷项有不可减之势，即厘金有不能裁之势。即使诸寇渐平，而弹压土匪，镇守边陲，亦非勇营不可。然则厘金终不能去乎？窃谓勇营之所以不能撤者，以绿营之不足恃也。绿营不足恃，而兵额仍未稍减，坐糜二千万金之岁饷，病民病国，莫此为甚。及计臣枢臣，未尝筹及，疆吏言官，未有论列者，则或牵于旧制不可改之说，或懵于中外之利弊也。节下拳拳于爱民忧国，既已洞晰其原矣，似宜于此时建议，普减天下绿营十分之四，可省岁饷八百万金，以养勇营，即可先减天下厘金十分之六。盖各省要害之地，既有得力勇营填札，疲弱之兵，不妨汰遣，所留六成，以供守汛护饷解犯之用，可敷分布。汰兵如有可用，或

^① 即太平军残部。

拨归屯田，或招入勇营，亦尚不至穷饿。一转移间，而国用不耗，商民不困。盖食之者寡，则用之者舒。《大学》“生财之大道”，《易》之所谓“以美利利天下”，《书》之所谓“利用厚生”，不外是也。抑或别有远图，必暂假厘金为区画，此乃与福成屯田之议相合。然当明定限制，布告四方，以一年二年为度，截然不稍延缓，始无流弊。夫用厘金以兴屯政，数年之后，屯田毕理，兵饷大减，而厘金固可尽裁也。兴一利，除一弊，二者交相为用，又在断而行之耳。

筹海防

方今中外之势，古今之变局也。推其所以启之者，有天事，有人事。古者九州之内，各殊土而异宜，有隔数百里不相通者。然而天地之风气，日久渐开，山川之径涂，习行则便。自秦一天下，至汉而收滇、粤，置河西，至唐而通回纥、定天竺，至元而服俄罗斯、取西域，恢拓可谓极广。浸寻迄于今日，西洋诸国，航海通商，凡欧罗巴、亚墨利加数十国之人，颡颥并至乎中国，而以英吉利、俄罗斯、法兰西、米利坚四国为最强，于是地球几无不通之国。是其所以然者，天也，非人之所能为也。西人之始至也，非敢睥睨中国也。曩者禁烟之役^①，既以发之骤而启衅；衅作矣，彼犹惧天威之不测，未敢狡焉以逞也。忽而罢兵弛禁，

^① 即1840年鸦片战争。

且偿其货以骄之；继而倏战倏和，茫无成议，以致战则丧师，和则辱国。于是中国之情实，历历在西人之目，索地索币之师，纷然狎至，而粤寇乘之以起。洎乎庚申之岁，遂敢合从内向，直犯京师。既不获，已而讲解以罢，而中外之大防裂矣。是其所以然者，人也，不可尽委之天也。居今之世，事之在天者，宜有术以处之，然后不为气数所穷；事之在人者，必有术以挽之，然后不为邻敌所侮。窃尝默审乎天时人事之交，其道历久不敝者，要在知和之不可常恃，一日勿弛其防而已。防之之策，有体有用。言其体，则必修政刑、厚风俗、植贤才、变旧法、祛积弊、养民练兵、通商惠工，俾中兴之治业，蒸蒸日上，彼自俯首帖耳，罔敢恃叫呶之故态以螫我中国。言其用，则筹之不可不豫也。筹之豫而确有成效可睹者，莫如夺其所长，而乘其所短。西人所恃，其长有二：一则火器猛利也，一则轮船飞驶也。我之将士，闻是二者，辄有谈虎色变之惧。数十年来，瞠目束手，甘受强敌之侵袭而不能御。不知西人贪利，彼之利器，可购而得也。西人好自炫所长，彼之技艺，可学而能也。为今之计，宜筹专款，广设巨厂，多购西洋制器之器；聘西人为教习，遴募巧匠，精习制造枪炮之法；特选劲队，勤演施放枪炮之法。又仿俄人国子监读书之例，招后生之敏慧者，俾适各国，习其语言文字，考其学问机器。其杰

出者，旌以爵赏。兼仿造火轮船数十艘，平居则以运漕^①，移卫所各官及漕标之兵以隶之，既以护运漕粮，实以练习海道，暇则兼操战法。若是，则彼之所长，我皆夺而用之矣。世之议者，或愤中国积弱，以效法西人为耻。不知工之巧，器之良，乃造化日辟之灵机，非西人所得而私也。夫巫臣教吴以弱楚国，武灵胡服而灭中山。安知中国人之才力，不能驾而上之乎？若夫乘彼所短，则有合并之说，有分离之说，有牵制之说。何谓合并？曩者彼聚而攻，我分而守，我防粤则彼攻闽，我备浙则彼扰沪，比援师调集，而彼又直指天津矣。此中国所以惫也。炽千斤之炭于通衢，人皆望而畏之，分为千百处，则一熄而无余焰。苟扼其要，则每省所注意者，不过一二口。又恐其力不厚，则以福建益广东，以浙江益江苏，以奉天、山东益直隶，一切兵权、饷权、用人之权，皆畀之督师大臣。彼数万里远来，兵不众而粮不继，一不得势，则心孤而气绥矣。此分者合之之效也。何谓分离？夫英、法、俄、美四国，势均力敌，其先皆有仇隙，非能始终辑睦也。昔英吉利之初发难也，俄有可联之势；美有效顺之情，中国非但漠焉置之，抑且驱之激之，使协以谋我。闻英人之攻广州，强撻法、美二国，迫入大沽，则俄、法、美三国皆从^②。三国非有大憾于我也，

① 运漕即漕运，本意指水路运输，后专指中国历代政府将所征粮食解往京师或其他指定地点的运输。起源于秦始皇，辛亥革命后废除。

② 详见第一次鸦片战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实况介绍，可见俄、法、美诸国态度的变化。

盖知我之无可助，而实可侮也。诚能于发难之始，察诸国之无恶意者，先啖以微利而退之，或竟密与联结，俾为我助。如是庶足披敌之党，届时必有显为排解者，有隐为阻止者，此合者离之之效也。何谓牵制？今各国来者日益多，则各口之商务日益盛。倘一国有衅，则告各国以商务停止，当由启衅之国偿其利。又如英国有衅，则先以贸易之停止，谕其商民；法国有衅，则先以教民之不能安居中国，谕其教民。彼商民、教民必不愿也。而我仍默示怀柔，动其慕恋，如此则归曲于敌，使之彼此怨尤，上下乖迕，其势不顺而谋必败。此以各国牵制一国，以商民、教民牵制彼国之效也。夫既夺其所长，又乘其所短，二者虽未足以尽海防之至计，而所可豫筹者，要不离乎此。若夫伐谋伐交之策，练兵练将之方，其措注于临事者，本无定形，又非可豫为揣度矣。

挽时变

自泰西诸国立约以来，大抵于中国有利有害。利则通有无以裕税饷，得利器以剿强寇，此中国之大益也。害则洋烟不禁^①，渐染日广，传教通行，许其保护，此中国之大损也。窃尝较其轻重，要其始终，则所谓益者什一二，损者什八九，其利害之不能相抵也明甚。盖洋烟盛，则挠我养民之权，洋教行，则挠我教民之权，教养无所施，而国

① 这里讲的洋烟即鸦片。

不可为国矣。此时局之变之尤可忧者也。虽然，和约一定，往往数十年不改，自非国势日张，事机绝顺，无从轻易更张。居今日而论洋烟洋教，苟不知时变而严绝之，势所格也；若默揆时变而善挽之，事所急也。今天下自衣冠至于负贩，见困于洋烟者，不啻五人而一，是举天下之人而废其五之一也。而民之趋之者，尚无穷期，一染其瘾，终身难去。且嗜之者亦自不愿去。洋人布此鸩毒于中国，弱人精力，锢人神志，其害过于洪水猛兽甚远。然而持不禁之说者，曰恐扰民也，挑衅也。不知严禁吾民，乃中国自主之权，不必如曩者焚烟之举也。法宽而简则易行，不必如曩者斩决之罪也。治其源者，在绝中国人之嗜。嗜之无人，彼之烟自无所售，而来者益寡矣。且今中国之嗜洋烟者，非其性之本然，其弊在不知诟病，而视为适俗便身之具也。则莫如厉之以耻，而止之以渐。夫天下风气之所成，恒在仕宦衣冠之地，欲民之改旧习，而不先于其所慕效，未有能改者也。诚宜奏定条例；凡京外大小文武各官，嗜洋烟者勒致仕，不改则永不起用；每届京察及大计^①，书之于考，为课殿最之准的；其各官幕友，各局绅董及书吏等，犯者辄黜之，不黜而举发，坐其官以降级处分；凡士子之应州县试者，责廩生保之^②，始许投考；诸生之应科举者，令学

① 京察，明代考核京官的制度，六年举行一次，清代改为三年。大计，明代考核外官的制度，清仍其制，三年举行一次。

② 廩生，科举制度中生员名目之一，从政府领取生活补贴并有义务，职务是具结保证应考的重生无身家不清及冒名顶替等弊。

官察犯者停考^①，能改者录之；有司巡行闾里^②，见有设馆诱人与嗜烟者，枷示于市，屡犯者屡枷示焉。凡此皆所以示民耻辱之端，使之知至可贱恶者，莫洋烟若也。况人情所惮，在妨其进取之路，而阻其衣食之源，苟非甚不肖者，孰不速改。夫所行至约，而处之甚宽，使民自渐摩拔濯而改其习。天下少一嗜烟之人，即多一有用之人。天下少一购烟之费，即少一贩烟之利，彼洋人将爽然自退。即中国种罌粟之区，亦且渐化为黍稷桑麻之地矣。抑又思洋烟之入口者，虽暂难明禁，不妨援西国重榷烟酒之例，酌加十倍税厘。非特可济要饷，且使民惮其价之昂，则嗜之者渐减，是又不禁之禁也。至于洋人传教，载在和约，中国既有保护之条矣。然彼所谓天主教者，惯以微利啖我愚氓，一入彀中，即为之致死而不悔。教士动辄干预讼事，偏护教民，挟制州县。而应之者，或失之亢激，则彼驶兵船以肆恫喝，于是自疆吏以逮州县，凡事牵涉教堂者，莫不曲意迁就，苟求无事而止。民知未入教者，受教民之侮而无所控告；一入教，则恣横而莫之能制，自是趋之者如水赴壑矣。然福成欲稍遏传教之焰者，非谓违约，乃行约也。约章谓安分传教习教之人，不得刻待禁阻。是不安分者，理难保护矣。又谓如系中国律令之事，仍由地方官照例惩办。是教民犯法，治之勿贷，非教士所能干与矣。今诚多选廉

① 学官，又称“教官”。指旧时中国主管学务的官员和官学教师。

② 有司，古代设官分职，各有专司，因称官吏为“有司”。

公有威，明达大体之良有司，分布州县，凡教民之倚势犯法者惩之，教士之妄问公事者拒之。彼知入教不能求胜于平民，势当稍沮。惟判断公允，不违约，不刳法，宜有以折服其心。又当不动声色，勿鼓众民虚恟之气以激事变，但求政平讼理。且渐扩贫民生计，毋使为饥寒所驱，则传教者无权矣。若夫默抑教民进取之涂，似可稍参治嗜洋烟之法，而勿露其端倪。苟才智者不入其中，则天下事犹可为也。夫洋教、洋烟骤入中国者，气运之变也；斟酌情势，默寓挽回之术者，君相之柄也。伏惟节下出当大任，力救时艰，愿及今日为风俗人心计，为中国贫弱忧，以此二事闻天子，密抒远谟，通行各省，画一办理，实万世之福。

伯兄抚屏云：“阅议郁发，灏气孤行。尤可宝者，另有一种朴茂神味，洋溢行间。古文家无此宏迈，策论家无此精深。”

同治乙丑之夏，科尔沁忠亲王战没曹南，曾文正公奉命督师，北剿捻寇，并张榜郡县，招致贤才。余上此书于宝应舟次。文正一见，大加奖誉，邀余径入幕府办事。是时幕府诸贤，为剑州李榕申甫，嘉兴钱应溥子密，黟程鸿诏伯尊，宣城屠楷晋卿，溆浦向师棣伯常，遵义黎庶昌莼斋。文正语申甫曰：“吾此行得一学人，他日当有造就！”又谓余曰：“子文长于论事，年少加功，可冀成一家言。即与伯常、莼斋同舟，互相切劘可也！”厥后，余从公八年，前后出入幕府共事者三十余人，多一时贤俊。余颇得晨夕晤谈，以扩见

闻，充器识，皆文正提奖之力也。按《求阙斋乙丑五月日记》云：“故友薛晓帆之子福成，递条陈约万余言，阅毕，嘉赏无已。”余在幕府，尝见文正手稿。近阅湖南刊本，归入品藻一类，而讹为伯兄抚屏之名。想由校者之误，恐后世考据家或生疑义，故并及之。辛卯九月自识。

（选自《庸庵文外编》）

应诏陈言疏（1875年）

奏为应诏陈言，仰赞高深事。窃臣伏读邸钞，钦奉慈安端裕康庆皇太后、慈禧端佑康颐皇太后懿旨，谕令内外大小臣工，竭诚抒悃^①，共济时艰，仰见圣朝博采谏言之至意。海内臣民，同深钦仰。恭惟皇太后、皇上勤求治理，纶音初布，即停三海工程，斥去宫中纷华浮丽之品，申明列圣家法，所有不安本分之太监，分别斥革定罪。用御史李宏谟之奏，将内务府大臣立予革职。九卿科道陈言者，莫不立蒙褒答。凡所谓节用爱人之政，亲贤远佞之谟，皆已实见诸施行。四海向风，翕然称颂，孰能复有遗议。然臣所欲进其愚悃者，则慎终如始，日新又新之说也。伊古圣人造詣愈高，则克治愈密。盖节俭之至，而仍虑及耗费；清明之至，而仍虑及壅蔽；忧勤之至，而仍虑及因循。惟谨之于微，防之于渐，而后圣德无纤毫之累。治本既懋，上理可臻。若夫用人行政诸事宜，莫外乎遵循成宪。然必有

^① 抒悃：表达或倾吐真心诚意的见解。悃即真心诚意。

修明之术，有补救之方，有变通之道。臣窃就管见所及，谨拟治平六策：曰养贤才，肃吏治，恤民隐，筹漕运，练军实，裕财用，均期有裨实务，稍济时艰。如蒙圣明俯赐察核，天下幸甚。

世运之所以为隆替者何在乎？在贤才之消长而已。夫天之生才，恒足以周天下之用。然而贤才有盛有不盛者，则培养之道为之也。曩者大行皇帝御极之初，皇太后殷殷求治，博访贤才，大臣荐举，每多不次擢用。于是硕辅盈朝，勋臣辈出，四方瑰俊，奋袂崛起，以赞中兴之运。是岂无术以致之哉？盖由虚怀宏奖，振古罕有，而又不拘一格，随宜器使，用能光显丕业，至今犹被其庥。迩年以来，奖进之贤才，似稍不如前矣。窃恐数十年后，老成凋谢，继起无人，此事之大可虑者也。夫欲贤才之奋兴，必先培养于平日。培养之术，其要有三：一曰重京秩。自古设官，重内轻外。汉汲黯出守淮阳，则至于流涕；唐班景倩入为大理，则喜若登仙。此古帝王居中驭外，鼓舞豪俊之微权也。我朝颁禄，因明旧制。京员俸薄，不逮汉唐十分之一。又自耗羨归公之后^①，外官有养廉，而京官无养廉，人情益重外轻内。然其初升转犹易，京外两途互为出入，故供职者不以为苦。近日京员盼慕外放，极不易得，恒以困于资斧，告假而去，绝迹京华。其留者衣食不贍，竭蹶经营。每于

^① 耗羨：清赋税所征加耗在抵补实际损耗后的盈余。这部分盈余规定一部分归州县官吏所有，名“养廉”。所谓加耗，即赋税正项外的加征部分。

国家之掌故，民生之利病，不暇讲求，此京秩所以愈轻也。查乾隆二年，增京官恩俸，法良意美，度越元明。似宜略仿前谟，酌为推广，别筹恒款，普加京员养廉。筹款之法，宜取诸节省之饷项。方今滇黔关陇，次第肃清，勇营大半凯撤，将来所节饷需，合计不下一千余万。应查明各省停拨之饷，酌提十分之一二，饬令每岁解部，以备京员养廉之用。所费于国计者甚微，所裨于治体者实大。至若清要之选，当课以经世之具，勿专尚小楷之精，试律之巧，俾获讲求实用。其各部院保举人员，在圣明鉴衡不爽，随宜超擢以励其气，中外迭用以练其才。庶举世重外轻内之见，可以默转于无形。百年树人之计，在此举矣。一曰设幕职。伏查雍正元年，世宗宪皇帝命督抚保举幕宾，以彰激劝。谕旨有云，今之幕客，即古之参谋、记室，凡节度、观察等使赴任之时，皆征辟幕僚，功绩果著，即拜表荐引，彼爱惜功名，自不敢任意苟且。臣谨案我朝名臣，若方观承、严如煜、林则徐，近年如大学士李鸿章、左宗棠，始皆托迹幕僚，洞悉中外利病，故能卓著忠勋。可否略仿汉、唐、宋遗法，仰承世宗鼓励人材之盛心，准令各督抚奏辟幕僚。自京外官以至布衣，如有才守出群者，许即专疏保荐。视其本职，计资论俸，一体升转，无职者量加录用。行之稍久，必有闳骏之士出乎其间，此亦造就之一法也。一曰开特科。隋、唐以降，始专尚考试。然其时科目甚多，登进之途颇广。明初始专以八股取士，文风浑朴，得人称盛。今行之已五百余年，陈文委积，剿说相仍，而真意渐泯。取士者

束以程式，工拙不甚相远，而黜陟益以难凭。遂使世之慕速化者，置经史实学于不问，竞取近科闹墨，摹拟剽窃以弋科第。前岁中式举人徐景春，至不知《公羊传》为何书，貽笑海内，乃其明鉴。然则科举之法，久而渐敝，殆不可无以救之矣。我朝康熙、乾隆年间，两举词科，一时名儒硕德，及闳雅俊异之才，悉萃其中。文运之隆，远迈前古，非贤才之独盛于此时也。诚以大臣之举，非闻望素著者，不敢妄登荐牍。其与冥搜于场屋，决得失于片时者，迥不侔也。诚法圣祖高宗遗意，特举制科^①，则非常之士，闻风兴起。其设科之名，或称博学鸿词，或称贤良方正，或称直言极谏，应由部臣临时请旨定夺。庶贤才无沈抑之患，可辅科举所不逮。而前此空疏之弊，亦且渐以转移。或谓方今科甲人员不少，而复举特科，恐益致仕途之壅滞。不知特科乃旷世而一开，所用不过数十人，且其所举，大半亦出于科甲。是未足为科甲之累，而适所以剂科甲之穷。补偏救敝之方，不外是矣。盖重京秩，则贤才奋于内矣；设幕职，则贤才练于外矣；开特科，则举世贤才无遗逸之虞矣。臣之所愿养贤才者此也。

自来吏治之升降，视乎牧令之贤否^②。牧令之黜陟，由乎大吏之考察。大吏果贤，则吏治不患其不肃也。伏读皇太后懿旨，谕令各直省督抚秉公举劾，任用贤能。煌煌圣

① 特举制科，也即特科。即由大臣直接向皇帝推荐杰出的特殊人才。

② 牧令即治民的官员。

训，整饬吏治之宏规，不外是矣。臣愚以为方今激劝牧令，又有两端：一在清其途，一在励其气。何谓清牧令之途？国朝捐输之例，向因不得已而设。我宣宗、文宗御极之初，首停捐例，当时以为美谈。嗣因发捻肇衅，饷需浩繁，始议推广捐例。然收数未见赢余，仕途益形庞杂。臣尝考乾隆年间常例，每岁捐监、捐封、捐级等项，收银约三百万两。今捐例既从折减，以示招徕，而每岁户部收银，转不及百五十万。是何也？名器重，则虚衔弥觉其荣，虽多费而有所不惜；名器滥，则实职不难骤获，虽减数而未必乐输。人情大抵然也。自顷军务告竣，饷需大减，如谓国家缺此百数十万之经费，臣有以知其不然矣。况今甘捐、皖捐、黔捐等局，所得无几，所伤实多。该省既已肃清，尤宜亟行停止。今欲议停捐例，宜于各省盐课、洋税项下，均匀指拨，合成巨款，以抵京铜局之所入。其捐输常例，但留捐监、捐封、捐级与捐杂职等项，概收实银。人人知名器之足贵，则户部收数，亦必不至于过绌。国计无纤毫之损，吏治有澄清之益，转移之机，非细故矣。何谓励牧令之气？东汉县令，往往入为三公。唐世凡官不历州县，不拟台省。宋制非两任州县，不得除监察御史。自明以后，行取知县，皆入为御史及主事，得人最多。我朝康熙年间，名臣如郭琇、彭鹏、陆陇其、朱轼，皆由县令入为京员，理学经济，震耀一时。康熙四十四年，御史黄秉中疏言知县考选科道，殊觉太骤，廷议停止。乾隆初年，又以主事人多缺少，凡行取知县，改以知州拣选。在当日酌更成法，原所以协一时

之宜。然行之百年，州县无望于清华，渐乏循良之绩，京员未膺夫繁剧，或少练达之猷。吏治与人才，不免两为减色。今欲整饬吏治，陶铸人才，莫如复圣祖初年行取旧制，或稍变通其意，州县两途，并予行取。凡科甲出身、保举卓异之员，知州行取授御史，知县行取授主事，庶衔缺亦足相当。而上司操此为激扬，牧令羨此为清贵，吏治必有振兴之一日。或谓近日京员壅滞，而复参用外员，恐愈失疏通之意。不知康熙以前，京员练习民事，上而督抚，下而道府，莫不起自京员。方今圣朝知人善任，若果摩厉京员，俾与外员互为出入，正所以疏通京员也。京外两途，无扞格不通之患，而后郅治可期矣。夫既清其途，复励其气，然后责大吏以考课，虽中材之牧令，犹将自奋于功名。然尤有宜治其本者，则养廉坐支各项减成，不可不复也。查各省文职养廉，向支钱粮耗羨。同治八年，部议廉俸复额，必须各省钱粮耗羨征收足额，始可抵放，此亦本末兼权之意。惟是州县养廉，大者无过千两，盖与坐支各款，均属办公不可少之费。今皆减成发给，其公私之用，必至竭蹶，欲其不妄取于民，不可得也。州县无清廉之操，欲其课农桑、勤抚字、善催科，不可得也。且钱粮之不足额，半由民欠，半由官亏。与其靳数成之发款，而亏无限之公帑，似不如全复旧额，而严核官亏，可以勸官常，即可以裕国计。驭吏之本，莫先乎是。若夫劝惩之具，表率之资，是在大吏平时之措注，非一朝一夕之故也。臣之所愿肃吏治者此也。

天下当有事之时，军饷之不能不藉资于民力者，势也。曩以剿办粤捻各寇，不得已而设局抽厘，酌取商贾之赢余，略济饷需之支绌。以视元明之加赋筹饷，相去不啻霄壤。加以我国家二百余年深仁厚泽，浹髓沦肌，商民踊跃输将，源源接济，故能馈数十万嗷嗷待食之军，而灭方张之寇。惟其如是，而民情大可见矣。然民力必休养于平日，始可借资于一时。今海内军事已平，臣愚以为圣朝軫念民瘼，此其时也。军兴以来，厘金之旺，素推东南数省。今试以江苏一省论之，江苏久遭兵燹，创痍呻吟，元气未复。向已力筹巨款，剿平诸寇。今则户部指拨之款，各省岁协之饷，悉以江苏为大宗。计其所出，地丁居其一，漕粮居其一，洋税居其一，盐课居其一，厘金又居其一，每项各数百万。幅员不广于他省，而财赋倍蓰过之，民力之竭，亦可知矣。以臣所见，闾阎十室九空，而百物昂贵，小民奔走拮据，艰于生计，力田之农，终岁勤动，尚难自给，偶遇水旱，即不免流移道路，其颠沛饥羸之况，不可殫述也。一省如此，他省可知。伏惟圣慈恫瘼在抱^①，似宜乘此群寇荡平之际，与民休息，渐裁厘金。即以一时经费未充，尚难骤撤，可否飭下各省督抚察度情形，或酌减捐数，或归并厘卡，以为异日尽裁之渐。至于布帛粟米，为群黎衣食所资，尤宜普除厘捐，大慰民望。若再因循不革，恐承平无事，上下视为定额，必将有不可少之出款，与为抵销，一旦复有不

^① 恫瘼（音guān 关）：封建时代帝王常用以表示对民间疾苦的关怀，如恫瘼在抱。

虞之事，将筹何款以应之？故裁之所以为异日缓急计也。若夫厘金之外，又有厉民之政，则莫如四川津贴一项。四川古称饶沃，国初定额，以其荐经寇乱，概从轻额，故其地五倍江苏，而钱粮不逮五分之一。厥后生殖日繁，物阜民富，仕宦之人，遂视四川为财藪。其公私杂费，与一切陋规，莫不按亩加派，名曰津贴。迁流日久，变本加厉，取之无艺，用之愈奢。凡州县供应上司之差，小者千金，大者逾万。综计民力所出，逾于正赋之额，几有十倍不止者。夫圣主有轻徭薄赋之仁，而小民转受苛派无穷之累。揆厥由来，虽非一日，而循是不变，终为厉阶。兹欲剔除宿弊，诚宜大加整顿，斟酌时宜，明定经制，飭下疆臣，风励僚属，敦尚廉隅，庶积习可蠲，而于国计民生两有裨矣。臣之所愿恤民隐者此也。

自元明漕东南之粟以实京师，累代讲求，其法屡变。元用海运，患多漂溺；明用运河，患多劳费，二者得失维钧。今则海道便利，事捷而费省，运河梗阻，法敝而费多。窃尝综其利弊论之，盖河运不如海运，海运不如商运。臣请略陈其说，自前明以屯田养卫军，以卫丁运漕粮，国朝改为旗丁^①，其始法非不善。暨其弊也，屯户不能耕，而佣平民以耕，旗丁不能运，而募水手以运。于是积耗多而游手繁，旗丁诛求于州县，州县暴敛于平民。其取盈于旗丁者，则有闸官，有弁兵，有仓书。其取盈于州县者，则有上官，

① 国朝：封建时代称本朝为“国朝”。

有豪绅，有胥吏。上下交征，而州县之取诸民者，往往三四倍于正赋。其费之出于上者，则有漕艘之修，有旗丁之粮，有州县之支销，有粮道之经费，加以闸官、卫官之俸，漕标、河标之饷。溯查嘉庆年间，协办大学士刘权之疏，言南漕每石需费十有八金，盖合上下浮费而言之。国家岁漕四百万石之米，是有七千余万金之费也。近岁海运之法行，盖穷极变通之候，在国家减省浮费，裨益实多。其州县之漕章，亦经各省大吏酌中厘定，明予以办公之经费，隐绝其无限之浮收，民情翕然，至今称便。乃闻议者颇欲规复河运，苟非狃于故见，则必有所利于其中者也。启中饱而便私图，孰甚于是，是河运之不如海运明矣。臣又闻京仓支用以甲米为大宗，八旗兵丁不惯米食，往往由牛录章京领米易钱^①，折给兵丁，买杂粮充食，每石京钱若干，合银一两有奇，相沿既久，习而安之。官俸亦然，领米辄发米铺，或因搀杂泥沙，霉烂不堪复食，则发糖坊，每石得银一两有奇，赴仓亲领米者，百不得一。盖涉途远则侵蠹必多，经时久则折耗自易。以漕运无穷之劳费，而每石仅获一金之用，亦可慨矣。今诚统计南漕抵仓之米，每岁共有若干，飭令各省将折漕之价^②。与其应发水脚之费，解交部库，所有甲米官俸愿领银者，照漕折银数发给。每岁部发巨帑，慎选廉干之员，于天津、通州、京仓三处，招商运

① 牛录章京，清代官名，汉译“佐领”。掌管所属人员的户口、田宅、兵籍、诉讼等。

② 折漕亦称漕折，指漕粮改折银两或实物。

米，宜于免关税外，援粮船带免他税之例，定为运米若干石，准免他税若干。回空之船，一体给照免税，仓米既满，而运米鬻于市者亦如之。商人惟利是鹜，一闻定例，则江浙之米，与奉天、牛庄之米，必将航海而来；山东、河南之米，亦由运河而至；京东、丰润、玉田之米，络绎骈集，惟所择之，如此则有七便焉。米色精洁，一便也；部库充裕，二便也；民力久纾，三便也；内外支销漕项，节省至千万两以外，四便也；甲米官俸，所得有丰于前，五便也；都门内外，米商奔赴，百货流通，六便也；畿民见米之易售^①，多种稻田，渐兴水利，七便也。有此七便，上下交益，是海运之不如商运明矣。或谓沧海茫茫，恐一旦有不测之变，招商亦难经久，终不如河运之可恃，不知护运道以备不虞可也。虑沧海之有警，因谓海运不如河运，此因噎废食之见也。况今洋面平稳，轮船迅速，虽在多事之秋，富商大贾，挟数百万之货，致数万里之远，逾山涉波，艰难险阻，曾不假尺寸之势，什伍之卫，不患不达。而河运数千里，节节浅阻，一有烽尘之警，亦未必畅然可行。为今之计，宜以海运与招商并举，如招商著有成效，不妨渐推渐广，而略以海运输之。仍随时保护运河，量加修浚，每岁酌行河运十数万石，务使运道毋费而已。若是而谓运道有壅阏之虞，京仓有阙乏之患，必不然矣。臣之所愿筹漕运者此也。

① 畿民即国都附近的居民。

自古养兵无善政。南宋之括财，晚明之加赋，皆为兵多所累，识者病之。我朝绿营兵额五十余万，较之宋明，业已大减。然养兵之费，岁二千万，几耗天下岁入之半。军兴二十余年，各省剿贼，皆倚勇丁以集事，曾未闻绿营出一良将，立一奇功。臣盖尝深究本末而知其弊也。查各省绿营旧制，马兵月饷银二两，步兵一两五钱，守兵一两。平时仰事俯畜^①，尚难自给，咸以小贸营生，手艺糊口。承平日久，或没齿不经战阵。其居将领之任者，亦复狃于因循，拘于文法。于是乎有老弱滥竽之籍，有役使趋走之卒，有侵减虚悬之饷。其兵仰食县官，视为当然，悍者饮博无赖，愿者疲玩不振，每遇操演之期，巧饰虚艺以炫耳目，一闻征调，胆寒气沮，甚者雇人顶替。行则需车，役则需夫，繁索供张，官民交病。洎乎临敌，真能折冲致果者，百无一二。积弊相嬲，虽有豪杰之士，无由奋兴。然则绿营之不可复恃者，时势然也。自楚军、淮军相继并起，勇丁月饷，倍于绿营之战兵。其得力尤在法令简严，事权专一，自统领以至营官什长，莫不情意相洽，谊若一家，而又可撤可募，随募随练，用其方新之气，故能奋建殊勋。然今之勇营，已稍不如前矣。若使积年屯驻，不见大敌，久而暮气乘之，又久而积习锢之，恐复如绿营之不振。故中外之议，皆主撤勇而练兵。夫练兵诚急务也，然使仅守绿营旧制，是兵愈冗而愈弱也。臣愚以为居今日而修戎备，与其以一饷

^① 仰事俯畜，即对上侍奉父母，对下养活妻子儿女。亦泛称维持一家人生活。

养一兵，而十兵无一兵之用，何如以两饷养一兵，而一兵获数兵之用。昔人谓兵贵精不贵多，其成效可睹也。臣谨案乾隆四十七年，增兵六万有奇，大学士阿桂上疏力争，以岁饷骤加，恐难为继，厥后果因帑藏大绌，叠议裁汰。顷者海内用兵，未遑兼顾，绿营兵饷，欠发甚巨。自是每有战守之事，一倚勇营，而绿营几同虚设。近见各省整理绿营，如浙江之减兵加饷，直隶、河南之添饷练军。前大学士曾国藩在两江总督任内，整顿外海水师，旧兵一万余名裁为二千余名，以济添给薪粮、修造船只之费，部议韪之。盖中外大臣，皆已深鉴绿营之敝而思有以救之，非一日矣。可否推行此法，飭下各省督抚，裁汰绿营虚额，与其衰废斥退之缺，病故开除之缺，一概勿补，仍体察各路情形，或存绿营原额之半，或减存三之一。以其所节之饷，酌加马步口粮，分隶数镇，会合训练。营制太破者，归而并之。汛防太散省，撤而聚之。约计腹地省有劲兵一万，边省万五千人，即可以弹压盗贼，隐备不虞。仍酌留得力勇营，参错屯驻；有事则辅以召募，藉战守之实务，行训练之成法。如是则平时无冗食之兵，临事获劲旅之用，循名核实，化弱为强，计无过于此矣。虽然，方今要务，整理绿营之外，尤有培护根本之计，有慎筹门户之计。所谓根本之计何也？我国家神武开基，东三省劲骑，为亘古所仅见。近以征调络绎，渐至凋零，老者物故，弱者未壮。其于布阵合围之法，驰驱击刺之术，渐失其传，若不及时整饬，恐斯事遂为绝学。似宜飭下吉林、黑龙江将军，挑选驻防子弟，优加廩

饬而勤练之，务使制胜妙技，赓续不穷，将来健旅日出，北可固边塞之防，西可备新疆之用，所裨岂浅鲜哉？所谓门户之计何也？东南军事，以水师为最利。长江水师，利用舳板、长龙、快蟹等船；外海水师，利用广艇、红单、拖罟等船。而论今日海疆所需，则轮船尤为利器。然其操演之法，与长江水师截然两途，与外海水师亦迥然异辙。苟非专门名家，穷年毕世，不能洞悉其精微。今中国闽沪各厂，虽陆续制造轮船，似尚乏统带轮船之将才，则利器不可得而用也。夫事当缔造之初，非破格鼓舞，不足以彰激励。似应饬下海疆大吏，荐举轮船将才，其优异者不次拔擢。俾天下知功名之路，相率研求，殚精毕力，以备干城之用^①。庶几将才益练，水师益精，而外侮无虞矣。臣之所愿练军实者此也。

孟子有言，无政事则财用不足。《大学》平天下一章，于理财之道，盖兢兢焉。臣之愚策，如所谓加养廉、停捐例、裁厘金，皆有妨于财用者也。如所谓核冗饷、筹漕运、减兵额，皆有裨于财用者也。以其所赢，补其所绌，原足相当。而论方今不涸之源，则尤赖朝廷崇尚节俭以风天下，天下尽趋于节俭，而财用无不足之虞。故臣又以为理财之政，不必开其源也，惟在节其流而已。节流之法，不必广其术也，惟在核州县之交盘而已。谨查吏部定例：州县交代，正限两月内不能结者，谓之初参；展限两月，复不能

^① 干，盾牌，干和城都比喻捍卫者。

结者，谓之二参；如旧任官亏缺正项钱粮，或并无亏缺，而新任官迟延不结者，皆由该督抚题参革职；交代未清，而该上司不声明者，司道府州降三级调用，督抚降一级留任。此行之久而无弊者也。降及晚近，州县交代，不尽依限完结，上司惮处分之繁，亦遂不依限题参，往往藉辗转驳查，宕延岁月。及其浸久，旧任困于旅费，无款可交，终身寄寓，子孙流离，皆所不免。其新任以旧款未清，转相牵率，于是交代不结者，什有八九，而上司亦遂有参不胜参之势，库款之所以日亏，职是故也。臣闻近来办理交代，以山东为最善。山东一省，自前抚臣阎敬铭申明旧例，刊刻交代章程十一条，颁发州县，并通飭各属，不得藉各项工程名目，报销正款钱粮，其交代逾限者，参革毋贷。同治初年，每岁藩库所收正杂各款，不过八九十万两。近则藩库收款至二百五六十万以外，藉支本省饷需，及京协各饷。一省如此，天下可知矣。夫州县职司钱粮，坐拥仓库，计其公私之用，每岁多耗数千金，未甚觉其费也。然合天下千五百州县计之，是三年而耗二千万也。彼曾任州县者，亦以挪移甚便，不能节缩衣食，终不免窘乏之虞，查抄之累，此公私两损之道也。若交代素严，俾州县豫知节啬，则国家少亏帑之虞，州县免终身之累，此公私两便之道也。如臣愚见，可否飭下户部申明旧例，并咨取山东交代章程，通行各省，实力办理。又恐积亏之后，骤加整顿，则新旧相混，窒碍必多。欲杜侵亏，惟有宽既往而严将来之一法，酌复养廉以裕其力，禁止摊赔以清其流，庶各省大吏，易于

措手。自兹以往，逾限必参，二参必革，功令严而亏挪少，亏项绝而库藏充。理财之道，莫先乎此矣。臣之所愿裕财用者此也。

以上六策，皆史册经见之端，士民欣慕之事，或经列圣创垂而著为良法，或系大臣筹措而迭见成功。臣不过就闻见之余，略参引伸之义，冀可推行乎海内，先期斟酌乎时宜。虽国家大政，不止此数端，然苟非治术所深资，平时所切究，亦不敢掇拾细故，冒昧渎陈。臣自惟学识疏庸，无以仰答高厚生成于万一，谨体圣世求言之意，稍摭千虑一得之愚，臣不胜战栗待罪之至。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再密陈者，自古边塞之防，所备不过一隅，所患不过一国。今则西人于数万里重洋之外，飘至中华，联翩而通商者，不下数十国。其轮船之捷，火器之精，为亘古所未有。恃其诈力，要挟多端，违一言而瑕衅迭生，牵一发而全神俱动，智勇有时而并困，刚柔有时而两穷。彼又设馆京师，分驻要口，广传西教，引诱愚民。此固天地适然之气运，亦开辟以来之变局也。臣愚以为欲御外侮，先图自强；欲图自强，先求自治。臣所拟治平六策，于中国自治之方，既略陈其要矣。兹复谨筹海防密议十条，冀于自强之道，稍裨万一。伏惟圣明鉴其愚诚，俯赐采择焉。

一、择交宜审也。昔者乐毅伐齐，必先联赵；诸葛守蜀，首尚和吴。盖有所备，必有所亲，其势然也。洋人之至我中国，专恃合纵连横，而我以孤立无助，受其箝制，含忍至今。诚欲于无事之时，多树外援，则择交不可不慎也。

方今有约之国，以英、法、俄、美、德五国为最强。五国之中，英人险谲，法人慄悍，所至之地，便思窥伺衅隙，隐图占据。此中国之深仇，不可忘也。俄国地广兵强，为欧洲诸国所忌，今且西守伊犁，东割黑龙江以北，据最胜之地以扼我后路。是宜罗设大防以为藩篱，而尤注意于东三省，严为之备，而婉与之和。此中国之强敌，不可忽也。美国自为一洲，风气浑朴，与中国最无嫌隙。其纽约与蒲公使所立新约，则明示以助我中国之意。盖亦恐中国稍弱，则欧洲日强，还为彼国之害也。故中国与美国，宜推诚相与，略弃小嫌，此中国之强援，不可失也。德人新破法国，日长炎炎，几与英、俄鼎峙。幸其通商之船尚少，则交涉之事亦无多。此亦中国他日之强敌，不可恃为援，亦未至骤为患也。自昔列国争雄之世，得一国，则数国必折而受盟；失一国，则诸国皆从而启衅。盖择交之道得，则仇敌可为外援；择交之道不得，则邻援皆为仇敌。诚宜豫筹布置，隐为联络，一旦有事，则援助必多，以战则操可胜之权，以和必获便利之约矣。

一、储才宜豫也。自中外交涉以来，中国士大夫拘于成见，往往高谈气节，鄙弃洋务而不屑道，一临事变，如瞽者之无所适从。其号为熟习洋务者，则又惟通事之流，与市井之雄，声色货利之外，不知其他。此异才所以难得也。今欲人才之奋起，必使聪明才杰之士，研求时务而后可。昔汉武帝诏举茂才，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似宜略仿此意，另设一科，飭令内外大臣各举所知，亦不必设有定

额。其新科进士，大挑举人，优拔两贡^①，如有洞达洋务者，亦许大臣保荐，仿学习河工之例，别为录用。其用之之道，如胆识兼优、才辩锋生者，宜出使；熟谙条约、操守廉洁者，宜税务；才猷练达，风骨峻整者，宜海疆州县。求之既早，斯用之不穷。彼士大夫见闻习熟，亦可转移风气，不务空谈。功名之路开，奇杰之才出矣。

一、制器宜精也。西人器数之学，日新月异。岂其智巧独胜中国哉？彼国以制器为要务，有能独创新法者，即令世守其业，世食其利。由是人争自奋，往往有积数世之精能，创一艺而成名者。中国则不然，凡百工技艺，视为鄙事，聪明之士，不肯留意于其间，此所以少专家也。夫《周官·考工》一册，自梓匠轮舆，以逮枲栗函裘陶冶，莫不设为专官，子孙世守勿替。他若奇肱氏之飞车，公输般之攻具，诸葛亮之木牛流马，其精诣独至之处，何尝不逮西人哉？正以后世不崇斯学，故浸失其传耳。今欲鼓舞人心，似宜访中国之巧匠，给之虚衔以风励之，随时派员带赴外洋，遍游各厂以窥其奥窔。有能于洋人成法之外，自出心裁者，优给奖叙；或仿西人之法，俾获世享其利。庶巧工日出，足与西国争长矣。

一、造船宜讲也。外国轮船之制，有商船、有兵船。商船以运货为主，式略短而中宽；兵船以战阵为主，式较长而中狭。至其暗轮之高下，食水之浅深，皆自截然不同。方

^① 清代科举制度中有五种贡生，即恩贡、拔贡、副贡、岁贡、优贡。

今闽沪所造轮船，不尽可作兵船者，其初用意，盖欲取两式而兼营之。然其弊也，运货不逮商船之多，战阵不若兵船之劲，是欲求两便而适以两误也。窃谓自今以后，各厂造船，宜令仿上等兵船之式，专精仿造。如有商民愿缴造价，公置轮船者，准其赴局专造商船。如此分晰办理，庶中国之船渐推渐精，而经费不至浪掷矣。

一、商情宜恤也。查西洋立法，以兵船之力卫商船，即以商船之税养兵船。所以船数虽多而餉项无缺者，职是故也。往年中国议定章程，设立轮船招商局，夺洋人之所恃，收中国之利权，诚为长策。惟是推行未广，华商之应募领船者，尚属无几。且自中外通商以来，江浙闽广诸商，亦有置买轮船者，大抵皆附西商之籍，用西商之旗。虽经费甚大，利归西人，而诸商曾不以为悔者，其故何也？盖为华商则报税过关，每虞稽滞，掣肘必多；为洋商则任往各口，无所拦阻，获利较易也。今诚体恤商情，曲加调护，务使有利可获，官吏毋许需索，关税不得稽留，令明法简，将来缴价造船之商，自必源源而来。贸易既盛，渐可驶往西洋诸埠，隐分洋人之利。然后榷其常税，专养兵船，务使巡缉各洋，以为保卫商船之用。从此兵船益多，而经费不绝。富强之道，基诸此矣。

一、茶政宜理也。中国出口之货，以丝茶为大宗。茶叶一项，与洋人进口之鸦片，其价值略足相当。然鸦片之来，为害于中国甚深；茶叶之往，为利于西洋甚大。洋人以茶叶为性命，恃以消瘴毒、除疾病，不能一日稍离。间

尝询诸茶商，核诸近日新闻纸，综计每岁各路出口之茶，价值约在三千万两以外。若榷其什二之税，是岁入六百万也。今者海关税则，刊在条约，不可复改；而各省之茶捐茶税，收数未旺，隐漏尚多。夫欲筹御外之规，必先操裕财之本，欲勿累吾民而财足，莫若仍取诸外洋。昔管子谨正盐策，而诸侯敛袂朝齐，诚知利权所在，足制诸侯之命也。方今中国大利，被洋人网罗尽矣；只此物产之菁华，可以默操其权。宜于闽浙、湖广、江西、安徽出茶诸省，酌加税额，而严核其隐漏。茶税暗增，则茶价亦昂，显取诸内地之民，实隐收洋人之利。惟其经理之法，宜出之以渐，济之以权，务使洋人相安于不觉，数年之后，必有成效。举凡制器、造船之费，练兵、筹饷之源，皆可取资于是矣。

一、开矿宜筹也。中国金银煤铁等矿，未经开采者，处处有之。弃货于地，而外人垂涎久矣。似不妨用彼国开挖之器，兴中国永远之利。查有矿苗旺处，由各省大吏谘访民情，察度地势，果其毫无妨碍，始许兴办。其开采之法有二：一曰官采。由官酌拨款项，雇洋人，买机器，随宜办理。一曰商采。仿淮盐招商之法，查有殷实华商，准其集资报名，领贴设厂，置备机器，自行采取。官为稽其厂务，视所得之多寡，酌定收税章程，严禁隐漏。如是则地不爱宝，民无弃财，不失中国饶富之权，不启彼族覬觐之渐，似亦筹饷之一助也。

一、水师宜练也。外国兵船之式，船主为全船纲领。其下有总领官，主水陆攻战；有领队官，主船中排队；有大

夥、二夥、三夥^①，专佐船主行船；此外如管理机器，看守汽表，与夫装送子药，视敌取准，各有专司；其收放帆蓬，登陟桅顶，驾驶舳板，抽水、救火等事，皆令水手操练。职司有定位，作息有定时，习之既专且久，所以能纵横无敌。今中国轮船，亦颇仿效西法，参用洋人，究未造其深际。无他，学习不如阅历之精，而所用洋人无上选也。昔巫臣教吴，武灵胡服，始皆借才异国，终则远出其上；唐太宗驾馭蕃将，多能得其死力。窃谓沿海大吏，与出使外洋之员，皆宜留心物色，如洋将中有挟高才而愿游中国者，不妨罗致一二人，糜以厚禄，善为驾馭，先令教练一船，久则推演渐广。仍仿俄国初年练兵之术，选沿海勤敏之子弟，送入西船，俾习各司，而协贴其经费，数年回国，分配各船，庶技艺日精，水师日劲，不难操券而决矣。

一、铁甲船宜购也。西洋守港之恃铁甲船，犹行军之恃营垒，寻常轮船，当之辄碎。又有铁甲小船，所以缠护炮台，四面伏击，最为灵活坚利。惟食水过深，不能远越重洋，是以至中国者，颇属寥寥。今中国既有轮船数十号，亦宜酌备铁甲船，外则巡缉洋面，恃为游击之师，内则扼守要口，胜于炮台之用。盖有一铁甲船，而诸轮船即可依护以增气势，尤幸彼之不能来犯，我即可恃为专长。苟非未雨绸缪，则仓猝必难筹措，似未可以需费稍臣，而失此远图也。盖铁甲小船，不难以内地仿造。其大者工程繁重，

^① 即大副、二副、三副。

驟難得其要領，非在外国定購不可。又恐定購之后，難越重洋，不妨將鐵料如式剪裁，分拆運送，飭匠釘配。但必議價定造，不可承買舊船耳。

一、條約諸書宜頒發州縣也。西人風氣，最重條約，至於事關軍國，尤當以萬國公法一書為凭。如有阻撓公事，違例干請者，地方官不妨據約駁斥。果能堅韌不移，不特遏彼狡謀，彼且從而敬慕之，如或詭隨亂法^①，不特長彼驕氣，彼且從而非笑之。蓋西洋立國，非信不行，非約不濟，其俗固如此也。方今海疆州縣，商船之絡繹，傳教之紛繁，事事與洋人交涉。乃當其任者，往往以未見條約，茫然不知所措，剛柔兩失其宜。其偏于剛者，既以違約而滋事端；其偏于柔者，亦以忘約而失體統。啟衅召侮，職此之由。似宜將萬國公法，通商條約等書，多為刊印，由各省藩司頒發州縣。將來流布漸廣，庶有志之士與辦事之官幕書吏，咸得隨時披覽，一臨事變，可以觸類旁通，援引不窮矣。

以上十條，皆系顯著之端倪，亦有可乘之事會。臣謹稽之古籍，准之時宜，慮欲周而臆見不敢參，謀欲決而先機不容緩，用敢附片密陳梗概，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

伯兄撫屏云：“光緒元年四月，平遠丁稚璜官保在山東巡撫任內，代上此疏。奉旨留中，旋交軍機大臣發各衙門議奏。其海防密議十條，由總理衙門匯入各行省大吏議復海防各折核議；而治平策六篇，則由吏、

① 詭隨即譎詐善變；執法即枉法。

户、礼、兵四部分议。于是，总理衙门议先上，以择交、储才两条，关系较重，且与南北洋大臣所论大意相同，始定遣使往驻西洋各国之议。盖谓此举为可联与国而练人才也。又议准将条约诸书，由总理衙门刊印，颁发各关道、各行省，分行州县。其制器、造船、恤商、茶政、开矿、练水师、购铁甲船各条，大致颇多许可，并行南北洋大臣酌办。各部所议之事，除设幕职、复行取、筹漕运三条，由吏部、户部议驳，开特科一条，由礼部议请暂缓外，其恤民隐、练军实、裕财用三端，并下各行省酌办。自是十年以来，有停止捐例之令，有津贴京员之议，有稽核州县交代之新章，而四川之裁撤夫马局，各省之蠲免米商厘税，及汰减绿营、添设练军、吉林、黑龙江相继遣大臣练兵，皆以此疏为之嚆矢^①。当此疏初上时，京师颇多传诵者。议论一播，鼓动中外，建言者往往响应而起。昔贾长沙、董江都条议汉事，或于数十年后见于施行，后儒称其通达治体，切于世事。吾于此文亦云。”

朱亮生云：“此疏洋洋洒洒，浩浩落落，有千岩万壑之观，有清庙明堂之概。循绎数过，始知为纲者六，为目者几二十，有纲中之纲，有纲中之目，有目中之目。以新圣德为治平缘起，此为纲中之纲。养贤才则有重京秩、设幕职、开特科三端，肃吏治则有停捐例、

① 嚆矢：响箭。发射时声先箭而到，因以喻事物的开端；犹言先声。

复行取、加养廉三端，此为目中之目。篇中所议停捐纳、行海运、裁兵加饷，皆与鄙见不谋而合。其复养廉、恤民隐、重京秩、核交代，皆绝大关系，为治乱盈虚之所从出，言之诚不厌其详。至酌裁厘金，为后日缓急计，识虑更深。若京员因谋食不遑；未能讲求治道，及科目求速化，置经史于不问，尤能言人之所不敢言。而开特科所以剂科甲之穷，复行取无碍于疏通之路，措辞复甚圆湛。作者于二十一史因革损益，成败得失，了了胸中；而本朝掌故，近今利弊，尤谙悉无遗，故能折中立言以至成文。最可爱者，直言无讳中，复能处处婉曲，笔笔斡旋，读者但觉其忠爱恳挚，不见其激烈迫切。奏疏中有数文字也，瓣香从何处得来，知其渊源所渐者远矣。

曾栗诚云：“海防密议十条，笔达而圆，意新而确。此议未出之前，系是人人意中所无；此议既出之后，乃觉人人意中所有。方洋务之初起，世之人或惊为异事，或鄙弃而不屑道，或挟其绪余以自重，数者皆非也。篇中所引，如《周官·考工记》、汉武帝、唐太宗、管子、乐毅、诸葛亮等，皆于时事极为贴切。今之所谓洋务者，实多前古已行之事；似极奇创，却极平常。尤妙在事事从浅处、显处著笔，使人易晓而世易行，宜乎乙亥丙子间，斯议传播一时也。

（选自《庸庵文编》）

答友人书·(1875年)

薛福成白：辱惠书，知吾兄近攻舆地之学，欲考证塞外形势山川地名沿革，勒为一书，以蕲达之于用，甚盛，甚盛。国朝诸老为此学者，如嘉定钱大昕辛楣，钱塘龚自珍拱祚，平定张穆石舟，邵阳魏源默深，光泽何秋涛愿船，皆各有撰述。迩者李员外风苞，方典簿恺，奉曾文正公命，方著《地球图说》。彼二子者，皆以绝人之资，覃精竭能，博稽古籍，复参以今所闻见，他日成书，必斐然可观。足下志力勤敏，或可与二子骖靳争先，幸努力为之毋怠。承询近日洋务，云南一案^①，渐有端倪。英国公使威妥玛在京师，齟齬相争，百方恫喝，固已变诈多端矣。然以中外全力，勉与枝梧，犹可以葺厥事。不佞所颺颺过虑者，滇事虽葺，而四方之衅，正未艾也。方今俄人西踞伊犁，东割黑龙江以北，包络外盟蒙古兴安岭，绵亘二万里，周匝三垂，蓄锐

^① 即1875年初，英国“探险队”的一名翻译官在云南边境被打死，英公使借机提出无理要求。此案史称马嘉理案。

参见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上册）第382页。

观衅。法人蚕食越南，取其东京以为外府，撤我滇粤之藩篱。英人由印度规缅甸，尽削其滨海膏腴地，以窥我云南西鄙。日本虽自台湾旋师，而睨隙思逞，今又有事朝鲜矣，朝鲜固中国之外蔽也。夫以我疆圉如是之广，而四与寇邻，譬诸厝火积薪，廩然不可终日。乌乎！中国不图自强，何以善其后。夫今日中国之政事，非成例不能行也，人才非资格不能进也。士大夫方敝敝焉为无益之学，以耗其日力，所习非所用，所用非所习，一闻非常之议，则群駭以为狂，拘挛粉饰，靡有所届。而彼诸国则法简令严，其决机趋事，如鸷鸟之发。如是而外国日强，中国日弱，非偶然也，皆其所自为也。今虽贤王勋臣，内外夹辅，仅能补苴搘持。一二十年后，吾辈恐未得高枕而卧也。来书又谓今之自强，不过摹仿他人之强，夸耀他人之强，与自字义相反，允矣。然使因恶他人之强，而遂不愿自强，此又因噎废食、讳疾忌医之见也。今有数人并驾于通衢，一人行百里未息；一人望尘追逐，仅至乎中道；一人惹他人之我先，不屑碌碌随人后，终不离故地一步。夫其仅至乎中道者，诚宜以不能争先为耻，然犹愈于跬步未移，而自以为高者也。开辟之初，人与万物偕生，所需于世者盖寡。其后不能无以自养，不能不相往来，即不能无争斗。圣人者出，于是有耒耨之教，有舟楫之利，有弧矢之威。迄于今造化之机日泄，而泰西诸国之人，研之愈精，于是有农织之机器，有火轮之舟车，有铜铁之枪炮。时势之相推移，虽圣人莫之能违。夫今之不能不用机器、轮船、枪炮，犹神农氏之不能不制耒

耨，黄帝氏之不能不作舟楫弧矢也。谓神农、黄帝，于耨耨、舟楫、弧矢之外，无治天下之要道则不可，必谓并耨耨、舟楫、弧矢而废之则惑矣。尝谓中国人民物产风俗，甲于地球诸国，若能发愤自强，原可操鞭笞八荒之具^①。弊在不能删成例以修政，破资格以求才。士大夫不肯捐除故见，务为有用之学。其聪明才杰之士，又往往讳言洋务。仅使一二当事者，区区于轮船枪炮，慕效西人，此犹见人之行百里，而劳神惫形以随之，不能具轻车、购骏马，以骋长途而遐矚千里也。大抵天道数百年小变，数千年大变。自尧舜至今世益远，变益甚。吾辈读书致用，不可复为一切成说所拘，如能会通其理则几矣。足下开敏善悟，向不锢于俗学者，故略抒所怀以相质证。如有所见，幸以教我。冬寒，惟珍卫不宣。

(选自《庸庵文外编》)

^① 八荒即八方荒远之地。《说苑·辨物》：“八荒之内有四海，四海之内有九州。”

《筹洋刍议》序 (1885年)

光绪五年，日本兵船入琉球，以其王归，遂灭琉球^①。是时，日本势益张，而西洋德意志诸国，方议修约事，议久不协。俄罗斯踞我伊犁，索重赂，议者尤汹汹。余愚以谓应之得其道，敌虽强不足虑；不得其道，则无事而有事，后患且不可言。窃不自揆，网罗见闻，略抒胸臆，笔之于书，凡得《筹洋刍议》十四篇。既属稿，以呈伯相北洋大臣合肥李公。公大韪之，为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备采择。岁辛巳，余友遵义黎庶昌莼斋以出使西班牙参赞，超授出使日本大臣。至自西洋，携一册眎余，且曰：“曩过伦敦使馆，见曾侯案上有是书，讽玩数周，心益异之。手写一通，请曾侯用泰西糖印法，印得数十册，稍贻同志。今且尽矣，而索者未已也。盍速付诸剞劂？”余谓：“此特一时私论，大端所宜发挥者，十未得一二。遑敢张之以速戾邪？”今距与莼斋相晤时，又四年矣。事变愈繁，时艰未艾，余所欲言

^① 即1879年日本并吞了琉球国。

者滋益多。官事牵扰，卒卒鲜暇，不知何日能废此志。而二三友朋，时来借钞不辍。或劝暂镌之，稍免传钞之讹舛。余乃并识菴斋语于简端，倘异日阅历益进，或所见更有异同，岂特借为自镜之资，亦以显天下之理日出不穷焉尔。时十一年冬十一月，无锡薛福成自序于宁绍台道官廨。

《筹洋刍议》(1879年)

约章

两国议和，不能无约。约章行之既久，恐有畸重畸轻之事，以致两国之有偏损也，不得不订期修改，以剂其平，此中外通行之例也。然修约之举，期于两国有益无损。损一国以益一国，不行也。一国允而一国不允，不行也。伊古以来，未闻有修约不遂，而遽至决裂之举。惟其如是，则存自利之见者，不得恣睢以从事；有自护之权者，不妨从容以徐商。曩者滇边案起，英国威使以马加里之死，多方挟制。中国务持大体，不得不量予变通，以弭外畔。于是始立烟台之约^①。今前案早结，而英国于约内之事，尚未尽行。其理绌，则其气衰，所以威使支吾延宕，但嗾德国巴使借修约之事，多所要求。要求不得，旋肆恫喝，恫喝不

^① 即1876年9月13日英国公使威妥玛与清政府北洋大臣李鸿章在烟台签订的《烟台条约》。

应，而彼之技乃穷。即令佯示决裂之形，中国惟当静以待之。其万不能允者，始终坚执一辞，而彼固无如我何也。如其可允，而有大损于中国者，宜取大益以抵之；有小损于中国者，宜取小益以抵之。损益适足相当，彼商民犹未悵望，或将如英国新约之订而不行，否则相持不决，而修约中止，要之不失为中道，固非中国所虑也。虽然，中国立约之初，有视若寻常而貽患于无穷者，大要有二：一则曰一国获利，各国均沾也。西人始来不过一二国，中国不知其牵率而至者，如是其众也。既因有此约，一国所得，诸国安坐而享之；一国所求，诸国群起而助之。是不啻驱西洋诸国，使之协以谋我也。失计莫甚于此。从前诸国以英国为主谋，英国允而各国无不照行，是尚有统宗之处。今则德国雄长欧洲，每事与英竞胜，且烟台条款，德人借英之力沾利多矣。今复以修约而诛求无已，而英人亦乘间而导之，合力以谋之，此皆“利益均沾”一语阶之厉也。往者不可救，来者犹可追。今欲顿弃前约，彼必不肯从也。是莫如存其名而去其实，使彼相忘于不觉。往见戊辰与英国所订新约，第一条及照会之文，用意甚善，惜乎其未行也。又闻总税务司赫德之议，拟订各国通行约本，另设一汉文条约底式，凡有外国订约者，即按通行之约以授之。此诚省事之良法也。“利益均沾”之文不必去，而其弊自去矣。今岁德国修约，尚未定议，英法亦届修约之期。如竟能罢论固善，不然，则三国同时议约。宜告之曰：约文有“一体均沾”之语，若稍有参差，则一事两歧，而开办无期；莫

若乘立约之始，而会归于一。英、法、德三国既允，其余诸国可无虑矣。他日届期修约，彼即不能迭出以相尝，万一意见不合，不过互相牵制，不行新约而止耳。各国无端之喧聒，其少纾乎？一则曰洋人居中国，不归中国官管理也。夫商民居何国何地，即受治于此地之有司^①，亦地球各国通行之法。独中国初定约时，洋人以中西律法迥殊，始议华人治以华法，归华官管理；洋人治以洋法，为洋官管理。然居此地而不受治于有司，则诸事为之掣肘。且中国之法重，西洋之法轻，有时华人洋人同犯一罪，而华人受重法，洋人受轻法，已觉不均。今即以人命论，华人犯法，必议抵偿，议抚恤，无有能幸免者；洋人犯法，从无抵偿之事，洋官又必多方庇护，纵之回国，是不特轻法所未施，而直无法以治之矣。此无他，有司无权之故也。为今之计，既不能强西人而就中法，且莫如用洋法以治洋人。按烟台条款，有照会各国议定审案章程之约。赫德亦谓华洋讼件，宜定一通行之讯法，通行之罪名，乃能经久无弊。近闻美国与日本议立新约，许归复其内治之权，外人皆归地方官管辖。中国亦宜于此时商之各国，议定条约：凡通商口岸，设立理案衙门，由各省大吏遴选干员，及聘外国律师各一人主其事；凡有华洋讼件，均归此衙门审办。其通行之法，宜参用中西律例，详细酌核；如犹不能行，即专用洋法亦可。何也？治华洋交涉之事，本与中国自治之法不同。以

① 有司即官吏。

洋法治华人，所以使华人避重就轻也。以洋法治洋人，所以使洋人难逃法外也。补偏救弊，舍是无他术矣。夫条约之要义，固不止此二端，而以此二端为最巨。骤与之商，未必肯听。则于无形之中，潜寓转移可也。即不然，用以抵其所索之款可也。若夫法国之约，莫如约束教民，俄国之约，莫如清理边界，似皆宜于通行之约之外，别立专条。其间几微之得失，实为中国安危之机，是又当以全力注之者矣。

边 防

跨两洲之地，负北冰海而立国，利则乘胜进取，不利则蓄锐观变，有长驾远馭之谋，有居高临下之势，则俄罗斯固天下莫强之国也。迩者泰国诸国，畏俄忌俄，如六国之挨秦。据守海道，扼其咽喉，俾俄之水师不得纵横四出。俄人亦以久居陆路，未骋厥志，辄思发愤为雄。土耳其一役^①，既得黑海为训练水师之地，及英人出而阻挠，始立约罢兵，然已割土国腴壤，立为附庸之国者四，俄之号令，駉駉越黑海而南。彼又于欧、亚两洲之间，蚕食诸小国，烽火将达印度北境，英之君臣盱眙深谋，而无如何也。德人借俄之援，以破法而弱英，英亦熟视而不敢救。而德、奥诸国之于俄，又未尝不畏而防之。然则俄为欧洲诸国之忧

^① 即1877至1878年间，俄国取得对土耳其的战争的胜利，参与了瓜分土耳其的国际会议。

也久矣。虽然，俄之忧在欧洲者显而缓，俄之忧在中国者隐而重。何也？俄之边境包中国东西北三面，横亘二万里，自踞守伊犁之后，其近边浩罕诸国与哈萨克、布鲁特诸部，彼皆以兵威胁服，已不啻撤我外藩。东三省自黑龙江以北、绥芬河以东瓯脱之地，割归俄属者数千里，不特库页岛为俄所有，即吉林所属割去之地已多。其野产貂，其人渔猎，俄人建屋垦荒，开铁厂，借糗粮，买牛羊，设轮船公司于黑龙江上，经营井井，殆有深意。且彼所居之图们江口，距陪都根本之地，千里而近，形势尤嫌单薄。又闻宁古塔、珲春等处旗民，每被俄人侵侮陵暴，至不能安其生理，且时有寻衅之意。夫以欧洲诸国，与俄人比权量力，非不互有胜负，然不能不畏之者，地势使然也。中国兵力财力，未逮欧洲一大国，而彼尚可合纵连横以拒之，则其势盛而中国之势孤；诸国扼守要害不过数处，非若中国之防不胜防，则其势专而中国之势散；而况中国练兵制器之精，传信行军之捷，百不如西人。俄非无事之国，不得于西，将务于东，此必至之势也。然而近数十年来，幸获相安者，何也？俄之先世为元所逼，危蹙甚矣，今虽国势中兴，而余威尚震。我朝康熙、乾隆全盛之时，一定黑龙江边界，再定准回诸部，辟地万里，威声遐播，俄人拱手奉约，不敢稍有异言。厥后乘英、法之变，割我黑龙江北境^①，而尚无大隙

^① 1858年俄国乘英法联军进攻天津、威胁北京之际，用武力迫使清将军奕山订立了中俄璦琿条约，割去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归俄国所有。

也。迄于今日，其贪得无厌，窥中国物产之丰，而求济其欲者，俄之商民也；其恃强求胜，稍有违言，不尽恪守约章者，俄之边吏也；至俄之君相，虽不能无动于商民与边吏之言，然以两国和局逾二百年，长虑却顾，未肯轻于一发，非若英、法以力相竞，深知中国之虚实也。为中国今日计，宜因其机而导之，师老子“善胜不争”之训，守孙武“知彼知己”之谋，略细故而昭大信，使之无隙可乘，中国乃得以其暇讲求一切富强之具，事固大可为也，时亦大可为也。若夫目前自固之策所最宜注意者，在东三省，其次则新疆，其次则内外盟蒙古。蒙古之日就贫弱，殆气运使然，中国宜扶持培护，使各保分地，常为北方藩卫。新疆初复之区，非屯劲旅不足以捍御回寇，其忧在经饷之难筹，然其物产有金、铜、铅、铁、盐、皮、玉、棉花、药材，有雪泉灌溉之利，诚能广兴屯田，以裕军食，招民耕垦，而收其什一之赋，采铜铸钱以便民用，定盐课、兴矿利、流通百货，以榷厘税，数年之后，内地协饷可减其半，庶各省之力少纾，而新疆亦稍足自立，斯为经久之道。至东三省中，吉林五方杂处，风气偷弱，山中金匪不下十余万，固宜设官分泛，力图富教，常以游兵驱剿，渐清金匪之源。黑龙江马队，夙昔称强天下，今其旧兵虽已耗散，而民风朴劲，募练尚易为力。鄂伦春猎户枪无虚发，熟习山径，俄人所惮，宜结以恩信，籍其人数而稍部勒之，酌给口粮铅药，无事则习其业，有事则资其力，可以节饷糈而设无形之备。且黑龙江地居极北，尤为要冲，宜择忠清强

毅知兵之重臣，实力经营，宽筹其饷，而假以事权，需以岁月，庶其有济。凡此皆当今筹边之要务，而不可一日缓者也。然探其本，则筹边不过自强之一端。中国筹边之要，在中外上下戮力一心，精求自强之术而勉行之，则不言防边而边自固矣。

邻 交

古之豪杰论交邻之道，不外两端：诸葛亮之以蜀抗魏也，知吴之可结为援也，故曰释怨以联和；伍员之为吴谋越也，以其同壤而世为仇仇也，故曰去疾莫如尽。今与中国同处一洲之内，而国势稍足自立者，莫如日本。论外侮之交侵，不能不树援以自固也，宜有吴蜀相亲之势。然日本人性桀黠，蔑视中国，彼将以远交近攻之术，施之邻邦也，实有吴越相图之心。其机甚迫，而其情甚可见也。盖日本在唐宋以前，未尝不朝贡中国，其后平氏、源氏、北条氏、足利氏、织田氏、丰臣氏、德川氏，迭执兵柄，倔强东海之中，国主虚拥神器者，逾七百年。元代误用驽将，突遇飓风，弃师海外，是天意欲存日本，非其战胜之功也。明之中叶，边备日弛，海滨奸民，诱倭人为寇掠，而彼常有轻中国之心。十数年前，彼国中多故，诸侯群起而力争，德川氏狼狈失据，因以黜大将军，而列藩亦废，尽改郡县，駸駸乎有强干弱枝之势；又大开互市，崇尚西法，甚至改正朔，易服色，建置铁路、电线、机器之属，不遗余力，国债至二万万以外。近又购铁甲船于英国，西人啧啧称许，而

彼之火焰益张。夫彼之所以不惜重费，经营如此其勤者，必曰有所取偿也；彼之所以敬事西人，交际如此其密者，必曰可以求助也。然彼有所益，则必有损者在矣；彼既日强，则必有弱者在矣。窃尝为日本踌躇审度，知其志必不仅在朝鲜、琉球也。何也？朝鲜、琉球壤地之博，民物之丰，不逮中国之百一也。且日本之在海滨，亦多事矣。数年之中，一入台湾，再议朝鲜，三废琉球。今其兵船且游历至福建，隐有耀武之意。彼盖自谓富强之术，远胜中国，故欲迫中国以所难堪，使我怒而启衅，而彼乃得一试其技。幸而获胜，彼固可任其取求，万一不胜，彼恃西人为排解，决无亏损于其国，其为谋亦狡矣。故此时琉球之废，非谓其地足贫，民足用也，彼特以此尝中国也。中国而力与之校，固藉为开衅之端；中国而不与之校，亦愈知中国之弱。渐且南犯台湾，北攻朝鲜，浸寻达于内地，殆必至之势矣。今试就日本近事，与中国絮长校短而论之：日本仿行西法，颇能力排众议，凡火轮、舟车、电报及一切制造贸易之法，稍有规模，又得西人之助，此其自谓胜于中国者也。然日本土地人民，不及中国十分之一，国债累累，岁入之款，半输息银，则其饷不足恃也。国库空虚，百用仰给纸币，纸币不能用之国外也。一旦有事，船炮军火，皆无可购，则其械不足恃也。日本近更军制，寓兵于农，通国陆军常额，不过三万二千人，则其众不足恃也。惟彼海军有战舰十五号，大炮数十尊，不尽新制，毁之者曰朽败难用，誉之者曰操练颇精。兵之精不精，必经战阵而始显。日本以西法

练兵仅逾十年，未经战阵，核其实当与中国相等。彼西人之称之者，要不过阿好之言，亦挟为恐喝中国之具耳。况日本自变法以后，悍将骄兵之失职，废藩旧族之怀怨，常思乘间蜂起，以齟执政诸大臣。彼又北畏俄人，西防中国，苟势有不支，西人且易袒护而为窥伺。彼之政府筹之审矣，所以未敢径与中国为难，而必以琉球试其端者，职此之由。然则日本虽诡譎，仍视中国之举动以为进止也明矣。夫今之时势，与元明迥异。自强之权在中国，即所以慑伏日本之权，亦在中国。彼可购而得者，我亦可购而求，彼可学而能者，我亦可学而至，而况中国之才力物力，十倍于日本者哉。琉球蕞尔国^①，存亡绝续，原不足为中国轻重，然日本相侵之志，危矣迫矣，儻焉不可终日矣。中国于自强之术，不宜仅托空言，不可阻于浮议。诚能一日奋然有为，而决之以果，课之以实，固旋至而立有效者也。是故为今日计，御俄人之道利用柔，非柔也，化其争竞之气也；御日本之道利用刚，非刚也，示以振作之机也。军志有之曰：“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夫诚措注得宜，则敌之狡谋可戢，行且介西人以求成于我也，而西人之交，又何必不合于我也？

利 器

盖尝观于壮士之赴斗，以有器与无器校，则有器胜；以

^① 蕞尔：小貌。《三国志·魏志·陈留王奂传》：“蜀蕞尔小国，土狭民寡。”

利器与不利之器校，则利器胜。匹夫杖剑，虽被褐怀宝，而暴客不敢睨者，气夺于所畏，备豫于先事也。中国比年以来，讲求制敌之利器，各省所购新式前膛后膛大小洋炮不下数百尊，所购所制之新式后门洋枪不下数万杆，其余水雷及师丹式炮船，均已逐渐购备，御西人虽不足，御东人则有余矣。然西人所以夸诩日本，日本所挟以傲中国者，则彼有铁甲船而我无之也。盖闻日本订购铁甲船三号，原质本系木船，其上面蒙铁不过厚三四寸，其马力不过二百八十匹，其价不过每船三十万金，非真铁甲船也。又闻外洋铁甲船最大者，其机器有一千五百匹马力，食水太深，中国口岸恐难购用。盖船价之高下，视船之精粗、大小、厚薄、新旧为准的，其式固各有不同，其价亦难以悬断，非由驻洋明练之大员，精心考校，无从得其要领。姑就一时济急之用约略计之：夫日本三船之价，不满百万，今中国诚能筹银三百万两，则视日本已三倍有余矣。就中国口岸相需之船，大小参用，少则可购四号，多或至五六号。非必用之以摧敌也，但使得此利器，坐建无形之威，则假托者自慙然而气馁，旁观者亦竦然而神惊，不待两阵交锋，可以潜消邻衅，已省无穷之费。否则，彼欲聘所长，其势必迫我以交锋；否则，彼所购之铁甲船三号，其穷亦必取偿于我。此中之得失利病，不待智者而决矣。虽然，当此经费支绌之际，即寻常用度，已日不暇给，何能复筹额外巨款？忧时者知难设法，不得已而为筹借洋债之一说。夫使中国果万无可筹，暂借外资以展大计，固无不可。惟外洋

诸国，如土耳其之颠危，西班牙之贫弱，日本之困匱，皆为国債所累，甚者罄岁入之款，不足以供息银，于是苛敛横征，而内变迭作。中国债项仅逾千万，近年各省关饷额，为洋款所分，已觉异常耗竭，况西征之饷，借息加重至一分二厘，西人遂视为成例，不肯少让，设因累于输息，而辗转加借，十年之后，积累益巨，利不胜害，不可不慎也。然则洋款之难借如此，经费之难筹如彼，利器终不可致乎？谨查光绪二年，部拨西征饷银二百万两，由库存四成洋税提出批解，仍划各关应解海防经费之半，分年归款，此诚转移之妙术也。计此三四年中，所省之息银，已近百万矣。夫库储重款，原所以备缓急非常之用。今邻国之侮，甚于回寇，海防之棘，重于边疆。可否援照成案，拨发部库存银二百万两，以为创制利器之用，仍以沪关二成洋税，及粤、潮、闽、浙、山海五关四成洋税之半，分年划补。如此一转移间，则以海防之费，用之海防，不待筹拨于各省，而帑项无亏缺之虞，不受盘剥于外人，而器械有克期之举。再援照同治十三年筹办江防成案，截留长江三关四成洋税，一岁所入，几可敷三百万之数。其养船之费，则各处所解南北洋之款如无缺额，尚可勉供。其驾船之才，则江海水师宿将，与出洋学生武弁艺成而还，皆可以备遴选。且中国所造之木轮兵船，如无铁甲船以相依护，亦不能以成军。盖木轮得铁甲而气始壮，铁甲得木轮而势益张也。古人有言：“器械不利，以其将卒予敌也。将卒不练，以其器械予敌也。”是故，有是船即不能不练兵，不能不选将。而欲驾

驭将领，日起有功，则推择统帅，尤其至急者矣。或曰，以区区琉球之故^①，而滋劳费可乎？不知日本所图，并不在琉球也；我之所重，亦不在琉球也。设令日本复封琉球，而利器之购遽尔中止，则彼愈有以窥我之因循，或且伺间思逞，将迫我以不得因循之势。诚及此时毅然振奋，特发重资，入西厂，访善式，订期定造。彼西人必先动色相告，传播遐迩，固可稍戢其扬日本抑中国之心。日本闻中国之有备也，亦必知难而退，或者器未至而彼先服也。此古人先声后实之妙用也。

敌情

联泰西各邦以谋中国，其势可虞；分附近邻邦以合西人，其势更可虞。日本之依附西人，妄有覬觎，天下共知之矣。然东西皆有约之国，按之公法，一国不协，各国可以从中调停。而今日之中国，断不能得之于西人者，何也？彼西人之始至中国也，中国未谙外交之道，因应不尽合宜。彼疑中国之猜防之，蔑视之也，又知中国之可以势迫也，于是动辄要求，予之以利而不知感，商之以情而不即应，绳之以约而不尽遵。今中国虽渐知情伪，而彼尚狃于故智，辄思伺中国有事以图利也。中国以琉球之故，与日本稍有违言，英、德使臣虽未干预，若使与闻此事，彼必虚张日本

^① 即日本在光绪五年（1879年）并吞了琉球国。该国位于日本九州岛同中国台湾省之间，包括大隅、吐噶喇、奄美、冲绳和先岛五组群岛。

之声势，以胁持中国；彼必代日本护其短，而故评中国为非；彼必稍损中国以益日本，因以市恩于日本；彼必反谓损中国者为助中国，因以责报于中国。夫西人于条约公法研之甚熟，岂无真是非者哉？然彼欲善自为谋，势固必出于此也。往者日本将废琉球之时，昌言不愿各国公使与闻，彼素恃西人为党援，尚且如此。中国亦宜用此例，或逆拒于无形，或昌言而布告，勿使西人参与其间，则进止自由，可免掣肘之虞矣。或曰，然则中国有事，各国调停之说，终不可恃乎？曰，此其机仍在中国而已。中国能自强，即邻邦启衅，各国出而调停，未尝无小益；中国未能自强，而狡寇争雄，各国因之玩侮，必致有大损。况今驻华各使惟利是视，又值修约之际，蹈瑕伺间，诡谋百出，不豫为之防，是倒持太阿以授之也^①。至若美前总统位望较崇，宅心敦厚，未染虚诈之习，不妨倚为排解。法、美、荷兰三国，旧与琉球有约，其驻倭公使，不妨联为指臂。但恐倭人性情坚韧，未必肯听耳。若幸而转圜，固有裨补，即终不见纳，亦无后患也。或曰，天下强邦，皆有独亲独厚之国，然后缓急足倚；中国孤立久矣，今诚于修约时稍让以利，其可使之亲厚我乎？曰，相亲厚之道，在布置于平日，非一朝一夕之故。今中国让之以利，彼且谓恫喝而得之也，必有得步进步之心，是让之仍无益也。若夫英、法相亲以拒俄，俄、德相亲以制法，德、奥相亲以主东欧之政，彼其

① 太阿，亦作“秦阿”。古宝剑名。

先未始非仇敌也，一旦释怨修好，则一国顺而全局为之转移。中国与美有相助之约，则美可亲；与俄为最旧之交，则俄可亲；其他若英若德若法，苟可结约，均宜因势而导之，迎机而赴之，而此中得失，则以识彼性情为枢纽。盖尝考西人之俗矣，西人以交际与交涉判为两途，中国使臣之在外洋，彼皆礼貌隆洽，及谈公事，则截然不稍通融。中国之于各使，亦宜以此法治之，是让以虚而不让以实也。西人于练兵、造船、制器，及一切技艺，喜自耀其所长，未尝秘为独得。中国诚能切实讲求，彼谓我有自强之道，先已敬慕悦服，又知我不相鄙薄，不难罄中藏以相示，或时以微利啖之，是得其技而兼得其心也。西人颇尚豪爽，而又好为不情之请以给中国，中国宜择其可允者允之，不可允者，不妨直指利弊，告以必不能行之故，彼亦词穷而气沮，是折其非乃能折其心也。得此数者，以与西人从事，复由驻洋公使察其隐情，随宜措注，但能于诸国中得其一国，而诸国无不相助矣。近闻日本与美议立新约，美许归复日本内治之权利，日本许增两口通商以酬答之。夫此有所赠，彼有所答，是名为相让而实无所失也。而有事时可得合纵连横之助，又何惮而不为哉？且中国地博物阜，西人通商所获之利十倍于日本，彼于日本何所爱，必厚彼而薄此哉？亦在得其道而已。夫诚得西人以为外援，彼日本区区之国，将从风听命之不暇，尚何桀骜之有？

藩 邦

昔者齐桓公合诸侯，致江、黄。管仲曰：“江、黄远齐而近楚，若伐而不能救，则无以宗诸侯矣。”桓公不听。楚伐江灭黄，君子闵之；厥后卫人灭邢，莒人灭鄆，虽以齐晋之强大，不能过问。此无他，形势使然也。中国朝贡之邦，有定期者六：曰朝鲜，曰琉球，曰越南，曰缅甸，曰暹罗^①，曰南掌^②。朝鲜、琉球最恭顺，越南次之，其余三国不过羁縻勿绝而已。往者英人自印度入缅，割其西南边要地；近因国中多故，失好于英，有日蹙百里之虞。暹罗国势稍完，近亦亲慕西人，用其政俗，且绝中国朝贡。南掌介暹、缅之间，东西交迫，蚕食过半，若存若亡。此三国者，中国既不能护之以力，又不能服之以威，宜以度外置之，止其贡使，彼有急难，亦勿与知，但严修吾边备而已。至如朝鲜，襟带海表，屏障中原，无朝鲜则辽水东西，皆将受警。越南毗连两粤，孱弱已甚，屡为群寇所扰，非援以偏师，不足以固吾边圉。琉球为日本所废，中国虽争之无益，然又未可默默也。三者必皆有以处之。窃谓救琉球之患，宜待其变；去越南之患，宜审其机；防朝鲜之患，宜变其习。夫琉球弹丸小岛，逼近日本，其不能托庇中国，势也；中国受其朝贡，本至微薄，不必因此兴兵构怨，亦

① 暹罗即泰国。

② 南掌即公元857年在今老挝琅勃拉邦建立的国家，曾与我国在经济文化上有密切联系。

勢也。然日本无故废灭琉球，国人之清议不与者半，主其谋者萨摩人耳，彼遣兵设官，劳费不貲，而琉球地极硗瘠，固毫无所得。中国宜明示不贪朝贡之意，留余地以自处，兼诘其灭人宗社之故，仗大义以执言，仍于自治自强之道，实力整顿，亦即张我虚声，仿日本兵船来游之意，常选船游历东洋，以习海道。彼初得琉球，屯兵弹压，坐耗巨费，又冒不韪之名，国人之慧萨党者，必起而议其后，度彼不能无悔。俟其悔而图之，或遣大臣往议，隐予以转圜之机，则事易决也。故曰宜待其变。若夫越南为法人所侵削，失地六省，虽与法人立约议和，而国势陵夷，殆难复振。李扬才窥其可侮，从而生心，纠数千之党，徘徊边外，睚眦窜伏，谅不过草窃之辈，决非枭雄之才。然越南军久疲不练，贼既陷踞数城，有趋逼东京之势。前者中国发兵万余，由桂林出镇南关，逾二千里，出关追贼，复千余里，道远兵多，馈饷难继。贼复据险不战，以老我师，设稍有不利，损威非浅。为今之计，不必临以宿将重兵也，宜简精锐三四千人，选资望稍轻而知兵者，率之以扼贼后，相机进剿；别遣兵轮船一二号，载精卒千余，往护越南之东京。东京为通商巨埠，江海深通，往来得飘忽之机，粮械有转运之便。彼既虑我之夹击，又未测我军多寡，其众必闻风惊散。斯时进止机宜，仍用越南人为向导，越南人心既固，自可扼守城隘以绝其粮，招谕土寇以孤其党，联络民练以布其势。彼进退失据，必可成擒，所谓出奇制胜者也。故曰宜审其机。若夫朝鲜幅员之广，非不足与日本相埒，无如僻在东

海，颞颞自守；日即贫弱，俄罗斯环其北，日本逼其南，并思观衅而动，彼必不能御也。议者咸谓宜劝朝鲜与西洋诸国立约通商，俄、倭有事于朝鲜，西人忌其吞并，且碍于商务也，必起而助之。此诚牵制之良策也。然朝鲜风气未开，劝之必不肯听，就令见听，而彼与诸国相处，因应必不合宜，事变滋多，是引敌入室也。今欲使朝鲜善于择交，必先扩其闻见。按朝鲜有遣生徒入国子监读书之例，宜选其聪颖者，调入同文馆，课以洋学，数年之后，咨回本国，随才录用。中国所刊条约公法，及译刻洋学诸书，酌颁若干部于其国，渐摩既久，庶使自知孤立之形，亦渐求保邦之略。此说虽若迂缓，而实治本之图也。故曰宜变其习。夫如是，则琉球、越南已然之患，有以救之；朝鲜未然之患，有以防之；字小之道，不外乎此。其余力所不能及者，宜于无事时早为之计。不为之计，恐又有如琉球之事也。或曰，万一琉球复国，中国将仍以藩服待之乎？曰，中国之不能保琉球，地势限之也；即幸而复国，亦必设变通之法，俾可持久；否则中国以朝贡之虚名，动受制于日本也。而今则尚未遑议此也。

商 政

昔商君之论富强也^①，以耕战为务。而西人之谋富强也，以工商为先，耕战植其基，工商扩其用也。然论西人

① 商君即战国时的商鞅。

致富之术，非工不足以开商之源，则工又为其基而商为其用。迺者英人经营国事，上下一心，殫精竭虑，工商之务，蒸蒸日上，其富强甲于地球诸国。诸国从而效之，迭起争雄。泰西强盛之势，遂为亘古所未有。夫商务未兴之时，各国闭关而治，享其地利而有余；及天下既以此为务，设或此衰彼旺，则此国之利，源源而往；彼国之利，不能源源而来，无久而不贫之理。所以地球各国，居今日而竞事通商，亦势有不得已也。今以各国商船论，其于中国每岁进出口货价银在二万万两上下，约计洋商所赢之利，当不下三千万，以十年计之，则三万万，此皆中国之利，有往而无来者也。无怪近日民穷财尽，有岌岌不终日之势矣。然则为中国计者，既不能禁各国之通商，惟有自理其商务而已。商务之兴，厥要有三：一曰贩运之利。自各口通商，而洋人以轮船运华货，不特擅中西交易之利，抑且夺内地搬运之利。自中国设轮船招商局，而洋商与我争衡，始则减价以求胜，继因折阅而改图^①。彼之占我利权者，虽尚有十之四，我之收回利权者，已不啻五之三，通计七八年间，所得运费将二千万，虽局中商息，未见赢余，而利之少入于外洋者，已二千万矣。所虑者，一局之政，主持不过数人，控制二十七埠之遥，精力已难遍及；又自归并旗昌之后，官本较多，万一稍有蹉跌，其势难图再举。夫事之艰于谋始者理也，而人之笃于私计者情也。今夫市廛之内，商旅非

^① 折阅，犹言折本，亏本之意。

无折阅，而挟货而往者踵相接，何也？以人人之欲济其私也。惟人人欲济其私，则无损公家之帑项，而终为公家之大利。为今之计，虽难用众建少力之法，骤分数局，他日如必有变通之势，或即用局中任事之商，兼招股实明练者，量其才力资本，俾各分任若干埠，无论盈亏得失，公家不过而问焉。此外商人有能租置轮船一二号，或十余号，或数十号者，均听其报名于官，自成一局。又恐商情之相轧也，则督以大员而齐其政令；恐商利之未饶也，则酌拨漕粮而弥其缺乏。但使商船渐多，然后由中国口岸，推之东南洋各岛，又推之西洋诸国。经商之术日益精，始步西人后尘，终必与西人抗衡矣。其利岂不溥哉？一曰艺植之利。今华货出洋者，以丝茶两款为大宗。而日本、印度、意大利等国，起而争利，遍植桑茶。印度茶品，几胜于中国；意大利售丝之数，亦几埒于中国。数年以来，华货滞而不流，统计外洋所用丝茶，出于各国者，几及三分之二。若并此利源而尽为所夺，中国将奚以自立？是不可不亟为整理者也。整理之道，宜令郡县有司劝民栽植桑茶。盖种桑必有高亢之地，而种茶恒在山谷之中，非若罌粟之有妨稼穡，是在相其土宜，善为倡导而已。其缫丝之法、制茶之法，有能刻意讲求者，宜激劝而奖进之。至于丝茶出口，十数年前，以加税为中国之利，今则各国起而相轧，一加税则价必昂，价昂则运货者必去中国而适他国，而税额必为之大减。夫西洋诸国，往往重税外来之货，而减免本国货税，以畅其销路。今中国丝茶两宗，虽不必减税，亦不宜加税。但

使地无闲旷，则产之者日益丰，而其价日益廉，即出口之货日益多，不特于税务有裨，亦为民兴利之一大端也。一曰制造之利。英人用机器织造洋布，一夫可抵百夫之力，故工省价廉，虽棉花必购之他国，而获利固已不赀，每岁货价之出中国者数千万两。中国海隅多种棉花，若购备机器，纺花织布，既省往返运费，其获利宜胜于洋人。然中国虽有此议而尚无成效者，何也？创造一事，人情每多疑沮，其才足以办此者，苦于资本难集，而一二殷商，又以非所素习而不为，此大利所以尽归洋人也。窃谓经始之际，有能招商股自成公司者，宜察其才而假以事权，课其效而加之优奖，创办三年之内，酌减税额以示招徕，商民知有利可获，则相率而竞趋之。迨其事渐熟，利渐兴，再为厘定税章，则于国课必有所裨，推之织毡、织绒、织呢羽，莫不皆然。夫用机器以代工作，嫌于夺小民之利。若洋布以及毡绒呢羽，本非出自中国，中国多出一分之货，则外洋少获一分之利，而吾民得自食一分之力，夺外利以润吾民，无逾于此者矣。是故中国之于商政也，彼此可共获之利，则从而分之；中国所自有之利，则从而扩之；外洋所独擅之利，则从而夺之。三要既得，而中国之富可期，中国富而后诸务可次第修举。如是而犹受制于邻敌者，未之有也。

船 政

今将乘时势，规远图，修利器，上之固我藩篱，成军于海峽，次之兴我贸易，藏富于商民，则整理船政，其急

务矣。自闽、沪设厂仿造轮船以来，迄于今日，华匠能以机器造机器，华人能通西法作船主，功效不为不著；然造船愈多，则养船之费愈重，闽厂以经费支绌告者屡矣。局外不察，从而议之，至谓工厂可撤，轮船可废。不知西人每造一器，成一艺，其劳费倍蓰于中国。先难后获，凡事皆然。夫为之而旋辍，不如其勿为。掷千百万之巨款，忽弃已成之功，灰志士之心，长敌人之气，失策莫甚于此矣。虽然，欲理船政，必先筹费，船政日渐扩充，而专待公家之帑项，其势固有所不支。往岁议定华商雇买轮船章程，然自招商局外，并无商人在厂租造轮船者。何则？中国商务既未甚兴，即有一、二购船之商，亦远赴外洋各厂，盖以洋厂购船之价，较廉于华厂造船之价也。然则中国之船政，欲广招徕，莫如研求厂务，俾船价与外洋相等，必无舍近图远之人。欲谋持久，莫如经营商务，俾用船与外洋相等，必有日新月异之象。况商船既多，则入厂修船者，迭至而不穷。而租船造船之商，皆事势所必有。他日由一厂分为数厂，而公家之帑项，可毋甚费，且船商既盛，而兵船不患无养之之资。是论今日之船政，舍振兴商务，无他术矣。若夫目前补救之策，如奉天、直隶、山东、浙江等省，已各调轮船一二号，为巡洋捕盗之用，而供其岁费，所以稍纾船厂之力也。然节于此，仍费于彼，亦非可久之道。是宜察沿海水师之可减者，若红单艇船，若阔头舳板，各裁去数十号，或分防陆勇裁去数百人，均可养兵轮船一号。在各省大吏，相其形势而酌剂之，而轮船之分隶各省者，又

当得精研洋学、闳达沈毅、知兵之大帅，统归节制，以壹号令，每岁会操一二次，察各统将之勤惰能否而进退之。庶中国多造一船，可多得一船之用矣。虽然犹未也，闻华民之寓居外洋也，往往以势孤气绥，为他国之人所轻侮。盖西洋通例，虽二三等之国，莫不有兵船巡历外埠，名为保护商人。曩者扬武练船游阅东南洋各岛，而吕宋旅居华民，喜色相庆，至于感泣，以为百年未有之光宠。一埠如此，他埠可知。间尝取海外华人之数，合佣工商贾并计之，吕宋一岛约四五万人，新加坡及槟榔屿诸岛约十万，美国旧金山及其近埠约十四万，流寓越南及西贡等处约三十万，古巴、秘鲁各十余万，其他若日本、若新金山、若太平洋之檀香岛，厥数或逾万，或不及万。凡华人聚居之处，莫不有会馆，有经董，彼皆自愿集资，引领以望华官之至也久矣，而兵船抑无论也。盖养一兵船，岁费不过二万两，以一埠六万人计之，每三人而蠲费一两，尚易为力，况其中必有殷实商人为之倡者。彼略有所费，而藉华船保护，稍张声势，便足与诸洋人齿，偶有交涉，隐受无穷之益，此必华民所乐闻者也。为今之计，宜告驻札各国公使，如各埠华民，有愿得中国兵船以壮声威者，自筹岁费报明领事，领事请公使咨船政，船政酌度拨遣，或一年调还，或半年调还，再选他船更番前往，藉资游练。如一埠不能养一船者，或数埠共养一船，使之往来于其间。中国有事，则悉数召归，以备调遣。夫如是，船厂无养船之费，而获捍御之资；兵船无坐食之名，而有历练之实；商贾佣工，蠲费

不多，颇沾利益；公使领事，权力虽弱，亦倚声援。盖一举而数善备焉。而中国商船之远适他邦，未始不以此为之嚆矢，是又振兴商务之要端也夫。

矿 政

今天下日趋于贫之故，大端有二：一则商务不盛，利输于外，犹水之渐泄而人不知也；一则矿政未修，货弃于地，犹水之渐涸而人不知也。盖天地生人、养人之具，火化之用，莫大乎煤；转移之用，器械之用，莫大乎五金，此中外不易之势也。中国于取煤之法，虽研之未精，而民间犹或务之；其取五金之法，则废而不讲久矣。《周礼·冢人》一官，掌金玉锡石之地，若以时取之，则物其地图而授之。知古圣人经纬天下，所以为斯民利用厚生者，筹之盖详。《汉书·地理志》州郡有铜官、铁官者凡数十处。迄于唐宋，未尝不采取五金，其事时见于史传。自明之晚季，以矿税为厚敛之端，宦竖四出，征求无艺，有司因之苛派百姓，海内骚然。当时既受其弊，后世遂相戒不敢复议。此矿政所以不修也。近数百年来，天地菁英之气，郁而不发，乡曲土豪与无业游民，遂敢纠党开矿，作奸犯科，抗拒官吏，幸而逐之，当事者虑其易聚难散，不得不封闭矿洞，垂为厉禁，而矿政益以不修矣。由前之说，弊在所任非人，藉其名以渔利，而并无其实，固不当因噎而废食也。由后之说，弊在委弃宝藏，故玩法者欲起而攘之，将防玩法之民，先收自然之利。苟上有治之之法，而民自难循于法之外也。

然而犹有狃于故见，而或疑为多事者，亦可谓不审于时与势之宜者矣。夫民于五金之用，一日不可缺，一人不可无。今以天下之大，而所用铜铁，皆仰给外洋。至于金银，如英美所属之新旧金山，每岁出于矿者数千万，奚啻取之如泥沙。中国无生之之道，仅以古昔所有，互相转输，又已用之尽锱铢。通商以来，仅三十年，而外国日富，中国日贫；复数十年，则益不可支矣。是可不筹所以振之哉？且中国矿产之饶，甲于地球诸国，苟善取而善用之，固大可为之资也。而论采取之道，则官商分办之外，惟矿屯一法为最善。何以言之？今天下额设绿营之外，每省各有防营，无事坐食，既糜巨饷，去之又不足以建威销萌，益示弱于邻敌。是以新疆之豫军、畿辅之淮军，莫不经理屯田以裨军食，其他如河防、水利、炮台、城垣诸工，亦往往借助于各营，此诚撙节财用、酌剂盈虚之要道也。窃闻西南滇、黔、楚、粤、陇、蜀诸省，五金并产，宝气充积，诚择矿苗最旺之山，每省先拨一二营试行采炼，于以创开风气，逐渐推广，有六利焉。向闻佣工开矿，一人所获，每敷一人之食，如得佳矿，即有赢余。营勇开矿，计每丁终岁所获，即不能抵所支之饷，如或仅抵十之五六，亦可省营饷之半也。若矿屯渐多，即所节甚巨，其利一。勇丁游闲无事，浸至习成骄惰，骚动间阎。今于操练之余，课以矿务，使之勤动于山谷之间，犹得葆其朴勇之气，其利二。矿产皆在穷岩绝峤辽廓之区，于此分屯各营，则苗蛮有慑服之心，客匪绝占踞之望，其利三。官商开矿，筹本最难，本之难筹，

尤以工费为大宗。营勇有额支之饷，经始之初，只须购机器，订矿师，成本既轻，事乃易集，其利四。矿务既兴，则运送必有舟车，淘炼必有工匠，未始非小民谋食之资，其利五。无论金银铜铁，中国之所出渐多，则外洋之来者渐少，一年计之而不足，数十年计之而有余，其利六。有此六利，则矿屯之举，尤胜于官商之经营也审矣。若夫选将领，择官吏，联民情，定规制，则恃乎各省大吏之体察情势，访求人才，视其意之轻重，而效之大小判焉。昔宋苏轼治徐州，以利国监为铁官，商贾所聚，凡三十六冶，冶各百余人，采矿伐炭，多强力鸷忍之民，欲使冶户各出十人，籍其名于官，授以刀槩，教之击刺，每月庭集而阅试之，以待大盗，此寓强于富之术也。而矿屯之说，则足以寓富于强。推而行之，富一方可，富天下亦可。譬犹导水者之引其泉，将滚滚而不竭也，而岂有泄涸之患也哉？

利权一

自来有天下者，取诸民以制国用，即量所入以治民事，此古今不易之通义也。孟子论取民之法，准乎什一，以为轻乎此与重乎此，举非尧舜之道。盖必如是而后用可足，用足则事治，事治则民治也。后世幅员日广，道路之转输有费，官吏之征调有费，往往取之甚轻，而民之所供已至数倍。况地之肥饶，民之勤惰，万有不齐，于是取民之制，不得不务从其俭，以恤民艰。我朝承明代加赋之后，悉除一切无名赋额，厚泽深仁，旷古未有。通计一岁取诸民者，惟

江浙腴壤，于什一为近，此外由内地推之边省，又推之阨脱荒远之区，有数十而取一者，有数百而取一者，并有羈縻勿绝，一无所取者。盖地旷民贫，不得不薄赋以示绥怀，相承久矣。然其当治之事，当设之防，或更倍于内地，又不能以取之者微，而置之不理。故合计天下地丁正赋，约二千余万两，仅足供绿营兵饷之用；而其余出款尚繁，入款有限，即令无偏灾，无大役，犹且汲汲不遑。迨稍值事变，不得已而议开捐例，议减俸廉，议令州县摊捐各款，所得甚隘，而其弊不可胜穷也，所节甚微，而其耗不可胜言也。曩者粤孽构难^①，一时名臣谋士创为榷货抽厘之法，诚以有寇不能不募兵，有兵不能不筹饷，自然之势也。明之晚季，军饷皆出于加赋，一丝一粟必取之力田之农，农之谋食也艰，稍夺其事畜之资，即已流亡失业，所以流寇愈炽，驯至事不可为。若夫厘金悉取诸商，商有余资，以营贸易，莫不自顾身家，且所抽之厘，仍加诸所售之货之价，则于商并无所损，而其利实取之众人，所以积少成多，而民无大怨。各省厘金最旺之时，通计岁收不下二千万两，今亦有一千四五百万两。所以能剿除群寇，懋成中兴之业者，职是故也。夫明之贻误，与今之成功，其得失较然明矣。迨者军事渐平，而经理厘务之人，或失其初意，不无病民之事，于是论时务者，莫不扼腕抵掌，欲去厘金，而洋人亦遂执洋货免厘之说，以继其后。夫厘金果不便于民，俟中

^① 粤孽是对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的污称。

国财用充足，徐图裁减可也，外人而挠我自主之权不可也。中国整饬厘金之弊，严杜中饱，俾商民乐业可也，予洋人以垄断之柄不可也。何也？洋货既免厘，必旋及于土货。洋商之运货免厘，必更揽庇华商之货。厘金之利，岂不尽失耶！且今军事虽平，而各路防营尚不可撤，各省田赋尚未复额，一切城廨仓狱善后之工，尚未尽修，莫不恃厘金为挹注。苟或去之，则拘挛贫弱，百务俱废。异日彼乘我无备，求减洋税，将何以应之？且华商因避厘金之故，竞买税单，而洋税因之稍旺，厘金既去，则洋税必多偷漏。是洋税随厘金而减者，又自然之势也。万国公法有之曰，凡欲广其贸易，增其年税，或致他国难以自立自主，他国同此原权者，可扼之以自护也。又曰，若于他国之主权、征税、人民、内治有所妨害，则不行。今各国徇商人无厌之请，欲有妨于中国，其理之曲直，不待言而明矣。

利权二

凡两国交涉之事，条约所及者，依约而行，条约所不及者，据理而断，中外各国所以敦睦谊于不敝也。按旧约：各货纳税后，即准由中国商人遍运天下，路过税关，不得加重税则，只可按估价则例，每两加税，不得过若干分^①。此约立于道光二十二年，维时海内无事，田赋足额，尚无厘金名目；当事者又不知中国税额，较之地球各国，有轻

^① 详见《南京条约》。

至四五倍、七八倍者，故与洋人立约如此耳。厥后天下多故，饷无所出，始创为抽厘之法。盖西国通例，量出为入，一岁中有额外用度，辄加派于各项之中，或有兵事，亦由众商捐集巨饷。殆与中国抽厘名异实同，而于例定之商税，则迥不相涉也。夫中国有自主之权，军饷筹之中国，非各国所能干预。创办厘捐之初，洋商之货，亦在各子口抽课，均无异辞。迨咸丰八年、十一年订立条约与各口通其章程，始议定洋货土货，倘愿一次纳税，免各子口征收纷烦，每百两征银二两五钱，给予半税单，为他子口毫不另征之据；其不领税单者，仍应逢关纳税，遇卡抽厘。斯乃格外通融之法，体恤洋商，已无微不至。彼洋商运洋货，以子口半税，抵内地厘捐，其获利过于华商远矣。然而商人无厌之求，靡所底止。往岁滇案未结，英国威使复徇奸商之请，借端要挟，所欲甚奢，日久相持，始立《烟台条约》，定于租界内不抽洋货厘金，又洋货运入内地，不分华商洋商，均可请领半税单。是又格外通融之法，所以优待洋商，流通洋货者，至矣尽矣，蔑以加矣。闻各国议院于中国厘金一事，本不以为非。戊寅八月新闻纸：英之大臣，以《烟台条约》未遽核准，并有虑中国之责其食言者。威使徘徊观望，其理既绌，其气自衰。彼之本计，不过俟德、法诸国修约之后，坐享其成，其或从中播弄，或隐为主谋，均未可知。然各国所据以争者，旧约之说也。盖尝细绎旧约之意，当时既并无厘卡，则内地只有常关耳。常关税额，较轻于洋关，其曰路过税关不得加重税则者，譬如江海关纳

税复过苏关，浙海关纳税复过杭关，均不再按值百抽五之例纳税耳。然该关之税，仍自当完，故后此议定不领税单者，有逢关纳税之款，而各商无不遵行。至厘卡收捐，专为筹饷而设，名之曰捐，则非税可知，名之曰卡，则非关可知。二者既不能相混，则条约固无不得抽厘之文，彼西人将何说之辞？且查同治元、二年间，上海洋商屡请领事阻止租界抽厘，英国卜公使批札驳斥，法、美两使亦意见相同。乙亥七月新闻纸录《字林新报》，有同治二年英使批上海英领事禀，并美国外务大臣复英公使之语，均言租界应由华官抽收华商之捐。夫租界且如此，况在租界之外？举是以折之，而彼当无辞也。洋人之货，一入华人之手，听其或留或售，或用或不用，洋人不得过而问焉。则华人以名义所在，自捐公家之饷，亦固其所。西洋诸国，无物不征，无人无事不征，即如商贾，既税之于合伙，又税之于出入货物，又税之于发收银钱，又税之于每岁所赢之利。其征敛之繁，十倍中国。设使中国欲减其税项，以便华货之畅行，彼能允之乎？举是以折之，而彼当无辞也。洋人说，动谓以厘金之故，致洋货阻滞不行。考近年进口洋货，每岁值银至八千万两以外，较之十数年前，几逾一倍，可谓年盛一年矣。而犹云贸易不畅，其将谁欺？举是以折之，而彼又当无辞也。总之，洋商于已得之利，则习而忘之，未得之利，则变幻百出以图之，充其无穷之欲壑，虽尽去商税，犹未以为足也。众商日聒之领事，领事日唆之公使，公使非不知事之难行，姑肆其恫喝以尝试中国，幸而得请，可

以要誉市恩，万一中国必不能允，彼亦有辞以谢众商矣。然则应之者，在洞烛其情，始终勿为所摇而已。

利权三

间尝闻西人为持平之论者曰：“洋商之求免厘金，非敢于中国之政，特以中国厘卡林立，收数互有异同，运货者不能约定成本，恐多折阅耳。”审如是，则加洋税免厘金之说也。昔者日尔曼未一统之时^①，小邦棋布，关税繁苛，百货不能流通。自普人称雄，始集各邦议立统关，入口货但征税一次，税亦视前加重，以各邦幅员之大小，按月均分。近者德相毕士麻克，又在其国议加进口税。今裁撤厘金之议，德使巴兰德颇主之，若知中国必不能允，彼或以统关之说进。然中国之形势，与德国异，中国之地，以开方道里积算，赢于德国者几及二十倍。各省各口所设厘卡，皆有必不可缓之用，待以支销。今洋关加税少，中国万不敷用；加税多，洋人又未必愿也。则惟有坚持旧章，与之驳辩而已。且中国所需之物，只有此数，即去厘金，贫民不必因之多用洋货。其贩运在数百里内者，抽课本微，即或道路绵远，纳厘较多，获利亦较厚，其数辄加之售货之内，而华民亦不因此少用洋货，是厘金并无损于洋商也。中国之护商旅也，陆路则有防勇，水路则有水师，皆恃厘金以给巨饷。去厘金，必去水陆各营，盗贼之起，何以弹压？洋

^① 日尔曼即今德国。

货土货，皆将阻滞不行，是厘金大有益于洋商也。夫无损如彼，有益如此，然而巴使拾威使之绪余，起而相争，彼谓天下强国，德犹出英之上，故凡英所不能行于中国者，欲竟而得之，以示豪举。然窃以为误矣。巴使于约章之原委，厘务之窾要，实未究心，徒受威使之愚弄而不自知。今以洋船贸易论，英商居十之七，美、德、法及东西洋各国，共居十之三，就令争而获利，亦不过英取其十而德取其一。威使自知无可置喙，乃嗾巴使于修约之时，强中国以所难行，事成则英商坐享其利，不成则德人且以不谙公法，为笑于天下。威使为英计则得矣，何英之智而德之愚耶？德之君相，素以豪杰成名，一闻此中曲折，亦必不以巴使为然也。或曰：“中国加洋药之税，罢洋货之厘以相抵，可乎？”曰，抽厘则利权在我，加税则利权在彼，即令倍加洋药之税，与厘金若足相抵，然洋药在中国，例本当禁，专恃此为利源，名已不顺，万一异日有可禁之机，必以碍于帑项而中止，是使中国留终古之毒也。且洋药之为物，轻微易藏，在于把握，若加税过重，偷漏必多，仍无补于国计，而厘金之利，则一去不可返矣。威、巴诸使每举关卡一二小节，以为要挟罢厘之辞，不知此等乃通商常有之事，就案清理则可，借为要挟之资则不可，而况彼之所晓谕者，又各有一是非也。然则洋货加税之说可行乎？曰，必不得已，如所加之数，逮于厘金之数，又于立约之时，善防其弊，则固未尝不可行。西洋各国税额，大较以值百取二十、取四十为衡，又多则有值百取六十者，有值百取百者，又有通行免关税者。盖

于轩轻之中，各寓自私之计，不若中国之大公无我，出入一体。今酌中定论，自洋药而外，均以值百取二十为断，或于厘金所失之数，稍足相偿乎。

利权四

自巨寇窃发以来，军饷告匱，始立榷厘之法。古之人有行之者，汉之算缗，唐之除官钱，宋之头子钱，其意皆相同也。救时之彦，创为此策，而军饷赖以支持者，逾二十年。迨者群寇削平，洋人颇谓军事起则抽厘以助饷，军事定宜免厘以恤商，不知此说似是而实非者也。盖自各国通商，而洋货之贩运，洋人之游历，日益繁多，不能无水陆各营，以资保护，不能无船政机器诸厂，以精制造，不能无江海各隘炮台，以固藩篱。凡若此类，虽质之洋人，必皆谓当为之事，而岁出之经费，亦十倍于前日。是故通商之事，既不可废，则各项经费，一日难减，即各省厘课，一日难停也。夫中国于厘务，苟持之甚坚，洋人或出于加税之一说，万一所加之数，竟如中国所需之数，则其中又有利有弊。何也？当子口税章初定之时，洋商以半税而免内地厘金，其利本优于华商，华商之巧者，不免与洋商狼狈相倚，谤张为幻^①，于是有代华商领半税单，而取其规费，有用运照庇送无运照之土货，有用洋船代洋商携带洋药各货，有凭运照免纳厘金，未到子口之先，已将土货销售。是

^① 谤张：欺诳。《书·无逸》：“民无或胥谤张为幻”。

洋税与厘金，均受其病也；是使守分之华商，不能获利也；是驱守分之华商，不得不为奸商也。今定税例，华商洋商一律，凡进口之洋货，纳税于海滨之通商正口，凡出口之土货，纳税于内地之第一子口；各厘卡量加裁并，论其大势，宜密于近海，而疏于内地，用新定税额，一征之后，任其所之，不复重征。是举前此弊端，一举而清之也，不必立防弊章程，而弊自绝矣。内地各省，只须于最要之口，设立总卡，既可撙节浮费，而华货贩运较近者，并无所征，则小民咸受其益，此皆中国之利也。然而犹有虑者，厘金取之华民，中国有自主之权，今既尽归之洋税，设洋人于下次修约，复以税重为言，势必致固有之利权，动为洋人所牵制。是宜于立约时，声明加税与停厘相抵，如异日酌减税额，亦宜酌复厘金，以昭平允，永杜洋人之借口，此一端也。中国既权厘金所入，尽归之洋税，其或华人自在内地贩运土货，若免其征税，既恐洋商隐附于华商，以滋弊混，若偶经一卡，而亦用值百抽二十之例，势必有所难行。是宜明订章程，核定道里之远近，如某处至海口，须经几卡，则货税亦可作几次分缴，如是则华人不以苛敛为苦，而所经各卡节节稽征，洋税不能偷漏，此又一端也。二端既立，乃可祛其弊而收其利矣。然则中国既得其利，洋商独无利乎？曰：有。洋商运货入中国，可豫定成本若干，赢余若干，操券而来，必如愿而返，利一也；关税交纳之后，运入内地，无守候验货之烦，无逐卡停留之苦，行运既速，成本较轻，利二也；洋商一次纳税，虽若稍重，然隐加之

售价之内，仍取偿于华民，华民但知洋货之不复纳税也，无不乐于贩运，或益从此畅销，利三也。利之所在，显然易明，洋人何惮而不为？然窃料洋人昧于远图，而溺于近利，加税一说，势固必不我从也。则惟有坚持旧章，与之驳辩而已。

变 法

窃尝以谓自生民之初，以迄于今，大都不过万年而已。何以明之？以世变之亟明之也。天道数百年小变，数千年大变。上古猿榛之世，人与万物无异耳。自燧人氏、有巢氏、包羲氏、神农氏、黄帝氏，相继御世，教之火化，教之宫室，教之网罟耒耨，教之舟楫、弧矢、衣裳、书契，积群圣人之经营，以启唐、虞，无虑数千年，于是鸿荒之天下，一变而为文明之天下。自唐、虞迄夏、商、周，最称治平。洎乎秦始皇帝，吞灭六国，废诸侯，坏井田，大泯先王之法。其去尧舜也，盖二千年，于是封建之天下，一变而为郡县之天下。嬴秦以降，虽盛衰分合不常，然汉、唐、宋、明之外患，不过曰匈奴，曰突厥，曰回纥、吐蕃，曰契丹、蒙古，总之不离西北塞外诸部而已。降及今日，泰西诸国，以其器数之学，勃兴海外，履垓埏若户庭，御风霆如指臂，环大地九万里，罔不通使互市。虽以尧、舜当之，终不能闭关独治。而今之去秦、汉也，亦二千年，于是华夷隔绝之天下，一变而为中外联属之天下。夫自群圣人经营数千年，以至唐、虞，自唐、虞积二千年，以至秦始皇，自始皇积

二千年，以至于今，故曰不过万年也，而世变已若是矣。世变小，则治世法因之小变；世变大，则治世法因之大变。夏之尚忠始于禹，殷之尚质始于汤，周之尚文始于文、武、周公，阅数百年，则弊极而变，或近至数十年间，治法不能无异同。故有以圣人继圣人，而形迹不能不变者，有以一圣人临天下，而先后不能不变者。是故惟圣人能法圣人，亦惟圣人能变圣人之法。彼其所以变者，非好变也，时势为之也。今天下之变亟矣，窃谓不变之道，宜变今以复古；迭变之法，宜变古以就今。呜呼！不审于古今之势，斟酌之宜，何以救其弊？且我国家集百王之成法，其行之而无弊者，虽万世不变可也。至如官俸之俭也，部例之繁也，绿营之窳也，取士之未尽得实学也，此皆积数百年末流之弊，而久失立法之初意。稍变则弊去而法存，不变则弊存而法亡。是数者，虽无敌国之环伺，犹宜汲汲焉早为之所。苟不知变，则粉饰多而实政少，拘挛甚而百务弛矣。若夫西洋诸国，恃智力以相竞。我中国与之并峙，商政矿务宜筹也，不变则彼富而我贫；考工制器宜精也，不变则彼巧而我拙；火轮、舟车、电报宜兴也，不变则彼捷而我迟；约章之利病，使才之优绌，兵制阵法之变化宜讲也，不变则彼协而我孤，彼坚而我脆。昔者蚩尤造兵器，侵暴诸侯，黄帝始作弓矢及指南车以胜之；太公封齐，劝其女红，极技巧，通鱼盐，海岱之间，敛袂往朝。夫黄帝、太公，皆圣人也，其治天下国家，岂仅事富强者，而既厕于邻敌之间，则富强之术，有所不能废。或曰：“以堂堂中国，而效法西

人，不且用夷变夏乎？”是不然。夫衣冠、语言、风俗，中外所异也；假造化之灵，利生民之用，中外所同也。彼西人偶得风气之先耳，安得以天地将泄之秘，而谓西人独擅之乎？又安知百数十年后，中国不更驾其上乎？至若赵武灵王之习骑射，汉武帝之习楼船，唐太宗驾馭蕃将与内臣一体，皆有微旨存乎其间。今诚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俾西人不敢蔑视中华。吾知尧、舜、禹、汤、文、武、周、孔复生，未始不有事乎此，而其道亦必渐被乎八荒，是乃所谓用夏变夷者也。或又曰：“变法务其相胜，不务其相追。今西法胜而吾学之，敝敝焉以随人后，如制胜无术何？”是又不然。夫欲胜人，必尽知其法而后能变，变而后能胜，非兀然端坐而可以胜人者也。今见他人之我先，猥曰不屑随人后，将跬步不能移矣。且彼萃数百万人之才力，掷数千万亿之金钱，穷年累世而后得之，今我欲一朝而胜之，能乎？不能乎？夫江河始于滥觞，穹山基于覆篑。佛法来自天竺，而盛于东方，算学肇自中华，而精于西土。以中国人之才智视西人，安在其不可以相胜也？在操其鼓舞之具耳。噫！世变无穷，则圣人御变之道，亦与之无穷。生今之世，泥古之法，是犹居神农氏之世，而茹毛饮血，居黄帝之世，御蚩尤之暴，而徒手搏之，辄曰：“我守上古圣人法也。”其不急且蹶者几何也！且今日所宜变通之法，何尝不参古圣人之法之精意也。

《出使日记》节选^①

光绪十六年（庚寅）

正月二十五日记

乍雨乍止。舟指正西，风大，舟甚荡，呕者极多。寒暑表八十四度。昨午至今午，行三百三十一海里，在赤道北六度四分，北京西二十六度三十一分（巴黎东八十七度三十八分）。余与同人谈及，昨所经之香港、新加坡等埠，五六十年前皆荒岛也。洋人藉经营商务，辟荒岛为巨埠，而英人尤擅能事，以英人于商务最精也。当缔造之初，必审其地为水陆要冲，又有泊船避风之澳，有险要可以扼守，有平地可以建屋，于是招致商民，创辟市廛。未几，而街衢、桥梁、闾阖、园林，无不毕具。又未几，而电线、铁路、炮

^① 薛福成1889年出任驻英、法、比、意四国公使。所记的《出使日记》较为集中地反映了他的变法主张和发展中国工商业的要求。

台、船坞，无不毕具。浸至商税之旺，民物之殷，辄与中国之上海、汉口相颉颃。夫商为中国四民之殿，而西人则恃商为创国、造家、开物、成务之命脉，迭著神奇之效者，何也？盖有商，则士可行其所学而学益精，农可通其所植而植益盛，工可售其所作而作益勤。是握四民之纲者，商也。此其理为从前四海之内所未知，六经之内所未讲；而外洋创此规模，实有可操之券，不能执中国“崇本抑末”之旧说以难之。因思神农氏日中为市，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以王天下；齐太公劝女红，管子正盐筴，而诸侯敛袂朝齐。是商政之足以奔走天下，古之圣贤有用之者矣。盖在太古，民物未繁，原可闭关独治，老死不相往来；若居今日地球万国相通之世，虽圣人复生，岂能不以讲求商务为汲汲哉！

正月二十六日记

乍雨乍晴。舟仍西指，风微，舟稍平。寒暑表八十四度。昨午至今午，行三百十三海里，在赤道北六度七十七分，北京西三十一度四十八分（巴黎东八十二度二十一分）。余观火轮舟车之迅捷，因念人心由拙而巧，风气由朴而华，固系宇宙间自然之理。自开辟以后不知几何年，古圣人始创为舟车、为弧矢；乃阅四千数百年以迄于今，弓矢变而为枪炮，舟车改驶以火轮。从前中国小说家言，有所谓腾云者，有所谓千里眼、顺风耳者，谓不过荒唐悠谬之言，断难征之实事。今则乘气球者，非所谓腾云乎？电线、德律风，传数万里之报于顷刻，不更捷于千里眼、顺

风耳乎？即轮船日行千余里，轮车日行二千余里，虽腾云之速，当亦不过如是。盖世事递变而益奇，昔之幻者今皆实矣。夫古圣人制作以来，不过四千数百年，而世变已若是；若再设想四五千年或万年以后，吾不知战具之用枪炮，变而益猛者为何物？行具之用火轮舟车，变而益速者为何物？但就轻气球而论，果能体制日精，升降顺逆，使球如使舟车，吾知行师者水战、陆战之外有添云战者矣，行路者水程、陆程之外有改云程者矣。此外，御风、御云、御电、御火、御水之法，更当百出而不穷，殆未可以意计测也。

闰二月二十四日记

赴蜡人馆观蜡人。其法，以蜡仿制生人之形，自王公卿相以至工艺杂流，无不可留像于馆。或立或坐，或卧或俯，或笑或哭，或饮或博，无不毕具。凡人之发肤、颜色、态度、长短、丰瘠，无不毕肖，殆所谓神妙欲到秋毫巅者。闻其法，系一老媪创之，今盛行于欧洲各国，未百年也。

又赴油画院观普法交战画图。其法为一大圆室，以巨幅悬之四壁，由屋顶放进光明。人入其中，极目四望，则见城堡、冈峦、溪涧、树林，森然布列。两军人马杂遝，放枪者、点炮者、擎大旗者、挽炮车者，络绎相属。各处有巨弹坠地，则火光迸裂，烟焰迷漫。其被轰击者，则断壁危楼，或黔其庐，或赭其垣。而军士之折臂断足、血流殷地、偃仰僵仆者，令人目不忍睹。仰视天，则明月斜挂，云

霞掩映。俯视地，则绿草如茵，川原无际。情景靡不逼真，几自疑身外即战场，而忘其在一室中者。迨以手扪之，始知其为壁也，画也，皆幻也。夫以西洋油画之奇妙，则幻者可视为真；然普法之战逾二十年，已为陈迹，则真者亦无殊于幻矣！

三月十五日记

西人之恪守耶稣教者，其居心立品，克己爱人，颇与儒教无甚歧异。然观教会中所刊新旧约等书，其假托附会，故神其说，虽中国之小说，若《封神演义》《西游记》等书，尚不至如此浅俚也。其言之不确，虽三尺童子皆知之。余偶遇西国积学之士，与谈耶稣教旨，似皆已觉之而不肯明言；亦竟有言一二百年后，西国格致之学日精，必多鄙弃教会诸书者。及论孔子之教，则皆同声推服，并无异言。虽西人亦雅善酬应，然余察其辞色，似出于中心之诚然。盖圣人之道，不偏不易，深入人心。以耶稣之说比儒教，不仅如水晶之比玉，虽洋人未尝不知。从前中国之杨、墨、佛、老，非不鼓动一时，积久已自衰息；孔子之教，则如日月经天，阅万古而益明。欧亚诸洲，不与中国相通则已；通，则其教未有不互行者。余是以知耶稣之教之将衰，儒教之将西也。

四月庚子朔记

欧美两洲，各国勃焉兴起之机，在学问日新，工商日

旺，而其绝大关键，皆在近百年中；至其所以横绝地球而莫与抗者，不过恃火轮舟车及电线诸务，实皆创行于六七十年之内，其他概可知矣。今之议者，或惊骇他人之强盛，而推之过当；或以堂堂中国何至效法西人，意在摈绝，而贬之过严。余以为皆所见之不广也。

夫西人之商政、兵法、造船、制器，及农、渔、牧、矿诸务，实无不精；而皆导其源于汽学、光学、电学、化学，以得御水、御火、御电之法。斯殆造化之灵机、无久而不泄之理，特假西人之专门名家以阐之，乃天地间公共之道，非西人所得而私也。中国缀学之士，聪明才力岂逊西人？特无如少年精力，多糜于时文试帖小楷之中，非若西洋亿兆人之奋其智慧，各以攻其专家之学，遂能直造精微。斯固无庸自讳，亦何必自画也。

上古之世，制作萃于中华。自神圣迭兴，造耒耜，造舟车，造弧矢，造网罟，造衣裳，造书契。当鸿荒草昧，而忽有此文明，岂不较今日西人之所制作尤为神奇？特人皆习惯而不察耳。即如《尧典》之定四时，《周髀》之传算术，西人星算之学，未始不权舆于此。其他有益国事民事者，安知其非取法于中华也？昔者宇宙尚无制作，中国圣人仰观俯察，而西人渐效之；今者西人因中国圣人之制作，而踵事增华，中国又何尝不可因之？若怵他人我先，而不欲自形其短，是讳疾忌医也。若谓学步不易，而虑终不能胜人，是因噎废食也。夫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冰凝于水而寒于水，巫臣教吴而弱楚，武灵变服以灭胡，盖相师者未必无相胜

之机也。吾又安知数千年后，华人不因西人之学，再辟造化之灵机，俾西人色然以惊，圣然而企也？

四月初八日记

西洋各国，陆军以德国为最胜，水师以英国为最精，固已然。不必英与德也，余观各国营伍，无不步伐整齐，操练精熟，多有一定步骤，非可尺寸逾越。其所以骤胜中国之故，厥有两端：

一则中国三代以前^①，文武原未尝分途，汉唐犹存此意。宋明以来，右文轻武，自是文人不屑习武，而习武者皆系粗材。积弱不振，外侮迭侵，职此之由。泰西各国，选将练兵，皆出学校。武备一院，选聪颖子弟读书十数年，再令入伍习练。虽王子之贵，皆视为急务。历练既深，又多学问，故无不精娴韬略。夫西人选择精，读书久，阅历深，而始能当一兵，其所以制胜者在此。一隶营籍，则平日见重于闾里，如中国诸生之列胶庠。即年满告退，亦有半饷以贍其老。所以能使乐于从事，不惮致其毕生之力，而将才亦因以辈出也。

一则兵事不尚空谈，贵乎实练。中国兵法之有专家，始于战国之时。厥后汉之韩信，唐之李靖，皆有兵法传于世。盖此中竅要，非可卤莽，宜有心得也。宋明以后，渐失其传，非乌合之众侥幸于一胜，即疲弱之卒糜饷于平时耳。岳

^① 三代：指夏、商、周三个朝代。

武穆不尽依古兵法^①，斯其天资卓绝，非可强几。后惟戚南塘氏束伍练兵^②，著为专书。曾文正公颇用其法，核定营制，而楚军、淮军相继并起，懋著功绩；然亦因与粤、捻诸寇相持稍久，故能练之益精也。欧洲各邦，以战立国一二千年矣。上下一心，竞智争雄，目见耳闻，濡染已久，又复互相师法，舍短集长。凡阵法之变化，号令之疾徐，船械之良楛，枪炮之利钝，无不罄其秘要，确有程度；非若中国之承平稍久，或并古所习之兵法而失其传也。以上二者，彼之所以获此成效，本非易易。中国虽不必尽改旧章，专行西法；但能明其意而变通之，酌其宜而整顿之，未始非事半功倍之术也！

五月二十四日记

中西医理不同，大抵互有得失。西医所长，在实事求是。凡人之脏腑、筋络、骨节，皆考验极微，互相授受。又有显微镜以窥人所难见之物。或竟饮人以闷药，用刀剜人之腹，视其脏腑之秽浊，为之洗刷；然后依旧安置，再用线缝其腹，敷以药水，弥月即平复如常。如人腿脚得不可治之症或倾跌损折，则为截去一脚，而以木脚补之，骤视与常人无异。若两眼有疾，则以筒取出眼珠，洗去其翳，但勿损其牵连之丝，徐徐装入，眼疾自愈。此其技通造化，虽

① 岳武穆即南宋岳飞。

② 戚南塘即明朝戚继光。

古之扁鹊、华陀，无以胜之。然亦间有不效者，如曾惠敏公之丧其一子，黎莼斋之损其一目，人颇咎其笃信西医之过。余谓西医之精者，其治外症固十得七八，但于治内症之法，则得于实处者多，得于虚处者少。其用药，但有温性，而无寒凉、敛散、升降、补泻之用。以视古医书之精者，如张仲景、孙思邈、王叔和之方，金元四大家之论，近代喻嘉言、陈修园之说，其深妙之处，似犹未之得也。惟中国名医，数世之后往往失其真传。外洋医家得一良法，报明国家，考验确实，给以凭照，即可传授广远，一朝致富，断无湮废之虞，所以其医学能渐推渐精，蒸蒸日上也。其他诸学之能造深际，率恃此道，又不仅医学也。

八月十二日记

余查中国从前与各国订立和约，但有彼在中国设领事之语，而无我在外洋设领事之文。盖因未悉洋情，受彼欺朦。郭前大臣初设新加坡领事时，与英国外部文牒往来，互相辩诘，殊费周折。曾惠敏公拟设香港领事，行文数次，英国外部以咨商藩部为辞，藩部以官民不便为说，管秃唇焦，终无成议。余与参赞等筹商，以新加坡旁近各岛华民固须保护，而香港一区尤为中外往来咽喉。凡华洋各商货物，均先至香港，然后运转各省。而交涉事务之要紧者，一曰逃犯，一曰走私，一曰海界。粤省每出巨案，派员至港，只以未设领事，声气隔绝，动多扞格。所以粤东全省政务，往往为香港一隅所牵掣。此处添设领事，万不可缓。其次则

新金山及缅甸之仰江，亦须相机推广，逐渐设员。惟是设立一处，商议一处，枝枝节节，徒费唇舌，尚难确有把握。英文参赞马格理，请先办文照会外部，援照公法及各国常例，声明中国可派领事分驻英国属境，暂不必指明何地。且日本、暹罗等国，皆已有领事在香港，而彼独坚拒中国，本不公允。今但与之泛论通例，彼必无辞以难我。一经答允，则无论何处领事，惟我所派矣。余以为然，因属马参赞代拟英文照会稿，照会英国丞相兼外部尚书侯爵沙力斯伯里。

十二月初十日记

西洋各国经理学堂、医院、监狱、街道，无不法良意美，绰有三代以前遗风。至其所奉耶稣之教，亦颇能以畏天克己、济人利物为心，不甚背乎圣人之道。所设上下议院，亦合古之刑赏与众共之之意。惟流弊所滋，间有一二权臣武将，觊窃魁柄，要结众心，潜设异谋，迫令其君退位，如近日巴西、智利之事。而数十年前，则此等事尤多，颇如孔子未作春秋以前列邦情势。此其君臣一伦，稍违圣人之道者也。子女年满二十一岁，即谓有自主之权，婚嫁不请命于父母。子既娶妇，与父母别居异财，甚者不相闻问。虽较之中国父子贼恩、妇姑勃溪者，转觉稍愈，然以骨肉至亲，不啻推远之若涂人。国家定律，庶民不得相殴。子殴父者，坐狱三月；父殴子者，亦坐狱三月。盖本乎墨

氏爱无差等之义^①，所以舛戾若此。此其父子一伦，稍违圣人之道者也。西俗贵女贱男。男子在道，遇见妇女则让之先行。宴会诸礼，皆女先于男。妇人有所遇，虽公侯之夫人，往往弃其故夫，而再醮不以为异。夫有所遇，其妻可鸣官究治，正与古者扶阳抑阴之义相反。女子未嫁，每多男友，甚或生子不以为嫌。所以女子颇多终身不嫁者，恶其受夫之拘束也。此其夫妇一伦，稍违圣人之道者也。夫各国当勃兴之际，一切政教均有可观；独三纲之训，究逊于中国。即洋人亦或推中国为教化最先之邦，似未尝不省悟及此；然一时未能遽改者，盖因习俗相沿之故。余谓耶稣当西土鸿荒初辟之时，启其教化，魄力甚雄，然究竟生于绝域，其道不免偏驳。失之毫厘，差以千里，不信然欤。

十二月二十九日记

地球万国内治之法，不外三端：有君主之国，有民主之国，有君民共主之国。凡称皇帝者，皆有君主之全权于其国者也。中国而外，有俄、德、奥、土、日本五国；巴西前亦称皇帝，而今改为民主矣。美洲各国及欧洲之瑞士与法国，皆民主之国也。其政权全在议院，而伯理玺天德（译作总统）无权焉。欧洲之英、荷、义、比、西、葡、丹、瑞典诸国，君民共主之国也。其政权亦在议院，大约民权十之七八，君权十之二三。君主之胜于伯理玺天德者无几，

^① 即墨子的“兼爱”思想。

不过世袭君位而已。英主在英伦三岛称君主，而又称五印度后帝，则其君权在印度较重。其本国所以仍称君主者，以数百年来为其民所限制，骤难更张也。法国前称皇帝，而今改为民主，始稍安谧。夫法国人心好动恶静，固多事之国也；既为民主，其权乃散而不壹，佳兵黩武之风，其稍戢乎！

光绪十七年（辛卯）

正月初三日记

西洋各国教民之法，莫盛于今日。凡男女八岁以上不入学堂者，罪其父母。男固无人不学，女亦无人不学，即残疾、聋瞽、暗哑之人，亦无不有学。其贫穷无力及幼孤无父母者，皆有义塾以收教之。在乡则有乡塾，至于一郡一省，以及国都之内，学堂林立，有大有中有小，自初学以至成材，及能研究精微者，无不有一定程限。文则有仕学院，武则有武学院，农则有农政院，工则有工艺院，商则有通商院。非仅为士者有学，即为兵、为工、为农、为商，亦莫不有学。其书多，曲折赅备，有读之十年不能罄其奥者。平时所见所闻，莫非专门名家之言，是以习之而无不成，为之而无不精。近数十年来，学校之盛，以德国为尤著，而诸大国亦无不竞爽。德国之兵多出于学校，所以战无不胜。推之于士农工贾，何独不然？推之于英法俄

美等国，何独不然？夫观大局之兴废盛衰，必究其所以致此之本原。学校之盛有如今日，此西洋诸国所以勃兴之本原欤？

正月十六日记

地球各国人民之数，中国第一，英国第二，俄国第三。中国人数在四万万以外，大约四倍于英，五倍于俄。余因考二千年来，以汉平帝、元世祖、明神宗为户口最盛之时。汉平帝元始二年，民户一千二百二十三万有奇，口五千九百五十九万有奇。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民户一千三百十九万有奇，口五千八百八十三万有奇，而山泽溪洞之民不与焉。明神宗万历六年，民户一千六十二万有奇，口六千六十九万有奇。恭查本朝康熙四十九年，民数二千三百三十一万有奇。乾隆五十七年，民数三万七千四百六十六万有奇，较之康熙年间已增十三倍之多。高宗纯皇帝谕旨，谓以一人耕种而供十数人之食，必致日形拮据。有牧民之责者，务当剴切化导，俾皆俭朴成风，服勤稼穡而尽地利，共享升平之福。道光二十八年，会计天下民数，除台湾未报外，通共四万二千六百七十三万余名口，则较之乾隆年间，又增一万一千九百余万人矣。

自粤、捻、苗、回各寇迭起弄兵，潢池已皆荡定，今又休养二十余年，户口渐复旧观。余尝闻父老谈及乾隆中叶之盛，其时物产之丰，谋生之易，较之今日如在天上；再追溯康熙初年，物产之丰，谋生之易，则由乾隆年间视之，

又如在天上焉。无他，以昔一人之衣食，而今供二十人焉；以昔居一人之庐舍，而今居二十人焉。即考之汉、元、明户口极盛之时，又不啻析一人所用，以供七八人之用。盖我国家列圣相承，德威所暨，罔间内外，煦濡涵育，泽及群萌，民生不见兵革，户口蕃衍，实中国数千年来所未有。然生计之艰，物力之竭，日甚一日，盖利病相倚，丰耗相因，循环之理也。今欲筹朴直之策，谓中国地有遗利欤？则凡山之坡，水之浒，暨海中沙田，江中洲沚，均已垦辟无余。抑谓人有遗力欤？则因中国人数众多，所以人工之廉，减于外洋十倍，竭一人终岁勤动之力，往往不能仰事俯畜^①。彼知力难自贍，则竟好逸恶劳，或流为游手、为佣丐、为会匪者，所在多有。盖仓廩不实不知礼节，衣食不足不知荣辱，亦理势之所必然。窃尝横览地球，盱衡全局，而得补偏救弊之术焉。

方今美洲初辟，地广人稀，招徕远氓，不遗余力，即如墨西哥、巴西两国，疆域之广，合计其建方里数，较中国尚有赢无绌，而其民数尚不能当中国二十分之一。其地多神皋沃壤，气候和平，不异中国。而土旷未垦，勤于招致，且无苛待远人之例，立法颇为公允。诚乘此时与彼诸国妥订条约，许其招纳华民，或佣工，或艺植，或开矿，或经商。设立领事官以保护而约束之，并须与订专条：彼既招我华民，藉以开荒，功成之后，当始终优待，毋许如美

① 仰事俯畜即养家糊口。

国设法驱逐。夫有官保护，则遇事理论，驳其苛例，不至为远人所欺；有官约束，则随时教督，阻其不法，不至为远人所憎。华民在此，皆可买田宅，长子孙，或有数世不忘故土，辇运余财输之中国者。如此，则合于古之王者有分土无分民之意，且不啻于中国之外，又辟一中国之地，以居吾民，以养吾民也。于以张国势，厚民生，纾内忧，阜财用，广声气，一举而五善备焉。救时之要，莫切于此。若夫欧洲人满之患，不亚于中国；阿非利加一洲，鸿荒未尽辟，瘴气未尽除，华民之愿往者尚寡；美国有驱逐华民之举，秘鲁一国及荷兰、西班牙所属诸岛，或迫之入籍，或拘之为奴；而澳大利亚一洲，亦有薄待华民之意；自当就其旧有之华民而保护之，不必导之前往也。

正月二十一日记

英使华尔身，前到总理衙门求定华民入英籍章程。谓须分三等：一、生长中华，寄居英境，呈请入英籍者；二、生长英国，呈请入英籍者；三、其祖父即住英境年久，其子孙呈请入英籍者。此三等人如来中国，必先在英请领执照，到口岸呈英领事请验，知照关道，便同英民一样看待。但其住华，却分三样：第一等，须立在华限期，逾限则仍为华民，归华管束；第二等，年限可稍宽，逾限不回英，亦仍归华管束；第三等，居英已一二代，则不能立限期，缘此等与英民一样也。告以昔年与英前使阿礼国，曾定华民入英籍章程，迄今英未照行。至华人入英籍，其父兄仍系

华籍，应如何办法；或华人有罪逃入英籍；或华人已入英籍，其原有之中国田产，不得争论；此数层皆须想到。此事为条约所无，仍须抱定前议章程，斟酌办理。

二月三十日记

俄罗斯一国，商务之旺不如英，水师之盛亦不如英，地产之富不如法，工艺之良亦不如法，陆师之练不如德，学问之精亦不如德。然则，俄当为英、法、德诸国所弱矣，而诸国非但不敢蔑视之，且严惮之者，何也？俄之地形广博无垠，以一面制三面，有长驾远馭之威，有居高临下之势，且旷土既多，以其地之产，养其地之人而有余，是得地利。秋冬结冰，入夏始解，虽有强兵猛将，不足以病俄，拿破仑第一莫斯科之役，乃其前鉴，是得天时。俄之君权特重，非若各国上下议院之牵制，且其开国较迟，所用将相大臣，颇有纯朴风气，是得人和。惟俄之立国有与西洋诸国不同者，所以一切要务，虽多不如诸国，而诸国终无如彼何，且视俄为头等强国，各有瞠乎其后者。况俄与西洋诸国政俗略同，讲求要务数十年后，商务未必不日旺，武备未必不日精，工艺未必不日良，学问未必不日新。以俄之诸务不如西国，尚得最强之胜势；若其一旦诸务与西国相颉颃，则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矣。此英、德诸国所以长虑却顾，而隐忧莫释者也。

夫俄不有事于天下则已，俄若有事于天下，东则中国当其冲，西则土耳其当其冲，中则印度当其冲。而细察俄

之隱謀，則注意印度為尤甚。然果使印度折而入于俄，則中國與土耳其亦豈能一日高枕而卧？英之執政知俄之覬覦印度也，早已密為之防。余竊聞俄皇之論，亦頗躊躇審顧，不欲輕動。其用意在綏撫其民人，輯和其部族，垦辟其荒地，聯絡其邦交，沈几觀變，引而不發，固有虎豹在山之威，然後以其全力，生聚教訓，積至數十百年之後，地廣人眾，勢力且十倍英、德諸國，相機而動，縱橫四出，誰能阻之？昔者戰國之初，六國合力揆秦，而秦乃閉關息民、養精蓄銳者數世；迨開關出師，六國皆從風而靡，莫之能敵。俄之機勢，大與秦類；蓋積之愈厚則基愈固，蓄之愈久則勢愈雄。今日者，俄如多事，固天下之患也；俄竟息事，尤俄國之利也。然則中西各國將若之何？曰：盡其自治自強之道而已矣。若俄之所以自謀，則非他國所能與聞也。

跋

昔征夫原隰，《詩》咏夫《皇華》；使者輶軒，語傳夫絕代。蓋咨以四方之故，定以八月之行，諏謀則遠而有光，謠俗則采而還奏。述征紀事，由來尚矣。

余歷聘四國，已逾一年，凡舟車之程途，中外之交涉，大而富強立國之要，細而器械利用之原，莫不筆之于書，以為日記。總其大略，可得而言焉。

夫習之《來南》，永叔《于役》，爰有述造，此其權輿。然只涉歷于寰中，尚非馳觀于域外。若乃香港孤峙，今為

百粵之门；西贡始通，古属九真之郡。寻海崎于顿逊，则有新嘉之坡；望山屿于翠蓝，则有锡兰之岛。于是，日当天而正赤，水沸海而微红，轟轟童山，浪浪暑雨，遂过亚丁之岸，复经埃及之河。大食荒沙，鸵鸟能走；拂菻濒水，鲐鱼善飞。其间，苦热于印度之洋，遇风于地中之海，鸢跼跼而下堕，颺隆隆以上盘。盖行三万五千程，历三十有四日，始至法国，继驻英京。巴黎繁华，则瑰货山积；伦敦富庶，则巨资川流。意大利之通使最先，申其旧谊；比利时之置君差后，洽此新邦。举凡飘轮电轨之驰驱，俱入夕课晨书之纪载。此行程之可记者也。

恭膺简命，远赉国书，所以慎固邦交，恪恭使职，礼也。于是敬蠲吉日，入谒王庭，牋副旁行，语翻重译。君主君后，备饬其议文；颂词答词，务崇其体制。鞠躬则礼简而肃，握手则情挚而殷。虽非汉谕尉佗，陆贾奉书而往；差比唐亲回鹘，殷侑承命以行。若夫时际公余，事同私觐。听乐观舞，折简以招邀；酒宴茶会，肆筵而款待。是盖风殊中外，礼尚往来，从俗从宜，在所不废。而况酬应既浹，情好斯联。天子万年，国主则签名致贺；中朝元旦，外臣则投刺倾诚。宛乎缟带之欢，允矣敦槃之盛。此交际之可记者也。

窃尝远稽大地四隤之说，近览环球万国之形，沿革必详，广轮胥准。大抵政治风俗，易地而不同；文字语言，转音而即异。溯海中之交市，遮遏于昔时；料国内之胜兵，递传夫今制。故其治国以经商为本，其教民以讲武为基。竟

利争雄，更衰迭盛。拟以春秋接伐，而亦重同盟；方之战国纵横，而未闻游说。然而强弱相制，大小相维。或约章之所不及遵，或公法之所不能限，善度地则捷足先得，务胜人则不戢自焚。坐大者俨若建瓴，始强者渐思方驾。至于君主、民主、官绅共治之主，爵员、武员、上下议院之中，尊卑泯其等差，选举凭以声望。其分曹治事，任久而责专；其出政施刑，令严而法简。公会所以成务，学堂所以储材。他若种树专司，周衢设表，礼志宿息井树，传称治道成梁。以古方今，殆不之过。总而论之，其道如墨子，故必尚同；其政如商君，故必变法。虽兴废固非一致，而缔造各逾千年。此政俗之可记者也。

且夫和仲之宅昧谷，用察玕衡；伯阳之至流沙，当携图籍。凡兹西学，实本东来。故制作因于《考工》，测算昉于《周髀》。唐一行铜轮之转，效之为车船；元駉马火器之遗，演之为枪炮。由是智创巧述，日异月新。火船则铁肋钢甲，远胜于木轮；铁路则穿洞造桥，较难于平地。炮则圆径殊制，枪则速率异宜。而且障以露堡暗台，补之蚊船雷艇。悉属用兵之要，允为制胜之径。至于电气聿兴，风行殆遍，质分干湿，气薄阴阳，以传邮则万里瞬通，以制用则百万咸备。织布之器，颇便于民生；攻矿之机，有裨于地宝。推之同体异体，化学阐其精；均发均悬，重学衍其绪。溯光学之祖，判二光与一光；考汽学之流，别蜕地与蜕水。此艺器之可记者也。

盖自简书远役，闻见稍多，辄有日钞，藉资胥录。然

且间登成案，附缀鄙辞。事有旧而可循，语有奇而非创。陈年公牍，欧公尝取以覆观；海外文章，苏子亦摭其论议。虽云愿学，滋愧未能。

嗟乎！时事方殷，外交宜慎。收利权于西国，念流寓于南洋。并著斯篇，当筹厥策。庶几裨谏为命，先资乎获野之谋；駘衍大言，无取乎谈天之论云尔！光绪十七年长至日，无锡薛福成自跋于巴黎使馆。

《出使日记续刻》节选^①

光绪十七年（辛卯）

三月初二日记

亚洲诸国，酷慕西法者莫如日本，甚至改正朔，易服色，即西人亦姗笑之。然二十年来于富强之道，竭力整顿，颇能大著成效。即如商务一端，已远胜于中国矣。大抵通商之要，不外四端：曰培物产，工制作，精仿造，广流通。四者既备，乃可与各国争衡。中国不知此理，一切听其自然。丝茶两宗，本恃为出洋巨款，今则日见其衰。售之西人，西人谓其货愈劣，若有戒心。日本、印度、意大利、法兰西，乃起而攘其利。且自洋货入中国，而华货之销于中国者，亦日见沮滞，近且停工不作。洋布盛则土布微矣；洋

^① 《出使日记续刻》收入《庸庵全集十种》，共十卷。

纱羸则土纱绌矣。细至洋针、洋线、洋钮、洋刀，无不尚西人所制，迺复制造食物，仿织绸缎，精益求精，务夺我利，此中国未获通商之益，反受通商之害也。

日本则不然。国中土产，培植壅护，灌溉剪裁，必求佳种，必令丰收，一切所出，今胜于昔，是物产培矣。铜器、漆器，本属擅长，近如鱼鲙、鹿脯、紫苔、果实，无不慎加选择，味美物良，况如纸料之佳，磁器之美，无不贩致远近，是制造工矣。仿造西货，率多形似，如所制寒暑针、风雨表、钟表，机括具备，价又极廉，西商射利者，转贩东洋之物，指为西洋所造，是仿造精矣。日本地小物稀，曩时通商中土，其货有限，今则制造日多，且精皮酒一项，西人亦喜日本所酿者，自远来沽，是流通广矣。此四者，振兴商务之本也。中国有一于是乎？然则讲求西法以夺西商之利者，环顾亚洲，舍日本其谁属哉！

四月初六日记

近百年来，西洋诸国，多得养民新法。其最盛者：美国产业于八十年之内，多至四十三倍；英国于八十五年之内，产业多至六倍；法国于六十年之内，产业多至三倍。盖美多旷土，皆系膏腴，可以开垦，故收效最速。英国得新式机器，制造各货，并通商五大洲，故能坐致富强。美有七家，共得银四百兆两。英有五家，共得银一百兆两。德有二家，共得银二千五百兆两。法有一家，得银一千兆两。诸商之致此巨富，实众工人胼胝辛勤所致也。因此各工人

设会，曰同心会，又曰同合会。计德、美各有六十余万人，英有八十余万人，法国人数更多。动辄停工，实非与上为难，不过求工资饶裕，且一日中限定作工四个时辰，以资养息也。

六月初三日记

《传》云：“或多难以固其国。”吾于今之日本见之。日本自魁柄下移^①，而平氏、源氏、北条氏、足利氏、织田氏、丰臣氏、德川氏，迭起称霸，国主虚拥神器^②，逾七百年。咸丰、同治之间，德川氏之势日衰，而诸侯并起力争，英、法、俄、美兵船环伺互逼，于是内讧外忧，纠结莫解。有二三豪杰者流，起而倡议，谓不合于一，不足以御外；不和于敌，不足以靖内。因尽废诸侯而退德川氏，以全国之权归之国主，陆续与诸国通商，步趋西法，名曰维新之政。三十年来，外交之道，日益讲求，披却导窾，措注得宜；工艺益兴，商务益旺，有蒸蒸日上之势。盖日本之地，小于中国不啻十倍；而风气之开，先于中国则不止十年。斯所以能转贫弱而渐基富强也，藉非多难以磨砺之，激励之，安能若是？是故国不在大小，而在人才之奋兴；才不限方隅，而惟识时务者斯谓之俊杰。吾于今之日本见之。

① 魁柄：比喻朝廷大权。

② 神器：指帝位、政权

九月初九日记

丝茶两宗，为中国利源。近以日本、印度、意大利各种茶桑，夺我厚利，而中国之丝茶日形减色。查光绪十四年，闽、汉茶叶运载出口者，共五十三万七千九百零四担。次年，有二十七万八千五百六十六担。又次年，有三十四万六千三十四担。本年，有三十六万四千二百五十五担。上海、广州丝绸出口者，光绪十四年共有五万五千九百七十九担，次年有五万三千六百七十四担，又次年有五万七千三百三十六担，本年有七万三千七百十六担。综而计之，茶务虽日形减色，然于减少之中，仍有增加之处。若丝绸则固未尝不畅旺也。

十月二十七日记

丝、茶，为中国出产之大宗。近则外洋各国，效中国之长，夺中国之利。茶则印度、锡兰、日本种植日多，烘焙亦日讲究，色香味俱佳。洋茶销路日见畅旺，华茶销路日见耗竭。丝则法、意、日本等国养蚕得法，出丝日旺，剔选极精，缫制极良。同治初年，华丝每岁出口者六七万包，今不过二三万包，已减去三分之二。夫茶市所以日坏者，由于采摘失时，烘焙未善，而又加以搀杂，遂让洋茶以日盛。丝市所以日疲者，由于饲蚕未合其宜，拣种未察其病，缫丝未得其法，与洋丝比较未免相形见绌。今欲筹补救之法，惟有劝华商精益求精，勿以伪物欺人，并减轻税额而已。

光绪十八年（壬辰）

正月十六日记

有论中国物产甚富，宜设制造学堂，以教学生而谋富强，收回洋商所夺之利者。此固探源之论，不如此不足敌其腹削也。英国商务最精最广，所属如印度、澳大利亚、加拿大，皆土沃产丰而少工作。英乃兴其艺术，自机器行而成物愈多愈精，如洋布、呢羽、钟表、五金、器皿，及玻璃、油皂、针钮一切日用之物，贩运出口。所制洋布，其棉花皆购自美国。所织之布，皆能仿效华制，而花样牌号，时时翻新。洋伞，以绸制钢骨牙柄者为上，每柄须洋银五六圆，或十余圆，中国到处通行，或用为送礼之物。洋灯，以瓷罩保险灯为上，价视寻常洋灯数倍。

今中国务本之道，约有数端：一、广种植以兴农利。肥田之料，须本西人格致之学，不特振兴桑茶已也。二、精制造以兴工利。如有能制新奇便用之物，给予凭单，优予赏赐，准独享利息若干年，不许他人仿制，而又酌其资本，代定价值。三、广开采以裕民用。硝可肥田，金可范器，硫可制药，煤可养火，均相地开采，加以熔炼；更设铁路，散运各处，岂非收回利权之要道邪？

正月十七日记

凡人之心，虚灵不昧，非若肝、脾、肺、肾之仅各司一职。故能用心者可至于圣，不能用心者可至于狂。诚以人之灵明，多在一心。其所以能思虑、能记忆者，皆心也。此中国数千年来相传之训也。近古以来，亦有验得悟性在心，记性在脑者。乾隆年间，齐次风侍郎博学多识，《十三经》^①、《二十四史》几于背诵如流，后因翻车倾跌，脑浆迸流；高宗使名医治之，补以牛脑，虽完复如旧，从此健忘，过于常人，经史及一切典故，无复记忆，于是记性在脑之说乃益审矣。泰西医书及格致诸书，咸谓人之记性悟性皆在脑。余每晤西士，诘以人之记性悟性在脑，有何证据？西士曰：“人死之后，每称其脑。凡其人生平愈睿智者则脑愈重焉，愈愚蠢者则脑愈轻焉，试之百而无一或爽。又征之于物，牛虽大于猴，然猴灵而牛蠢者，以牛脑实轻于猴也。兔虽大于鼠，然鼠黠而兔蠢者，以鼠脑稍重于兔也。亦试之百而无一或爽。至心之为用，不过能由大小血管送血以通于脑，以充于周身，而身之百骸活焉，而脑之精气足焉。精气既足，而脑之思虑自益锐，记忆自益牢。或有用思过度，以致血管迸裂者，则心血不能送入于脑。大抵血管尽裂，则其人立死；或裂其半，往往有中风不语，偏痹不仁

^① 即十三部儒家经典，即《诗》、《书》、《易》、《礼》、《春秋》《周礼》、《礼记》、《仪礼》、《公羊传》、《穀梁传》、《左传》、《孝经》、《论语》。

诸症，稍久亦终致不治。其有调养得宜，使血管绝而复续者，不过十之一二耳。西士之说，大旨如此。果若所言，是心不过顽然一物，虽与脑有相为维系之用，而其不获自擅思虑记忆之能可知，似与中国千古圣贤之说相背。然人虽终日思虑记忆，其妙用究竟在脑与否，在心与否，人亦不能自知也。余既不能实指脑之能思虑记忆以证西说之确，亦不能实指心之能思虑记忆以辩西说之诬，只有暂置不论而已。西士又言：“人之神明在脑，人死则脑腐，脑腐则冥漠而无知，澌灭而无存矣。”是中国之所谓鬼神，外洋之所谓灵魂，实皆无有也。余诘以鬼神灵魂，既皆无有，何以耶稣有天堂地狱之说？西士默然不能对。

正月二十一日记

西人谓一星即一地球。殆经千百年才智之士测量推算，而始有此论，与我中国旧说迥殊。余无以断其说之或确或否。兹姑述西士所言，而参以余之臆见，更为推而演之，扩而大之。

夫星之布于太空者，无穷也。而日之阳力，足以引之。日之悬于太空者，亦无穷也。而太空之无外，无不容之。吾人目力之所能见，只此一日，而不知目力之所不及者，尚不可以数计也。一日之力，能统摄群星。星之质有大于吾地球十倍、百倍、千倍者，亦有小于吾地球十分、百分、千分者。惟日之大小亦然。日愈大，则所摄之星愈多，此固必然之理。日之为体，似系纯火，亘古不熄，人不能测其

所以然。而太空中之彗星、行星，常有被吸入日者，彗星亦纯火也，行星即地球也。议者以为日之得此，犹火之添薪焉。

昔释迦牟尼与诸弟子说法，因云：“我与汝一说法之顷，不知多少世界成，多少世界毁。”夫佛氏所谓一世界，即一地球也。地球之成，余前已言之。地球之毁，厥有数端。其最甚者，莫如被日吸入或为彗星之芒所触，则立成灰烬，无复留遗。又或行失躔次，两球相碰，其摩戛之力，足令全地生火，则人物销灭，而球亦陨坠于无何有之乡。然虽历千万年之流移陨坠，而太空之中，莫不有日有星，虽不为此日所吸引，而他日之力又足引之。浸假而生水土，浸假而生人物，而地球又成。又或因地中之火迸裂以至飞陨，再阅千万年而地球又成。又或因地中之火渐寒，不生人物，虽流转于太空之中，必阅千万年后，别遇生火之道，始能复生人物。又或行失轨道，为日所不照，而人物自息，必待千万年后，再受日照，而人物复生。是故有以一地球而屡毁屡成者，有以一地球裂为数地球者，有以小地球合于大地球者，有地球屡到将毁未毁之时，积久乃复成者。夫天汉大矣，实系众星丛积而成。因其离吾地过远，故其光在明昧之间，可见吾人目力所能见者，地球殆如恒河沙数。余尝盛夏露坐纳凉，虽不过数刻，而天上常见流星，亦有空中有声，光熊熊如巨灯，良久乃没者，斯殆地球相碰，或迸裂所流之火。佛氏说法之言，于兹益信。然并非毁球之易，乃益见地球之多。且吾所见空中之光，未必全球俱毁。

亦有地球一处炸裂，飞腾太虚，而全球实未坏者，其火或飞到吾地，则凝而为石，人乃谓之陨星。然其流转空中，如弹丸，如车轮，终古不消者，斯亦一最小之地球。但气力太薄，则人物不生，偶行近吾地，则翕附于吾地，人见以为陨坠，实则吾地之力所吸耳。

或曰地球可毁之道，如此其多，然则吾辈所履之地，岂不危哉？余应之曰：吾地之在太空，殆不仅如沧海之一粟，则所谓或碰或裂，或日吸或彗触者，并无数万万分之一。盖行星被吸入日，西士亦不过设为此说，尚非实有所见。且空中诸地球，吾不遑论，但言吾地，吾地所行之躔度，推步者能知大略，断无日吸彗触之虞。大抵地球所虑，以地中火熄或日光不照为较多。然就吾地而论，亦总在数万年、数十万年之后矣。况此系大数，虽造物者亦无如何也。又奚待乎子之抱杞人之忧？

正月二十六日记

余昨扩天有九重之旧说，以为天实不止万万重，其说似奇而创，然《中庸》已先我言之矣。《中庸》言地曰及其广厚，言山曰及其广大，言水曰及其不测，独言天则曰斯昭昭之多，及其无穷也，日月星辰系焉，万物覆焉。夫曰无穷，则虽扩之万万重而莫能穷其究竟也。余之前说，不过无穷两字之注脚也。余又曾论日月星辰相绕相吸之理，则一系字之注脚也。至余所论诸星位置于虚空之中，升降上下，无所阻碍，所以能终古不碰不陨，则又为道并行而不

相悖一句之注脚焉。夫然后知圣人虽有所不论，而一字一句，义蕴宏深，实已无所不该。余又读声名洋溢中国一节，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坠，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故曰配天。始确然知后之圣人，必有统一五大洲之一日，而孔子之道，亦必遍行于五大洲，为所尊亲无疑也。抑余又在外洋，阅历二年，深有味于《论语》子张问行一章，忠信笃敬，蛮貊可行，实为颠扑不破之道。呜呼！圣人之言，何其神也。

正月二十七日记

或戏问于余曰：“洋人创造火轮舟车及电线，巧夺天工，遂能将五大洲联而为一。自明以前，华人岂知欧美诸洲，尚有绝大世界乎？今人于地球已能遍历矣，然智巧日生，器用日精，即如轻气球之属，尚可开拓，其用渐臻美备，意者数千年后，必有穷极造化之妙，为人思虑所不到者乎？如谓行星即一地球，究竟与吾地相离过远，人力所不能达，惟月轮距地最近，意者吾地之人，必有到月轮中通商之一日乎？”余曰，西人所恃以夺天工者，多借水火风电之力，若太空之中，则水火风电俱无矣。惟日星之光，或尚可借而用之。然吾恐光之为力，不如水火风电之力之大也。且西人尝乘轻气球矣，四十里以上，则鼻中出血，渐致晕绝。盖人不能一刻离气以生，却地稍远，则地上所浮清气，渐轻渐淡以至于无也。月轮离地虽近，尚有六十九万四千余里之遥，人安能飞度此六十九万里无气之界乎？是故谓地球

之上将来尚可寻得巨岛，实在人意料之中；谓月轮中可以通商，则吾不敢知。

福州茶务向来最旺，十年前茶叶贩运英国者，值英金七十一兆镑，去年仅值十九兆镑。

正月二十九日记

余观西洋人议论及其律例，大抵最重奸盗拐骗之罪。凡犯此者，虽平日密友，皆绝不与往来，恐被浼也^①。而惩治之法，虽不抵死，亦必与以终身监禁苦工之罚，盖犹中国所谓私罪也。至于隐图弑逆篡夺，或谋为君主，或要结众心，谋为大伯理玺天德^②，虽未成发觉，亦只驱之禁之而已，不甚予以重辟。而舆论非惟不贬绝之，转有钦佩其为英雄者，盖犹中国所谓公罪也。夫大逆不道，不能不重其辟者，所以定一尊而禁邪谋也。故胜则为王，败则为寇，古今通义。今西人则于其败者，并不指为寇焉，人孰不思侥幸以希神器哉。即如法前兵部尚书布朗热谋为法国君主，事败出奔，而法人之讴思者至今未衰，并不斥其覬觐之罪。欧美诸国若此类者不胜枚举，此不知春秋大义之故也。

台北暖暖地方新得金矿，矿沙四五十里，无不出金。淘沙者日三千余人，晨往夜返，有人购金沙数十两，黑沙数两，化分考验，大约纯金得十之八，一分半为纯银，硫质

① 浼：污染。

② 即大总统。

炭质五六厘耳。黑沙则纯金可得十之三四，惟化炼稍难。

二月十八日记

泰西诸大国自俄罗斯而外，无不有议院，实沿罗马之遗制也。其所由来，数千年矣。议院者，所以通君民之情也。凡议政事，以协民心为本。大约下议院之权，与上议院相维制；上下议院之权，与君权、相权相维制。英国有公、保两党^①。公党退，则保党之魁，起为宰相。保党退，则公党之魁，起为宰相。两党互为进退，而国政张弛之道以成。然其人性情稍静，其议论亦较持平，所以两党攻讦倾轧之风，尚不甚炽，而任事者亦稍能久于其位。法国有左右中三党，而三党之中，所分小党甚多，又有君党、民党之别。其人皆负气好争，往往嚣然不靖。凡宰相所行之政，议院中是之者少，非之者多，则宰相必自告退。宰相退，而其所举之各部大臣莫不告退，由伯理玺天德另举一人为宰相。其被举者，必先自审其党友之中，可为各部尚书者若干人。若尚阙而不备，则必力辞不敢居位，而伯理玺天德又别举焉。法自庚午年改易民政，二十二年之中，已易相二十七次。其人虽多喜事，而强横之势，稍逊于前者亦实由此。夫宰相不能行其意则告退，颇有不得其职则去之意。一相退则众大臣牵连而退，一相进则众大臣汇茹而进，亦稍有中国古风。然一国中之有才德声望，众所愿推

^① 即工党和保守党。

为宰相者不过数人，可屈指而计。既进不难骤退，既退亦常复进，即如法之现任兵部大臣佛来西尼，已三为宰相，五掌兵部矣。

二月二十日记

泰西风俗无男女之别，余意其自古以来相沿久矣，而正不然。闻三四百年以前，法国某王始改妇女之礼，其用意专以谋致富强为主，而欧洲诸国从而效之者也。古者欧洲妇女守礼之严，大旨亦与中国相似，男女不同席而坐，不共几而食，恪循闺训，不出户庭。法王思致富强之术，莫先于人民之繁庶；繁庶不可骤几也，则莫如化妇女之无用为有用；欲求妇女之可用，则莫如略其礼法，去其防闲。于是毅然以改俗变礼为务。其初不得不用非常之劝惩，驱迫于无形之中。厥后风气浸成，而妇女之为用，果不异于男子。用之战守，则男子荷戈，妇女馈饷矣。用之学问，则男子精锐，妇女沈静矣。于是通国之中，向之有十万人者，不啻骤得二十万人；向之有百万人者，不啻骤得二百万人。此由于地不甚广，民不甚众，而欲创霸国之雄图，不得已而出此也。迨其计既行，其效既著，欧美诸洲各国无不效之。今各国之人，视为当然，渐忘其所以然。且有见中国之礼而笑之者矣。俄罗斯在西洋之中，风气较晚，其改妇女之礼，始于彼得罗皇帝，亦已二百年矣。西俗宴会则男女杂坐，行步则男女携手。俄之妇女初有不愿者，至杀数人而其风始渐开。然至今俄国皇宫茶会，男女犹分列左右

两行，非若他国之男女杂处，则较之诸国，犹稍存古意焉。

三月二十八日记

地球五大洲各国，或君主，或民主，大要不外此两端。民主之国，其用人行政，可以集思广益，曲顺舆情；为君者不能以一人肆于民上，而纵其无等之欲；即其将相诸大臣，亦皆今日为官，明日即可为民，不敢有恃势陵人之意。此合于孟子民为贵之说，政之所以公而溥也。然其弊，在朋党角立，互相争胜，甚且各挟私见而不问国事之损益；其君若相或存五日京兆之心，不肯担荷重责，则权不壹而志不齐矣。君主之国，主权甚重，操纵伸缩，择利而行，其柄在上，莫有能旁挠者。苟得贤圣之主，其功德岂有涯哉。然其弊，在上重下轻，或役民如牛马，俾无安乐自得之趣，如俄国之政俗是也。而况舆情不通，公论不伸，一人之精神，不能贯注于通国，则诸务有堕怀于冥冥之中者矣。是故民主、君主，皆有利亦皆有弊。然则果孰为便，曰得人则无不便，不得人则无或便。

四月己丑朔记

中国唐虞以前，皆民主也。观于舜之所居，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故曰都君。是则匹夫有德者，民皆可戴之为君，则为诸侯矣。诸侯之尤有德者，则诸侯咸尊之为天子，此皆今之民主规模也。迨秦始皇以力征经营而得天下，由是君权益重。秦汉以后，则全乎为君矣。若夫

夏、商、周之世，虽君位皆世及，而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之说，犹行于其间，其犹今之英、意诸国君民共主之政乎？夫君民共主，无君主、民主偏重之弊，最为斟酌得中。所以三代之隆，几及三千年之久，为旷古所未有也。

四月二十八日记

西人既有聪明在脑之说，余复考究其书，大抵谓心主周身之血，喜怒哀乐爱恶之情生焉。脑有气筋二条下垂，一主知觉，一主运动。如将知觉之筋割断，则肌肤之痛痒，不能自知；如将运动之筋割断，则手足不能行动。人之所以瘫痪不仁者，盖运动之气筋断也；其或中风不语，思虑不灵者，盖知觉之气筋断也。至心之血管，亦有两条，一则送血使出以运行于周身；一则收血使入以还聚于一心。惟血之初出者本清，而血之还入者变浊。借气息之一呼一吸，可以吐浊而纳清，则血之浊者复变为清焉。夫人之所恃以生者，血气而已。脑主气而非血不足以充之，心主血而非气不足以养之。心与脑者，皆人身之主宰也。

五月十三日记

西洋各国议院员绅，由民推选，大抵皆取器识明练，才辩锋生者，而尤以家道殷实为第一要义，群谓之体面人。盖西洋风气，与中国不同，虽或以工商致富，或席其先世之遗业，而仍多读书谈艺，研求时务之人；亦有家业既丰，无

所事事，乃求选为议员以摭其蕴蓄者；甚或散财要结民心，默干时誉以求中选。议员俸金初不甚丰，而膺此任者之意，本不在此。盖视此为扬名成业之具，而非为养身肥家计也。议员中资深望重者，可举为宰相及各部尚书，或为伯理玺天德。或有稍玷其声誉者，则终身无再选之望。故近来欧洲之官，以贪墨著者尚少。余谓中西用人之法，截然不同。中国以寒士为重，故一参以富商而其弊立见。外洋以厚资为重，故明注在富人而其弊亦寡。数千百年来之风气使然也，而顾有互相菲薄者何哉。

五月十五日日记

天地间物，不外凝流二质。有若金、银、铜、铁、铅、锡之属，其体本可凝可流；有若瓦、甗^①、瓶、罍^②、樽盎之属，其体非凝，其用在凝；有若朱丹、胶漆、采色之属，其体非流，其用在流。此中西一也。

西人精研物理，专立化学一门，变化物质，大要有四：一、曰性变。铁可流而为酒，煤可流而为油，米浆可凝而为器，油炭可凝而为胰。刚柔燥湿之性，可互变也。一、曰色变。硫磺与水银合，流为朱色。铜与硝强水合，流为蓝色。海蓝与黑铅合，流为黄色。木炭与硫磺合，流为清水色。青黄赤白之色，可叠变也。一、曰味变。硫硝二气，凝

① 甗（音wū舞）：瓦制酒器名称。

② 罍（音léi雷）：古时一种盛酒的器具，形状像壶。

时无味，流为硝强水则味酸。木炭二质，凝时无味，流为红白糖则味甜。海水流时味薄，凝成盐则味厚。牛乳流时味膻，凝成精粉则味和。甜酸苦辣之味，亦递变也。一、曰形变。五金之质本纯，一经气化则目不能睹其形。盐气之质本浮，一经水银则转足以坚其形。絮布炼之以为纸，则厚薄之形异。毛羽织之以为绸，则美恶之形异。虚实轻重之形，且屡变也。

若夫天地自然之忽凝忽流，则又皆空气使然。云之流行，空气托之也。风之流动，空气助之也。雨之流注，空气因压力而不胜也。露之流润，空气得阴寒而渐缩也。天之自然而流也，有如此。雨凝为雪，露凝为霜，微雨半空骤凝为霰，大雨半空骤凝为雹。盖以空气得热则涨而上融，得寒则缩而难融也。天之自然而凝也，有如此。江湖溪涧之流，有空气推行于其间也。鱼龙水族，沈浸于中则生；畜之盆盎则不生者，空气不足故也。地之自然而流也，又如此。江海无冰，溪涧易冰，地大则空气之往来亦大也。石卵出于浅滩，明珠藏于深渊，其凝结者，空气孕之也。金玉之精华，煤产之富饶，其凝实者，空气涵之也。地之自然而凝也，又如此。

六月十四日记

西洋各国之所以致富强者，以工商诸务之振兴也。工商诸务之无阻，以各项公司之易集也。凡事独立则难支，众擎则易举；势孤则气馁，助多则智周。西洋公司资本之雄，

动以数千百万计，断非一人一家之财力所能就。然苟有当办之事，可兴之利，则风声一播而富商立集，股票一出而巨款立致。盖其规画之精，风俗之纯，章程之善，有使人深信不疑者也。中国当办不办之事亦孔多矣，其所以易败而鲜成者，以公司之难集也。曩者庚辰辛巳之间，沪上风气骤开，颇仿外洋招股之例，兴办各事，苟稍有势力可藉，数十万金往往立集。无如任事者既未深知此中利病，措注不能中窍，甚者恣其挥霍，亏负累累，未一二年而入股者之资，悉化为乌有。迄今皆视为畏途，虽有集数万金之公司而无一应者。以致关系大局之紧要公务，无一可为。然则昔日风气之骤开，乃今之所以益闭也。岂不惜哉！岂不惜哉！余谓中国公司之不举，半由人事，半由气运。虽小端而实系全局。呜呼！时势之岌岌如此，安得有大力者出而一转移之也。

六月二十日记

西洋各国驻华公使领事，无不任意挟制，遇事生风。余以为洋人性情刚躁，不讲礼义之故。及至欧洲，与各国外部交接，始知其应付各事，颇有一定准绳；周旋之间，彬彬有礼，亦尚能顾交谊，不肯显露恃强凌人之意，亦不显露矜智尚术之意。非特英法也，各国皆然；非特外部也，各员皆然。即如前驻京英使威妥玛，我中国人皆以为妄人也，暴人也。而威妥玛与余交，情文并挚，随时襄助；且其学问议论，即在中国，亦断不能以常人视之。然苟再至中国，

不能保其不为患也。且洋人之恣挟制于中国也，其所由来，非一日矣。始于道光年间之和战无定，屡战屡败，既为洋人所轻^①。继以咸丰季年，为城下之盟，定吃亏之条约^②，益为洋人所轻。厥后虽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而堂司各官，皆未洞识洋情，因应不能得诀。每遇一事，大抵御之以多疑，示之以寡断，二者适与洋俗相反。浸至格格不能相入，其刚者争非所争，柔者又让非所让，而事益不可为。且偶有一二洋使性情稍恣^③，不甚施挟制之术者，非特要事无一可商，且有以微事而受严拒者。彼见夫善挟制者之多得所欲也，于是相承而趋于挟制之一途，即恣者亦渐化为黠，懦者亦渐变为悍矣。此风酿之者非一日，即改之者亦非一时。呜呼！安得识洋情有风力之大臣，久居总理衙门而一挽此习也。

六月二十二日记

中国茶务之衰，因往年贪得之辈，搀杂伪茶以图渔利，浸致饮者伤生，贩者失利。西人乃雇华人出洋，讲求种植制焙之法。先于印度西廊等处，如法试植，至今十余年，西人尽得其传。而中国茶利遂为所夺。所幸者，天时地利，中外各殊，故印茶尚不及华茶之美。而英、美等国富商巨室，

① 参见第一、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中国失败后所签订的《南京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

② 参见第一、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中国失败后所签订的《南京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

③ 恣（音què 鹵）：诚实。

亦不甚嗜之。即英国医生亦以印茶为有损，不若华茶之有益。近来西商到华办茶者，仍络绎不绝。使华商从此亟为整顿，尚可收桑榆之效也。去年头造春茶，华商仍能获利；特二造以后，屯积过多，不免又滞稍耳。西报又谓英京办茶者，有新行旧行之分。新行办印茶，旧行办华茶。门户既分，议论遂各有所袒。又有人致书英报馆，谓中国、日本茶树只有一种，印度西廊则有三种：一为彼处自有之野茶，一从中国移植之新茶，一则野茶与华茶相接而生。三者又以接生之本产叶为佳。盖野茶色浓味厚，固不若华茶之色淡味清也。印茶每一英亩，可采叶一千二百磅；华茶每英亩，仅得二百五十磅，其贵贱已不同矣。华茶性喜干燥，爱清凉，故必植于山岩。印茶能耐湿，不畏热，平地亦可栽种。惟发叶大粗，但工作之辈，廉其值而嗜之，精粗又不同矣。惟接成之本，每英亩收叶不过八百磅，此种茶获利较易，而为茶商所乐购焉。移植之茶，其培植之工，烘制之法，原不甚逊乎华茶，但非英人所喜，仍不若华茶之销流也。近闻福州各大茶行拟立章程，从新整顿，凡办茶者均不得杂以茶末；加工制造，精益求精。果尔，则尚可复振也。

六月二十七日记

中国商务不能振兴之故，厥有三端：一、在抢揽生意。华人创一业，稍沾微利，则必有人学步后尘，甚至贬价争售，互相诋毁，以致两败。若照西例，凡创一业，官给准

照，独享其利者若干年，剿袭诈伪者罚无赦，则无此弊矣。一、在搀杂诈伪。西人运来之货，初次、二次极佳，三次必渐逊，以华人之喜价廉也。中国则于丝中搀麻，或新丝中搀旧丝，或细丝中搀粗丝；茶则搀以柳叶，或杂以泡过茶叶，其颜色则多用装点。西人不过受欺一次，后不再来，即真货亦致滞销，皆弄巧成拙者阶之厉也。一、在电报灵速。即西人亦常受此害，然不若以上两弊之为祸烈也。

六月三十日记

中国圣贤之训，以言利为戒，此固颠扑不破之道。孔子曰：“放于利而行，多怨。”孟子曰：“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① 其言尤为深切著明。然此皆指聚敛之徒，专其利于一身一家者言之也。《大学》平天下一章，半言财用。《易》言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可见利之溥者，圣人正不讳言利。所谓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此治天下之常经也。后世儒者不明此义，凡一言及利，不问其为公为私，概斥之为言利小人，于是利国利民之术，废而不讲久矣。

数十年来，通商之局大开，地球万国不啻并为一家人。而各国于振兴商务之道，无不精心研究。其纠合公司之法，意在使人人各遂其私求；人人之私利既获，而通国之公利寓焉。故论一国之贫富强弱，必以商务为衡；商务盛则利之

^① 餍（音yàn 厌）：吃饱、满足。见《孟子·梁惠王上》。

来，如水之就下而不能止也；商务衰则利之去，如水之日泄而不自觉也。亚洲东方诸国之商务，向不如泰西诸国风气之开。然迩来日本、暹罗^①经营商务，亦颇蒸蒸日上。中国地博物阜，本为地球精华所萃，徒以怵于言利之戒，在上者不肯保护商务，在下者不肯研索商情，一二饶才智知大体者相率缄口而不敢言，偶有攘臂抵掌而谈之者，则果皆忘义徇利之小人也。即使纠合巨款为孤注之一掷，无不应手立败；甚且乾没人财以售其诈，致使天下之人，相率以商为畏途。试取各关贸易总册阅之，中国之财，每岁流入外洋者白金二三千万两。以三四十年通计之，则白金之一去不返者，已有十万万两之多矣。再阅一二十年，中国将何以为国乎？吾用是叹息流涕于当轴者之不知变计。即有一二知变计者，而又未尽得其术也。

闰六月初四日记

英法诸国外部尚书虽不时换人，而其下办事之侍郎总办等，则皆数十年在此署中，往往终身不换。如英之外部侍郎克蕾，副侍郎山特生；法之外部侍郎尼萨等，皆在外部办事二十余年。比国之侍郎郎贝尔芒，已专办外部事三十年矣。其他或自使馆随员、参赞升入外部，或自外部出为公使，又由公使入为侍郎尚书者，不可以更仆数。盖职业专则志一而不杂，经画久则才练而益精。所以西人办理

^① 泰国的旧称。

交涉，措注周详，鲜有败事，阅历使然也。

中国自文文忠公而后，总理衙门大臣萃毕生之全力，以经理交涉事务者，殆鲜其人。或以官高挂名，或以浅尝自喜，或骤出骤入，听其自然。一闻《海国图志》^①、《瀛环志略》^②两书之名，尚有色然以惊者。谓景秋坪尚书。或又有一二清流，如李高阳、阎朝邑两相国，皆自谢为不知洋务，以终年不一至衙门为高。至于章京，考取之券，皆以小楷，固有居署十年，尚于洋务不甚通晓者，其或号为明敏出色之人，不过取能了日行公事而止。若既了公事而又稍通洋务，则其人固更出色矣。则必由章京而管股，而帮办，而总办，如是者十年而不简放关道者，则群相与目笑之。故在署十年而稍习公事，无不得关道以去矣。迨既得关道，而外升藩臬，内升京卿，又不复入总理衙门矣。如是而欲洋务人才之练习，其可得乎？如是而欲办理洋务之不至于歧误，其可得乎？吾是以谓中国欲图自强，必自精研洋务始；欲精研洋务，必自整顿总理衙门始；欲整顿总理衙门，必自堂司各官久于其任始。

闰六月初六日记

西人尝谓谋国之要有三：曰安民，曰养民，曰教民。所谓养民者何也？盖查地球中书籍之数，大抵每年一百人中，

① 清魏源编著，最早刊行于1842年。是一本当时国人自编的最为详备的世界史地参考书。同时也是研究魏源思想和主张的主要著作。

② 清徐继畲编著，1848年刊行。是中国近代较早介绍世界地理及各国概况的专著。

必添一口。欧洲人民约三百五十兆，每年可增三百五十万口。中国约四百兆，每年可增三四百万口。苟无新法以养之，则必有人满之患。何以养欲而给求耶？按西国养民最要之新法，条目凡二十有一：一、曰造机器以便制造。二、曰筑铁路以省运费。三、曰设邮政局、日报馆以通消息。四、曰立和约通商以广商权。五、曰增领事衙门以保商旅。六、曰通各国电线以捷音信。七、曰筹国家公帑以助商贾。八、曰立商务局以资讲求。九、曰设博物院以备考究。十、曰举正副商董以赖匡襄。十一、曰设机器局以教闾阎^①。十二、曰定关口税以平货价。十三、曰垦荒地以崇本业。十四、曰开矿政以富民财。十五、曰行钞票以济钱法。十六、曰讲化学以精格致。十七、曰选贤能以任庶事。十八、曰变漕法以利转输。十九、曰清帐项以免拖累。二十、曰开银行以生利息。二十一、曰求新法以致富强。

闰六月初八日记

从前西洋各国受制于教王，当教王势焰最盛之时，几操废立各国君主之权。而各国之民信从教王，殆如水就下，如蚁附膻也。自耶稣教另树一帜，以与天主教为敌，欧洲各国之民，因争教而互相攻战，互相残杀至数十百万人之多，抢攘不靖者数十年。继乃定为各行其教，有不相菲薄不相师之意。然天主、耶稣两教，隐然势均力敌，而教王

^① 闾阎：古代平民居住的地区，也指平民。

之势骤衰。迩来愚民信教之心，似不如前。而各国君相，亦能实事求是，力图自强。教王之教，不足以愚之，力又不足以胜之，即素崇天主教之国，如法、意、德、奥诸大邦，无不创立新法，限制教民，教王固熟视而无如何也。教士慑于国家之威，无不谨受约束，恪守准绳。惟其前往中国者，不能人人如在其本国之驯谨。而中国与法国所立条约，既授以保护天主教之权，中国稍欲裁制教士，辄为法之外部及驻华公使所格，即使情理兼足，法人明知我当行之政，然彼既欲要结教士之心，又欲自示其权力之大，故无一意沮挠者。自是中国竟无法以治教士。而教士之徇规错矩者亦愈多，而愚民之蓄疑积忿者，遂一发而不可遏。迨巨案既起^①，教士赴诉于法使及领事，法使必先借端挟制，以增其本国之权利。再以保护教务之名，为教士多索利益以贖其求。其有清查教堂之法，如中国所宜整理者，法人虽勉允一二，教士亦知法之隔在邻国，威令不行，且知非出法人之真意，亦竟置之不理。此中国教务之所以日棘也。近时议者遂有请教王遣使之说，冀以隐分法人之权，万不得已之补救，亦只可如此。然经营稍不得诀，恐一弊去而一弊复生。余今虽筹办此事，盖兢兢焉，不敢不慎也。

闰六月二十七日日记

中国欲振兴商务，必先讲求工艺。讲求之说，不外二

^① 参见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上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6月出版，第357页。

端：以格致为基，以机器为辅而已。格致如化学、光学、重学、声学、电学、植物学、测算学，所包者广。得其精，则象纬舆图律历，皆能深造有得；得其粗，则亦不难以一艺名家。既须多设书院，选聪颖子弟，肄业其中。而艺术学堂亦不可不设也。机器能以一日之力，成十日之功；一人之力，代百人之功。如是则货价必廉，价廉而销售始畅矣。而所以扩商务之用者，则尤有八焉。一、曰设专官。如西洋各国，有商部尚书以综核贸易之盈亏，又有商务委员以稽查工作之良窳是也。一、曰兴公司。兴之之术，不外立保护公司之法，议整顿公司之规而已。一、曰励新法。有能创一艺者，给以凭单，俾得专享其利，则才智之士，无不殚精竭能矣。一、曰杜伪品。中国丝茶之不振，半由洋人仿造，半由奸商肆其诈伪，有搀杂假托诸弊，以致货真价实者亦受其累。今宜悬明法以禁之，又使诸商公议罚办之规条，行之数年，庶有豸乎。一、曰趋时尚。凡物能变新样，必可善价而沽，而众耳俗目之所好，尤不可不投也。一、曰设赛会。仿英、法、德、美、日本办法，建设会场，罗列珍奇，所以广见闻，资则效，开风气，旺贸易，法至良也。一、曰改税则。宜乘各国换约之时，渐改值百抽五之例，稍重洋货进口之税则，而于洋酒、洋烟之税，更加重焉。丝茶二项，宜稍轻出口税，以减成本而广销流。一、曰导商路。招商局轮船，既已畅行江海，宜渐多置轮船，派往南洋诸埠，以及外洋诸国，装货搭客，稍分西人之利。而华民之旅居外洋者，亦得声气联络，裨益岂浅鲜哉？

七月二十五日记

中国与各国衡富强之术，百不如西人。然有一事足以自豪者，则国债独少于诸国也。二十年前，中国本无所谓国债。左文襄公西陲之役^①，需饷紧急，始派道员胡光墉商借洋债两次，然不过数百万金耳。光绪甲申、乙酉之间，法兰西争越南，驶其兵舰，扰我海疆，各省调兵设防，糜费甚巨。于是广东、福建诸省，皆向洋商挪借巨款，而神机营、总理衙门亦或属出使大臣贷诸西洋，为购炮造船之用，奏明由各省各关按年归还本利。计国债最多之时，约有二千余万金。迄今逐渐偿还，当已不满一千万矣。东西洋诸国，或地不逮中国十分之一，而国债动以数万万计，盖有十倍、百倍于中国者。赋税所入，大半以偿债息，其所以百废具举者在此，所以不能不厚敛于民者亦在此。

曩岁李傅相创议借贷洋债白金三千万两，用以兴建中国铁路，此固至急之务，亦至善之计也。然余意不甚谓然者，盖恐中国风气未开，承办之人，未能事事核实，难免侵蚀亏短之虞。而铁路之获利，尚无把握，转恐加岁月津贴之费。夫养路修路，既需巨款，而三千万金之偿息，亦岁不能缓，则中国两受牵累，财用必日朘月削，恐致一蹶难振。倘竟欲造铁路，毋宁枝枝节节而为之，难无速效，亦免巨累，较为稳著。余之愚计如此。既而承办洋债之陈季

^① 即1873年左宗棠出关西征，从阿古柏手中收复新疆的战斗。

同，果藉借债之名，骗款累累以供私用。如是则所借之三千万金，并恐未必能全到中国矣。幸而廷议早罢之耳。余于是恍然于风气未开之时，筹办一事，难若登天。往往利未形而害已随之，非必筹画之未精也，得人之难也。

九月初二日记

防海有四要：曰筑炮台，精火器，储人材，节财源。炮台必与船坞相辅，船坞须地基宽广，形势巩固，转运近便，地险水深，海口迂缓而纤细，能与内地相联络，则妥善矣。造台必取材异地，洋师洋匠，德为最宜，美、丹次之。英制最良，原可取法，然其人或难驾驭，必有经纬以用之。台炮重足以镇守，长足以及远，必使敌船之炮不能及我，而我炮足制其死命。台后必设重炮台，所用者为攻炮、战炮、连珠炮，务使近炮与远炮相间，长炮与短炮相维。水雷以鱼雷为上，其兼船、炮、雷三项之用者。德国之艇裹以铁甲，并安大炮，可攻铁舰，且可御哈乞开思连珠炮，每艘费约需九万两。枪炮式宜一律，不可参差。至用器之人，船舶贵能驾驶，枪炮贵能施放，进退疾徐，皆以敌船为准，能占上风者胜。此外在能辨识风云沙线，测量经纬度数，预知趋避之方，则储材不可缓矣。平日宜于海口设水师学堂、武备学堂，渐收其效。节用之法，曰裁撤废舰，如拖罟、红单、鹰嘴等船；宜省修葺添制之费，专造炮舰，即英人所谓根本也。亦以火轮，行驶甚速，狭流浅水，无不可用。曰汰除冗费。曰归并额兵。曰酌收丁税。曰遍查渔船。

十一月初十日记

哥老会匪之起，其源盖发于蜀，实即青莲教之余孽。所谓红钱会者，其头目曰帽顶，总目曰大帽顶，最大者曰坐堂老帽。设有管事人员，入其会者给予飘布，转相煽诱，能招百人者即领百人，能招千人者即领千人，各立某山某堂字号以区别之，如曰龙虎山、忠义堂之类。蔓延各省，妄分五旗。籍隶两湖、江西者为白旗；籍两粤、闽、浙者为黑旗；籍皖、吴、河南者为蓝旗；籍云、贵、陕、甘者为红旗；籍四川者为黄旗。盖尊其教之所自出也。惟直隶、山西两省无之。山东之兖、沂、曹、济亦多传染。湖南行军日久，传衍尤多。其头目或当散勇，而营官百长之资格有转出其下者，昼则拜跪，立于营官等之前；会中有事，传集其党于山谷间，夜升高座，营官等反拜跪之，或杖或罚，无敢哗者。粤寇既平^①，乃更传其教于乡，谓之造台放飘，诸恶少游勇皆归之。曾文正公之议^②，谓但当问其匪不匪，不当问其会不会。是时江抚刘峴帅之议，请招其才而黜者，一律收标，销患无形。楚督李筱帅之议，全在大吏督饬地方官设法严拿。江督沈幼帅之议，以慎选牧令，严捕盗贼为主。而曾忠襄公威惠兼施，伏莽无敢窃发者。

① 即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被镇压。

② 曾文正公即曾国藩。

十二月乙卯朔记

近数十年来，中国民穷财尽，小民竭终岁勤动之力，往往不能仰事俯畜。生计之艰，视百年以前，不啻三四倍焉；视二百年前，又不啻七八倍焉。然西洋各国人之游中国者，皆于中国物价之廉，人工之贱，叹羨不容口。中国人民之众，虽甲于地球，而食用之俭，仍以中国为第一。盖以西洋养一人之费，若在中国，即以之养三四人、七八人而有余。推原其故，厥有数端。西人性情，自奉较奢，一切起居饮食，必求足以适意，足以养生。华人中人以下，往往不甚讲求，不惮苟简以节私费。西洋各国取之于民者重，大都十百倍于中国，其所以百事修举者在此，而百物昂贵者亦在此。中国取之于民者轻，所以百事废弛者在此，而百物廉贱者亦在此。至于地气和平，土脉膏腴，实在欧洲之上，所以户口难极蕃庶，而括其地之产，尚足养其地之人，宜乎西人之津津不置也。惟居今日而追溯一二百年以前，则当时中国食用之廉，又如在天上。今之所以骤艰贵者，议者或归咎于西人通商之故。此说未必无因。盖一则财源外溢，一则奢风渐入也。然此乃时势之所为，虽人亦未如之何。则自今以后，固有不能不因势利导以筹补救者矣。

十二月十一日记

昔轩辕氏^①见飞蓬而作车，见落叶而作舟，即中国制造机器之始。风车水碓，相传亦久。至于双锭纺车，提花织机，则愈变愈巧者也。绸缎棉织花纹，非人所能独为，故须用机器成之，德国乡间耕耨皆用人力，未尝代以机器，其余工作之在山水间者，则皆以水机助力，磨麦则尽用风车。惟人力所不能施者，如铸铁甲，起重物之数万斤者，自非机器不为功。然则机器之用，始于中国，泰西特以器力助人力之不足耳。非特机器也，即化学、光学、重学、力学、医学、算学，亦莫不自中国开之。如稼穡种植及造酿酒酱、染色、漂白、烧瓷器、玻璃、瓦缶、炼丹药、铅粉、银硃、打铁、点铜、制火药和石灰，皆化学也。光学则以水晶作眼镜。重学则造桥梁作环洞。力学则建亭台，起楼阁。医学则药物之外，亦尚针刺。算学则九章悉备。所谓西学者，无非中国数千年来所创，彼袭而精究之。分门别类，愈推愈广。所以蒸蒸日上，青出于蓝也。

十二月十六日记

英、法、德各国刑律，皆本罗马。罗马古律极严，谤人者死，私刈田禾者死，故烧人物产者投诸火，犯窃者鞭责后充奴婢，奴婢犯窃，加等投诸崖，遇窃盗格杀勿论，辱

① 轩辕氏即黄帝。

人者罚驴三十五匹，折人牙齿者罚至三百匹。尤奇者，本夫不得擅杀奸夫，惟奴仆奸主母则杀勿论。逆伦之犯，取鸡、犬、蛇各一，同置一囊而沉诸水。蛊毒杀人者罪同。嗣后旋改旋轻，除大逆不孝、师巫邪术、奴仆作奸数等之外，概从宽恕。

英吉利本罗马属地，罗马既去，更用严刑，截胫剥肤，挖目劓鼻，水溺火灼，种种凶残，民不堪命，然犯罪者益众。西历一千七百五十年，法益苛而民益顽，议院乃议尽改旧法，减省刑罚，罚镌监禁以外，至重不过绞首而已。又得延状师申辩，无威吓逼勒之虞，无榜掠镣铐之苦；虽犯罪不得相屈辱，牢狱亦亢爽洁净，不致酿为疫疠；且设学堂、书库、医院、庖厨于其中。复考核通国罪人之数，若少若多。若尤多，究其获谴之故，察其为恶之由，以施惩戒。行之不过五六十年，而顽梗潜消，民多知耻。其收效之捷，有如此者。

十二月三十日记

凡地之生物，土性与物性不相合，则必渐归凋敝。即相合而历年收种，仅以本地种子为用，则精气渐薄。此全恃土宜，而不知远近互换种子之妙也。北人种木棉，必取种于南，捆载花子以往者累累也，未闻物性、土性不相合也。泰西物产，佳美肥硕，迥胜中华，非惟精求艺植之法，其种子亦独好。即以西麦论，粒较大，穗较重。美国所出之米亦然，按亩计之，所收殆不下五六石，视中国农家又

几倍之。

夫中国地脉绵厚，视海外诸邦有过之无不及。诚取彼麦米之种而植之，必能佳美。又如美国棉花，柔细光洁，纺之如丝，角大如卵，干高六七尺，枝广四尺，童童如小树，所生之花，较中国多五分，其价在英国亦贵至二三倍。其花性喜斥卤，正与海滨潮汐之地相宜。且凡沿海沙岸，平衍宽广，竟可大收其利。似当在浙江、闽、粤各省，仿泰西设劝农局之例，规度隙地，广购各种而试植之。择其最为合宜得用者，多购籽种，而分卖于农家。农家既得倍利，自必争购无疑。十年之内，物产倍增矣。盖种子逾三四年，地性渐变，物性亦必变。宜仿西人养马之法，每越数年，再由西国购办以为更换，不过加运带使费而已。然而艺植之法，尤不可不仿西人之研精讲究也。

光绪十九年（癸巳）

正月乙酉朔记

中国各局翻译西书，譬之者初谓无益之费。乃十数年来，地球绕日之说，电气致用之宜，汽力运动之故，以及照影、石印、水电、铁路诸大端，几于无人不讲。如乡会试兼考算学，则凡天学、地学、化学、电学、重学、热学、光学、声学等，皆可旁及，而总以算学为归。算学书以

《几何原本》^①为最要。凡考得者先予记名，遇有修葺城郭，兴筑炮台，测量舆地，制造器械，操练水雷等事，则用之。似于大局必有裨益。

西洋大树之中，有数种为中国所未见，而又有大用者。如澳大利亚所出之浆树，好事者以此树之子，送至中国，使西人栽种，其生极捷，高可二十丈，干之大径十六尺。伐下之木，久则极硬，可供造船之料。皮可取浆，其用略同于漆。尤妙者，性与潮湿相宜，泽国皆可栽种。盖地有大树，可补风雨，绿阴如幄，悦目怡神。使取此树遍植荒墟故陇之间，亦兴利之一端也。

二月十七日记

情话悦亲朋，莫谈邑中狱讼钱粮事；交游择贤俊，愿识天下学问经济人。余自海外将归，先寄此联悬之于门。

四月十二日记

中国以嗣续为最重。孟子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盖有鬼犹求食之说^②，又有神不散非祀之说^③。若敖氏之鬼，不其馁而，令尹子文所以泣也。佛氏生于印度，其说亦颇相

① 公元前三百年，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把前人的几何知识加以整理总结为演绎体系，写成了《几何原本》一书。

② 《左传·宣公四年》：“鬼犹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馁而！”意谓人死后成鬼仍要吃饭。

③ 歆（音xīn）：谓祭祀时神灵先享其气。《诗·大雅·生民》：“其香始上，上帝居歆。”

符。故以人之生前造孽者为饿鬼，鬼而称之为饿，则鬼真求食矣。求食必赖子孙之祭祀，讲阴骘者遂以绝嗣为最重之罚，良有由也。泰西风气则不然。往往有富拥巨万而终身不娶，将死则输之教堂，分之朋友者；往往有贵为总督，或各部大臣，年近耆艾，犹孑然一身，晚乃娶一耆艾之处子，不过聊以自娱，意本不在生育者。盖彼本视子孙为甚轻，若居可有可无之列。所以然者，彼谓人死之后，归于溟溟，无所谓求食也。此耶稣之说之与儒、佛不同者也。洋人无事不讲核实，大抵如此。然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为也。圣人岂不能为洋人之核实哉？盖深有见于鬼神之神德，体物不遗，祖宗与子孙，实有相依相系之理。人人知此，则为善者有所劝，为恶者有所惩，而报本追远之意，油然而生。耶稣之教，非不核实，然而难免不仁之讥矣。

四月十三日记

英法两国虽皆称饶富之国，然法自为德人所败，国债累累，困于输息，以至无物不税，无税不重，尚有子子不终日之势。英国则帑项充裕，凡人所资为衣食及日用必需之物，无不优免关税以广招徕。其重收关税者，惟烟、酒、茶叶、咖啡四者而已。旧时英关于绸缎、米麦等，亦莫不有税。厥后用议院之议，渐裁各税，而以其税加之烟、酒、咖啡、茶叶之中。然近来英美收数仍不减于旧者，以烟、酒、咖啡、茶叶之销数甚繁也。议院之言，盖谓布、谷等物，民所仰为衣食者，税之则碍民生计，故竟裁之；烟、酒、咖

啡、茶叶，并非人生必需之物，而人必欲用之者，不过徇一时嗜好，而其力亦必销有余者也，彼既可已而不已，虽重榷之亦不为过。譬之人吸雪茄烟者日费三便士，今加其税，俾日出六七便士，亦于其人尚无大损。此所以值百抽百或抽二百^①，而民不以为病也。此所以能用四宗之税，敌百货之税也。余于是恍然于中国之关，亦可渐用此术。昔南宋以一隅之地，支持强盛之女真，赵开为张浚理财，仅恃四川一省，所供之饷，数倍于全盛之时，而能源源不竭，其大端亦不过倚办于榷酤、榷茶数者^②。英人之法，殆暗与此合。今中国关税及洋药厘金，每岁收银约二千余万两，诚将各物出入口之税一概豁免，而于茶叶出口税酌减其半以轻成本，所有岁收二千余万两，尽加之于洋药厘金与烟、酒、咖啡之中，其洋纱、洋布、火油、自来火四项，亦须加税一二倍，以保华民生计。岂非自富自强之要图乎？

四月十六日记

中国用人，以富者为嫌；西俗用人，以富者为贤。其道有相反者。夫登龙断以左右望而罔利市者，谓之贱丈夫。中国数千年来，无愚智皆知贱之。西汉摧折富商，俾不得与齐民齿；即使其中有贤能者，亦往往摈不用；偶或误用之，未尝不致祸败。其矫枉过正者，遂有明知，其贤而避

① 即百分之百的税收或百分之二百的税收。

② 榷（音quē 确）：专利、专卖。《汉书·武帝纪》：“初榷酒酤。”颜师古注引应劭曰：“县官酤榷卖酒，小民不复得酤也。”

嫌不用者矣。故贬之曰铜臭，斥之曰守财奴，中国之习俗然也。泰西各国最重议绅。议绅之被推选者，必在殷富之家，谓之体面人；且其平日必散财厚施以沽名誉，然后能为众所推。间有十之一二，以寒士膺选者，则因其才学已著，有富人代之用财，冀其入议院而助己也。至其选为各部大臣及宰相者，非殷实之世爵，即富厚之名人。其意以为彼皆不忧衣食，专顾体面，未有不竭诚谋国者。而其所用之人，非特犯赃罪者颇鲜，往往皆能称职。大抵人才视风俗为转移，彼知为众所弃则竟自弃矣，为众所重则亦自重矣。且西洋之寒门贫族，所以不出人才者，彼自入塾读书以后，非极富则不能为上等之学问，非极富则不能交上等之朋友。况复囿于见闻，牵于衣食，其不能开拓胸襟也审矣。若夫豪杰之士，非以财助之不兴也。盖有恒产即有恒心者，吾于泰西风俗见之。

四月二十二日记

西洋诸国武备日新，文教亦蒸蒸日上。英国伦敦有赫来士呵斯必铎者^①，大学馆也，建自三百五十年前，学徒七百人，有可造者升之岳斯笏大书院^②。伦敦又有播犁地土母席庵者，^③为最大书院，中国经史子集，无不收藏，男女看书者三百余人，早入暮归，且于中国圣人之道，无不悉心

① Christ's Hospital 即基督慈善学校。

② 即约瑟夫学院。

③ 即多米尼图书馆。

体会。英之文教盖如此。德国书库在新皇宫之旁，屋中列数千年前乐谱及各国古字，俱以羊皮为之。有掌书所，亦藏中国经史子集，并有梵文字汇、蒙古旧史、吐蕃纪载，每日九点钟至四点钟，凡来领书钞读者二百余人。德之文教盖如此。美国人皆入书院，分十余班，升首班者入郡学院，专教格致、史鉴、历学、算法、他国语言文字，及艺术必用之书。再上有实学院，院有上下，分十三班，考得首班者入大学院肄业。肄业既成，升之仕学院，盖欲其学优而仕也。院中藏书，与英略同。其所肄业诸学：一、经学，专论教中事也；二、法学，考论古今政事利弊及通商事宜也；三、智学，格物兼性理、文字、语言诸事也；四、医学，博考经络表里及制配药品也。美之文教盖如此。

六月十四日记

有一出使随员论西国富强之源，登之报章云：西国致治之要，约有五大端：一、曰通民气。用乡举里选以设上下议院，遇事倡言无忌。凡不便于民者，必设法以更张之。实查户版生死婚嫁，靡弗详记，无一夫不得其所，则上下之情通矣。二、曰保民生。凡人身家田产器用财贿，绝无意外之虞。告退官员，赠以半俸；老病弁兵，养之终身；老幼废疾阵亡子息，皆设局教育之。则居官无贪墨，临阵无畏缩矣。三、曰牖民衷。年甫孩提，教以认字，稍长教以文义，量其材质，分习算、绘、气、化各学，或专一事一艺，终身无一废学者，何也？有新报之流传，社会之宣讲

也。四、曰养民耻。西国无残忍之刑，罪止于绞及远戍苦工，其余监禁、罚鍰而已。监狱清洁无比，又教以诵读，课以工艺，济以医药。无拘挛，无鞭撻，而人皆知畏刑，不敢犯法，几于道不拾遗。父母不怒责其子，家主不呵叱其仆，雍然秩然。男女杂坐，谈笑而不及淫乱，皆养耻之效也。五、曰阜民财。其藏富于民者三要，一尽地力，谓讲水利、种植、气化之学；二尽人力，各擅专门，通工易事，济以机器，时省工倍；三尽财力，有公司及银号，而锱铢之积，均得入股生息，汇成大工大贾。有钞票及金银钱以便转运，则一可抵十矣。有此五端，知西国所以坐致富强者，全在养民、教民上用功。而世之侈谈西法者，仅曰精制造，利军火，广船械，抑未矣。

八月初三日记

余尝评论光绪初年以来出洋星使，究以曾惠敏公为第一^①。以其资性聪明，颇多才艺，而又得文正之庭训。在任八年，练习洋务，并谙言语，至今为洋人所钦慕。伊犁改约一案，弭兵修好，颇著成功。洋药厘税并征条约，成于惠敏之手，岁添帑项四五百万金，颇有裨于国计。越南一役，至于决裂，则以有隐掣其肘者，非办理不善之咎也。惟其持论或稍游移，始终以多设领事为无益，未免意存推诿，

^① 曾惠敏公即曾纪泽，曾国藩长子。

此其过于聪明之失也。郭筠仙侍郎次之^①，侍郎虽力战清议，以至声名败坏，然其心实矢公忠，且他人必无此毅力，无此慧气，故居第二。郑玉轩^②，黎莼斋^③又次之。玉轩、莼斋，皆君子人也，居心稍恣，所值又非可以见功之地，以至无大建树，故居第三、第四。陈荔秋又次之。荔秋虽亦不失为君子，而胆量更小于郑、黎，实非干事之材，故居第五。……

十月己酉朔记

周柱下史《道德》五千言，为道教之鼻祖。其大旨主清净无为，坚定自持，冲虚不息，又济以能忍之力，以柔制刚，以退为进，于儒理尚不甚相远也。后如庄子、列子、文子、关尹子、亢仓子，皆其支流也。申子、韩子流为刑名之学，而其教一变矣。阴符经可通于兵，教又一变矣。迨长生之说兴，方士专求不死之方，却老之术，为神仙家言者有服饵导引之法，而又分为内丹、外丹，援易象以入丹经，教又一变矣。内丹者，以一身之水火阴阳，发挥丹道。其学道也，专讲神仙炼养，以金丹换凡骨，始创之者为魏伯阳、张伯端、王道诸子。所著书如《参同契》、《悟真篇》、《龙虎经》，皆是也。道家推为正宗。大旨假真阴、真

① 郭筠仙即郭嵩焘，湖南湘阴人。字伯琛，号筠仙，晚号玉池老人。学者称为养知先生。

② 郑玉轩即郑藻如，福建闽县人。字玉轩。

③ 黎莼斋即黎庶昌，贵州遵义人。字莼斋。

阳之二物，夺天地之一气以为丹饵，归丹田气海之中以御一身，则一身之气翕然归之，若众星之拱北极。其言虽似有理，然若方技家言，变浅为智，一息得道，婴儿姹女，金楼绛宫，青蛟白虎，宝鼎红炉，皆老子所未言。其为后世所增无疑矣。外丹者，即炉火之说，烧丹炼汞，点石成金，所谓黄白之术是也。其大旨谓真铅、真汞，止取天地之精，日月之华，混合造化以成神丹，辨药材之真伪，抉金石之异同。其用功之法，又必攢簇周天气候，以使金火相交，《淮南》、《鸿宝》秘书多言烧炼，大抵皆出羽流伪托，教又变而愈变矣。

十月初二日记

至于容成之术，胎孕之说，别为房中一家，尤属道家修养之外乘。欲假此以求羽化飞升，长生久视，亦殊谬矣。此外有方药、符图、守庚申尸解诸术，愈变愈下。按《道藏》诸书，名目繁多，总厥大纲，分为三洞、四辅、十二类。所谓三洞者，一洞真部，元始天尊所流演，是为大乘上法，二洞元部，太上老君所流演，是谓中乘中法；三洞神部，亦出太上老君，是谓小乘初法。所谓四辅者，其一太元部，洞真之辅也；其二太平部，洞元之辅也；其三太清部，洞神之辅也；其四正一部，三洞三辅所会归也。所谓十二类者，曰本文，曰神符，曰玉诀，曰灵图，曰谱录，曰戒律，曰威仪，曰方法，曰众术，曰记传，曰赞颂，曰表奏。欲考道家源委，其总汇不外乎是。

今世道家之祖曰张天师，至明乃改号曰真人，然实五斗米贼张鲁之后^①，亦黄巾之流亚耳^②。演其术者为北魏寇谦之等^③，又以斋醮章咒入之，而教复一变矣。汉志所录道家三十七部，神仙家十部，本属截然两途。黄冠者流，以清静之不足耸听，于是以丹方、符录炫其神怪，名为道家，实皆神仙家也。神仙之说，始于秦汉之方士，盛于魏晋，托始于刘向，而广衍于葛洪。于是道家与神仙家合，而道之本旨以晦，《参同契》假借爻象以论作丹，自标其名曰《周易》，是牵异学以乱圣经也。陶宏景《真诰》一书，多言仙真授受真诀；而《甄命篇》实窃佛家四十二经为之；至如地狱托生，乃窃佛家中鄙陋浅近之说耳。皆非道家之真谛也。

光绪二十年（甲午）

二月二十二日记

西洋各国工艺日良，制造日宏，销流日广，皆恃得机器为之用也。有机器，则人力所不能造者，则机器能造之；十人、百人之力所仅能造者，而一人之力能造之。夫以一人而兼百人之工，则其所成之物必多矣。然以一人所为百

① 张鲁：东汉末天师道首领。

② 即东汉晚期太平道首领张角领导的黄巾起义。

③ 寇谦之：北魏道士。他排斥佛教，改革天师道，是所谓新天师道的创始人。

人之工，而减作十人之工之价，则四方必争购之矣。再减作二、三人之工之价，则四方尤争购之矣。然则论所成之物，则一可兼十百，即论所获之价，亦一可兼二三。加以四方之争购其物，视如减十、减百之便利，而谓商务有不隆盛，民生有不富厚，国势有不勃兴者哉？

中国人民之众，十倍于各国。议者谓若广用机器，不啻夺贫民之生机，使之不能自食其力。故西洋以善用机器为养民之法，中国当以屏除机器为养民之法。然使行是说也，则必有人所能造之物，而我不能造者，处处让人以独步，固不待言。且以一人所为之工，必收一人之工之价，则其物之为人所争购，必不能与西人之物之价，减二三、减十百者相敌也明矣。自是而中国之货，非但不能售于各国，并不能售于本国；自是而中国之民，非但不能自食其力，且知用力之无益，而遂不自用其力；自是而中国之民，非但不能成货以与西人争利，且争购西人之货以自供其用，而厚殖西人之利。然则商务有不日替，民生有不日困，国势有不日蹙者哉！是故守不用机器，调剂贫民之说者，此中古以前闭关独治之时势，而非所施于今日也。必也研精机器以取西人之长，仍兼尽人力以收中国之用，斟酌得宜，因势利导，如日本近年之夺西人利者，则以中国之大，何不可为？何不可成？且用机器以造物，则利归富商；不用机器以造物，则利归西人。利归富商，则利犹在中国，必可分其余润以养吾贫民。利归西人，则如水渐涸而禾自萎，如膏渐销而火自灭，后患有不可思议者矣！

二月二十三日记

近年中国出口货与入口货相准，每岁亏银至三四千万两之多。溯查七八年前，出入口货往往相抵，亦有出口货价，转赢于入口货价数百万两者。近来入口货如潮之涨，如云之升，不外数端，曰米、布、纱、线、火油、自来火也。洋米之来，岁价约一千万两左右，此系昔年所无者。洋布、棉纱、棉线之来，岁价至四五千万两左右，昔年不过一二千万两，骤增至三千万两，则洋布添价居其一二，而纱线添价居其八九也。火油、自来火之来，岁价亦各数百万两，从前不过数十万两耳。余惟亏银之故，大端尽在棉纱、棉线。他货之旺，中国尚可多销各货以与之相抵。若纱线则为数骤增，竟有日长炎炎之势，又非来自英国，而实来自印度。所以然者，以其用机器纺成，工价较轻，匀细洁白，又胜于人力所制者，是以人争购之以织土布，则工费省而销售速。若不设法拒遏，则洋纱、洋线之源源而来者，尚恐日多一日无穷期也。而中国之织女、机妇，恐多束手以待饥寒矣。然遏之固无他法，不外设厂招工，广购机器，自纺洋线、洋纱，渐推而至于织布，则风气开而利源溥矣。余是以有用机器殖财养民说也。

二月二十五日记

古之王者，有分土，无分民。春秋之世，土之求仁者，于周不可，则去之鲁；于鲁不可，则去之齐；于齐不可，则

去之宋、之郑、之秦、之楚。盖犹有四海一家之意，虽圣人何独不然。今之泰西诸国颇存此风，或以英人而辅法，或以意人而佐德。凡食禄之国，即其所效忠之国，其间奇勋伟绩，不出于土著而出于羁旅者多矣。至其民之为商、为工、为农、为佣者，不必定居本国，凡可安居乐业者即适之。一经入籍，即为土著，新籍、旧籍所获权利，并无歧异。即如美国地多旷土，凡英人、意人、德人往垦辟者，为数不下数十百万。美之官绅待之，与美人一体，并不以英人、意人、德人视之也。埃利士人者，英之阿尔兰人也。彼且自居土著而陵侮华民矣。则以英人入籍而华民不入籍也。华民所以不能入彼籍者，盖以饮食衣服，依然墨守华风，究不能与西人合而为一。华民之胜于他国人在此，而受侮于他国人亦在此。盖我既自异于彼族，即彼族亦不能不以异类视之也。

二月二十六日记

中国地博物阜，甲于五大洲，欲图自治，先谋自强，欲谋自强，先求致富。致富之术，莫如兴利除弊。兴利奈何？一、曰煤铁之利。每省能开一二佳矿，则船政、枪炮、制造各局所需，无须购之外洋，可省无穷之费。一、曰五金之利。云南产铜，山东、吉林产金，广东产水银，四川产银，诚能广为开采，妥为经营，则货不弃于地矣。一、曰鼓铸之利。如能仿英、美诸国之铸金银，公家之利甚溥，而钞票之法亦寓乎其中，即银行之利亦可兴焉。一、曰织组

之利。织绒机器应设于直隶、天津，以取口外之驼毛、羊毛。织布机器设于苏州、上海，以取滨海之木棉。织绸缎机器设于苏杭嘉湖，以购江浙之蚕丝。一、曰铁路之利。所以与轮船招商局相表里，而二十行省之土货可以广销，则愈产愈丰矣。除弊若何？曰汰冗员也，核厘金也，清查常关之税也，重征烟酒洋药之税也，节河工之糜费也，去土木之工之中饱也。夫如是，则弊无不革，即利无不兴，而谓不渐致富强者，未之有也！

论中国在公法外之害 (1892年)

泰西有《万国公法》^①一书，所以齐大小强弱不齐之国，而使有可守之准绳。各国所以能息兵革者，此书不为无功。然所以用公法之柄，仍隐隐以强弱为衡，颇有名实之不同。强盛之国，事事欲轶乎公法，而人勉以公法绳之，虽稍自克以俯循乎公法，其取盈于公法之外者已不少矣；衰弱之国，事事求合乎公法，而人不以公法待之，虽能自奋以仰企乎公法，其受损于公法之外者，已无穷矣。是同遵公法者其名，同遵公法而损益大有不同者其实也。虽然，各国之大小强弱，万有不齐，究赖此公法以齐之，则可以弭有形之衅。虽至弱小之国，亦得藉公法以自存。惟亚细亚东方诸国，风气不同，政事不同，言语文字不同，初与公法有格格不相入之势，而此书亦若未挈东方诸国在内。三十年来，日本、暹罗尽力经营，以求附乎泰西之公法。日本

^① 《万国公法》，英国人惠顿撰，美国传教士丁韪良译。1864年京师同文馆刊行。全书分释义明源、论诸国自然之权、论平时往来、论文战等四卷。内容除讲解国际间和战及外交惯例外，突出宣扬殖民主义，鼓吹变弱小国家为西方资本主义的保护国。

至改正朔，易服色，以媚西人，而西人亦遂引之入公法矣。中国与西人立约之初，不知《万国公法》为何书。有时西人援公法以相诘责，秉钧者尝应之曰：“我中国不愿入尔之公法。中西之俗，岂能强同；尔述公法，我实不知。”自是以后，西人辄谓中国为公法外之国，公法内应享之权利，阒然无与。如各国商埠，独不许中国设领事官；而彼之领事在中国者，统辖商民，权与守土官相埒；洋人杀害华民，无一按律治罪者；近者美国驱禁华民，几不齿中国于友邦。此皆与公法大相刺谬者也。公法外所受之害，中国无不受之。盖西人明知我不能举公法以与之争，即欲与争，诸国皆漠视之，不肯发一公论也；则其悍然冒不韪以凌我者，虽违理伤谊，有所不恤矣。余尝谓中国如有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元太祖之声威，则虽黜公法，拒西人，其何向而不济；若势有不逮，曷若以公法为依归，尚不受无穷之害。秉钧者初不料其一言之失，流弊至于此极也。近年以来，使臣出驻各国，往往援据公法为辩论之资，虽有效有不效，西人之旧习已稍改矣。往岁余殫竭心力，与英廷议定设立香港领事官，此可为风示他国张本，即可为隐抽昔日受亏条约张本。无如当事诸公，有一二人挟私怀忌，出死力以阻之。余独不解其是何肺肝？中国办事之难，一至于此，可胜叹哉！可胜叹哉！

（选自《庸庵海外文编》）

使才与将相并重说 (1892年)

昔汉武帝诏举茂才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使才与将相并重久矣。孔子亟称子产，其相郑以润色辞命为功。管仲天下才，而平戎之役，文辞彬雅，为周天子所宾敬。秦汉而后，中国疆宇广矣，即今日拓日远，不能无与并立之国。有并立之国，不外战、守、和三事。战资乎将，守资乎相，和资乎使，殆有交相为用而不可缺者。且相臣主内政，使臣主外务，缓外则内方可治，外与内相表里也。将臣尚武力，使臣尚文辩，辩胜则力可勿用，辩与力相补救也。是故有百年安边之计，定于三寸舌者，富弼之使契丹是也^①。有一介行李之驰，贤于十万兵者，陆贾之使南粤是也^②。近数十年以来，火轮舟车，无阻不通，瀛环诸国，互为比邻，实开宇宙之奇局。英、法、俄、德、美数大国，各挟胜势以相陵相伺。彼与我通商定界立约，应之稍一不

^① 富弼，北宋大臣。字彦国，河南洛阳人。1042年出使契丹，以增加岁币为条件，拒绝割地的要求。

^② 陆贾，汉初政论家，楚人。从汉高祖定天下，常使诸侯为说客。

审，往往貽患无穷，而使臣之责乃益重。吾观西洋诸国，或以宰相及外部大臣出为全权公使，或以大将军及兵部大臣出为全权公使，其视将相与使臣，无纤毫轩轻焉。大抵使臣宣国威，觐敌势，恤民瘼，宜与庙堂谋议，翕然相通。至于造船制炮之法，练兵储才之要，或考其新式，或侦其密计，以告我将帅而为之备，系惟使臣是赖。是故，无贤相之识与度，不可以为使臣；无贤将之胆与智，亦不可以为使臣。夔乎艰哉！中国可膺此选者尚寡，安能应变而不受人侮？然非士大夫之才力不如西人也，亦在有权力者之开其风气而已矣。

（选自《庸庵海外文编》）

治术学术在专精说 (1892年)

中国上古之世，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饗飧而治^①。孟子讥其以大人小人之事，并而为一。盖鸿荒朴略之时，文明尚未启也。厥后耕织陶冶之事，不能不分，分之愈多，术乃愈精。是故以禹之圣而专作司空，皋陶之圣而专作士，稷契之圣而专作司农、司徒，甚至终其身不改一官，此唐虞之所以盛也。管子称天下才，其所以教民之法，不外士之子恒为士，农之子恒为农，工之子恒为工，商之子恒为商，此齐国之所以霸也。宋、明以来，渐失此意，自取士专用时文试帖小楷，若谓工其艺者，即无所不能；究其极，乃一无所能。仕于京者，忽户部，忽刑部，忽兵部，迄无定职；仕于外者，忽齐鲁，忽吴楚，忽蜀粤，迄无定居；忽治河，忽督粮，忽运盐，亦迄无定官。夫以古之圣人，所经营数十年而不敢自谓有成效者，乃以今之常人，于岁月之间而望尽其职守，岂不难哉？泰西诸国，颇异于此。出

^① 饗（音yōng 拥）：熟食，有时专指早饭。饗飧指早饭和晚饭。

使一途，由随员而领事，而参赞，而公使，洊升为全权公使，或外部大臣，数十年不改其用焉。军政一途，由百总而千总，而都司，而副将，洊升为水陆军提督，或兵部大臣，数十年不变其术焉。他如或娴工程，或精会计，或谙法律，或究牧矿，皆倚厥专长，各尽所用，不相搀也，不相挠也。士之所研，则有算学、化学、电学、光学、声学、天学、地学，及一切格致之学；而一学之中，又往往分为数十百种，至累世莫殫其业焉。工之所习，则有攻金、攻木、攻石、攻皮、攻骨角、攻毛羽，及设色搏埴；而一艺之中，又往往分为数十百种。即如造炮，攻金之一事也，而炮膛、炮门、炮弹、炮架，所析不下数十件，各有专业而不相混焉；造船，攻木之一事也，而船板、船桅、船轮、船机，所分不下数十事，各有专家而不相侵焉。所以近年订购船炮，每由承办之一厂，向诸厂分购各料，汇集成器，而其器乃愈精。余谓西人不过略师管子之意而推广之，治术如是，学术亦如是，宜其骤致富强也。中国承宋、明以来之积弊，日趋贫弱；贫弱之极，恐致衰微。必也筹振兴之善策，求自治之要图；亦惟详考唐、虞以后^①，宋、明以前之良法，而渐扩充之，而稍变通之，斯可矣。

（选自《庸庵海外文编》）

① 唐、虞均是周文王、周成王时的古国名。

考旧知新说 (1892年)

吾闻西人之言曰，华人尚旧，西人尚新。盖自憙其能创一切新法以致富强，而微讽中国不知变计也。诂知不忘旧，然后能自新；亦惟能自新，然后能复旧。夫日月，日新也，而容光之照，万古如旧；流水，日新也，而就下之性，万古如旧。西人敎械，所以能参造化精微者，亦本前人已阐之学，屡研而益进耳，并非一旦豁然超悟，骤得无上之秘诀也。即如中国上古之世，继天立极之圣人，应运迭兴，造卦画，造市易，造网罟，造耒耜，造舟车，造弧矢，造衣裳，造书契，能使鸿荒气象，一变为宇宙之文明。盖新莫新于此矣。其化由东而西，至今西学有东来之法，是能新中国，并能新及遐方殊俗者，莫中国之圣人若也。降及近古，中国之病，固在不能更新，尤在不能守旧。即以制器一端而论，惟黄帝、周公之指南车，民间尚知造针之

法；外此如《考工记》所论^①，暨公输般之攻具，墨子之守具，张衡之浑天仪，诸葛亮之木牛流马，杜预之河桥，早已尽失其传。藉令因其旧法，相与潭思竭能，庸讵不能出西人上乎？夫惟其轻于忘旧，所以阻其日新也。窃尝盱衡时局，参核至计，为以两言决之曰：“宜考旧，勿厌旧；宜知新，勿骛新。”

（选自《庸庵海外文编》）

^① 《考工记》：先秦古籍中的重要科学技术著作。作者不详。据后人考证，它是春秋末齐国人记录手工业技术的官书。

振百工说

古者圣人操制作之权以御天下，包牺、神农、黄帝、尧、舜、禹、周公，皆神明于工政者也。故曰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圣人之制，四民并重，而工居士农商之中，未尝有轩轻之意存乎其间。虞廷扬拜，垂艾、斨伯与，与皋、夔、稷、契同为名臣。《周礼·冬官》虽阙，而《考工》一记，精密周详，足见三代盛时工艺之不苟。周公制指南针，迄今海内外咸师其法。东汉张衡，文学冠绝一时，所制仪器，非后人思力所能及。诸葛亮在伊吕伯仲之间，所制的木牛流马，有诸葛灯，有诸葛铜鼓，无不精巧绝伦。宋、明以来，专尚时文帖括之学，舍此无进身之涂。于是轻农工商而专重士；又惟以攻时文帖括者，为已尽士之能事，而其他学业，懵然罔省；下至工匠，皆斥为粗贱之流。浸假风俗渐成，竟若非性粗品贱，不为工匠者。于是中古以前智创巧述之事，阒然无闻矣。泰西风俗，以工商立国，大较恃工为体，恃商为用，则工实尚居商之先；士研其理，工致其功，则工又必兼士之事。吾尝审泰

西诸国勃兴之故，数十年来，何其良工之多也。铁路、火车之工，则创其说者曰罗哲尔，曰诺尔德，而后之研求致远者，不名一家。火轮舟之工，则引其端者曰迷路耳，曰代路尔，曰塞明敦，而后之变通尽利者，不专一式。电报之工，最阐精微者，则有若嘎刺法尼，若佛尔塔，若倭斯得，若阿拉格，若安贝尔。炼钢之工，最擅声誉者，则有若西门子，若马丁，若别色麻，若陪尔那，若回特活德。制枪之工，则有若林明敦，若吟者士得，若毛瑟，若亨利马梯尼。制炮之工，则有若克鲁伯，若阿模士庄，若荷乞开司，若那登飞。其他造船、造钢甲之工，则有德之伏尔铿，英之雅罗，法之科鲁苏。造鱼雷、造火药之工，则有奥之怀台脱，德之刷次考甫，德之杜屯考甫。（泰西以人姓为人名，自炼钢以下，大抵以人名为厂名，即以厂名为物名者居多。）当其创一法，兴一厂，无不学参造化，思通鬼神。往往有读书数万卷，试练数十年，然后能为亘古开一绝艺者；往往有祖孙父子积数世之财力精力，然后能为斯民创一美利者。由是国家给予凭单，俾独享其利，则千万之巨富可立致焉。又或奖其勋劳，赐以封爵，即位至将相者，莫不与分庭抗礼，有欲然自视弗如之意，则宇宙之大名可兼得焉。夫泰西百工之开物成务，所以可富可强，可大可久者，以朝野上下敬之慕之，扶之翼之，有以激厉之之故也。若是者，人见谓与今之中国相反，吾谓与古之中国适相符也。中国果欲发愤自强，则振百工以前民用，其要端矣。欲

劝百工，必先破去千年以来科举之学之畦畛^①，朝野上下，皆渐化其贱工贵士之心；是在默窥三代上圣人之用意，复稍参西法而酌用之；庶几风气自变，人才日出乎。

（选自《庸庵海外文编》）

① 畦畛：田间的道路，引申为界限或隔阂。

更多好書：

<http://myboooks.googlepages.com>